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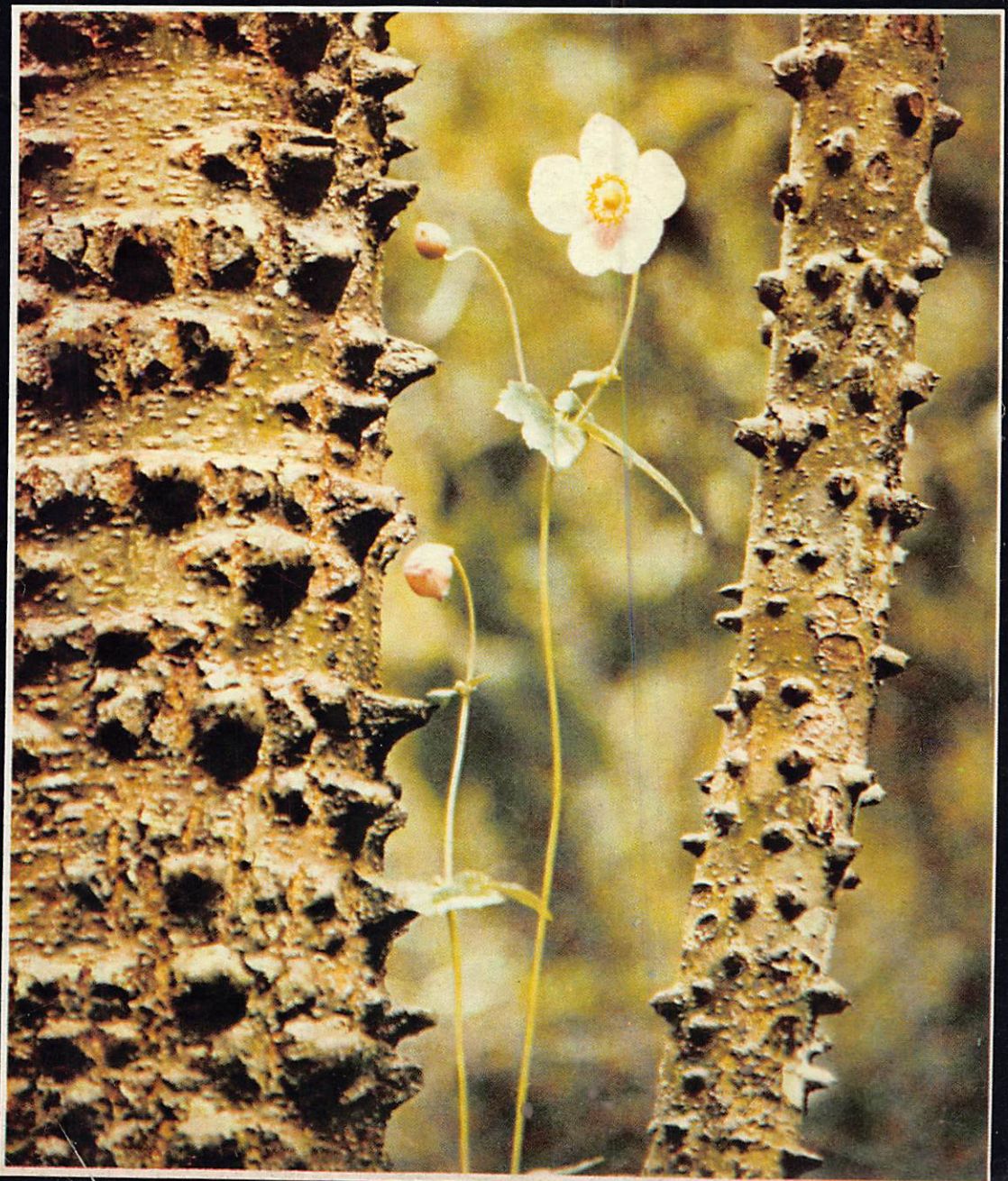
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月刊 · 一九八四年三月號 · 11 ·

「元帥」爭奪戰

——中國人民解放軍今年八月一日將有重大新聞
中國民聯將和台灣海峽兩岸公開接觸



國內生活一瞥



- (1) 曬太陽，聊家常，度時光
- (2) 祖坟何處是，燒紙祭奠聊自慰。
- (3) 邊遠山村沒有醫生，只有用土法醫療。
- (4) 掘掉祖坟蓋上幹部宿舍。
- (5) 環境污染還沒清除，清除什麼精神污染呢？



堅決維護「中國之春」的獨立

就重印《中國之春》第十一期告讀者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現在您讀到的，是「中國之春」雜誌一九八四年三月號十一期的重印本。之所以稱為「重印本」，是因為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曾在香港出版過「中國之春」第十一期，該期封面左上角印有「革新版」字樣（見圖一，注：圖一為原十一期封面）。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在此嚴肅宣佈，原封面印有「革新版」字樣的第十一期雜誌（為敘述方便，以下簡稱港版），不代表編輯部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的立場。為糾正偏差，以正視聽，「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決定重排第十一期。我們做出這個重要決定，是因為原版十一期的編排給人顯明的親台右傾之感，扭曲了原「中國之春」雜誌堅持的獨立立場和獨立形象。更重要的是，「中國之春」不是一個同仁雜誌，她是新成立的民主團體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應反映整個團體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意向。如雜誌在這個實質問題上出現偏差，就要及時而果斷地加以糾正。

●問題發生在哪裏？●

港版十一期的編排在如下諸點有明顯右傾，或至少與中國民聯的宗旨不符。

第一、封面設計。港版十一期的封面說明是「蔣經國在人民大會堂？」，其設計為：蔣經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席台正位向萬人揮手，其旁為趙紫

陽，其右後為鄧小平（見圖一）。該設計為政治漫畫型，可理解為國民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獲得成功，趙紫陽、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受三民主義感召而歡迎蔣經國回大陸主政；也可理解為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挑戰成功，蔣經國回大陸屈任副職而受到歡迎。或許有人要問，既然對該圖的評定見仁見智，為何編輯部做出它有右傾傾向的結論呢？這種結論的做出乃基於下述兩個理由。其一，蔣經國居正中的主宰位置，趙、鄧完全成為陪襯，難以理解為蔣經國屈任副職；其二，港版十一期封三下面的圖片為一報紙剪貼，其說明是「台灣對中共統一呼籲的回應」。——報紙的大標題為「蔣夫人給鄧穎超公開信，勸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圖二）。這種對應的總效果，給人的印象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變相宣傳和明顯的親台灣傾向。

第二、封二及封三的圖片說明。港版十一期的封二（圖三）上面，刊登了鄧小平最近視察經濟特區的二幅圖片。在圖片的說明上，鄧小平名字前未冠以任何稱呼，而且，「鄧小平學習華國鋒到處題辭」之註解帶有明顯的貶意。反觀封三（圖二）的反映台灣新聞的圖片說明，在蔣經國前和李登輝前則有總統、副總統的名銜。這種圖片處理，下意識地給人以台灣為正統的概念。

第三、「卷首語」中的用詞。港版十一期「卷首語」中「共產黨在國內搞一黨獨裁、國民黨在台

灣也是長期執政」的提法（見圖四），與中國之春第一次記者會上的表態「如果說大陸是一黨專政，台灣則是一黨獨大」有原則區別。一黨獨裁絕對不是民主政治，而一黨長期執政並不能說明不是民主政體。日本的自民黨長期執政，但政治學家都承認日本政體是民主政體。港版十一期「卷首語」的上述提法，有意無意地將中國之春的一貫立場向右移了位（參閱「中國之春」雜誌第十期對台灣政局的分析）。

綜觀整本港版十一期雜誌，與前十期雜誌比，人們的感覺是「中國之春」雜誌變了，趨向於明顯親台傾向，有人說「中國之春」悄悄變成了「台灣之春」。

●問題發生的原因●

為什麼會出現港版第十一期雜誌的偏差呢？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前後，「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決定擴大理論版面，並為降低成本而將部分業務（印刷、香港發行等）轉移至香港。如此，「中國之春」編輯部在香港開設了分部，聘僱了人員負責徵集香港理論和政論性稿件，以及負責雜誌的印刷和部份地區的發行工作。為推展業務，「中國之春」編輯部和香港受僱人員簽訂了嚴格的合約。實際上，編輯部本部仍在

紐約，並負責審編工作。在二月上旬，紐約編輯部本部將大部已審好、編好的稿件交付香港分部印刷。由於時間緊迫，紐約編輯部本部未來得及審查香港分部聘人所做的封面、封二、封三和封底的设计，也未來得及審查香港臨時草就的「卷頭語」和少許時評性文章。中國民聯總部負責人當時誤認爲，只要把住主幹文章的大方向，即可把握雜誌的立場，從而忽略了部分編務工作。香港分部受僱人員於三月一日印好了第十一期，並且在香港上市了市，同時，將北美所需的雜誌運往紐約等地。三月六日紐約編輯部接到由香港運來的第十一期後，在紐約總部的編委同志，立即察覺出問題，即令各地停發港版第十一期，並著手重編該期雜誌。

所以，問題的出現有以下原因：一、香港聘請的人員未能深切體會中國民聯的政治立場，在具體事務中，一些人員自覺不自覺地將個人的意念加在雜誌上；也許聘僱人員主觀上並不是有意傾向台灣，而是爲了擴大銷量別出新裁，或下意識地迎合海外大批親台僑胞的口味，但無論如何，該期雜誌與中國之春所主張的一貫立場是不符的；二、紐約編輯部本部未盡其責；三、中國民聯負責人在開設香港分部後，未能有效地督查分部工作，並使之清楚地了解本團體之立場及觀念。對於以上所出現的問題，由「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和「中國民聯」總部負責人負主要責任。

●重申中國民聯及「中國之春」的立場●

自「中國之春」雜誌創刊發行及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開展至中國民聯的正式成立，我們的立場是始終如一的，那就是堅持獨立自主，不依附於現有的任何政治勢力。可是，這一立場在過去屢遭歪曲，在某些人眼中，「中國之春」自始至終是台灣國民黨支持的。

使某些人產生這種錯覺的原因是複雜的，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使用各種手段極力把「中國之春」國民黨方面推。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在去年十月份訪問法國時，就竭力散佈「中國之春」是台灣方面炮製出來的。中國共產黨還通過他們影響的海外報刊，造謠「中國之春」成員在「中國之春」創刊前就密訪過台灣

等等，造成中國之春依附台灣的假象。

另外，國民黨的某些人，他們千方百計地把「中國之春」往台灣方面拉，企圖把「中國之春」納入他們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軌道，最終併入他們的反共陣營。這些國民黨人首先採取「迫其就範」的政策，在宣傳上造成「中國之春」與國民黨同爲一體的印象，對此，我們曾在中國之春雜誌第七期上予以說明。當他們發現「中國之春」主要決策者未能就範時，就試圖在中國之春內部扶植其代理人取而代之。爲此，他們曾策動某「中國之春」成員在去年雙十節時密訪台灣，幸好被我們及時發現而做出決議，停止了該成員的職務。令我們遺憾的是，某些國民黨人始終不接受教訓，最近又不知通過什麼途徑把參加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某代表請到了台灣，進行了一番大規模的宣傳，而且在宣傳時，大肆宣染他是「中春一大」代表，再次把中國之春與國民黨一廂情願地連在一起，這些做法的總效果，是使中國大陸留學生越來越懷疑中國之春的獨立性。

更令我們痛心的是，在國共兩黨一拉一推的形勢下，極個別自稱「中立派」的人士眼看一個獨立政治力量的幼芽已在風吹雨打中站起，不知是出於糊塗，還是出自防衛心理，也湊國共的熱鬧，時而冷嘲熱諷，時而踏上一腳。由於其標榜「中立」，對「中國之春」的損害實比國共兩黨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年多的經歷使我們深深體會到，在國共兩強的夾縫中生存和成長是極爲艱苦的，我們需要大家的理解，需要大家的支持。中國民主之幼苗是多麼需要大家的扶植啊！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以及由她延伸出來的中國民聯，在一系列文件中表明了她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在這裏，我們願重申我們的一貫立場及觀點：

第一、我們的理想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最後用民主政體取代專制制度。完全依靠國共兩黨難於達成上述目標，爲此，中國需要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興起。

第二、中國形成新獨立政治力量的時機漸逐成熟。現在是廣泛宣傳這一觀念並將具有同樣觀念的散在個體和弱小力量逐漸匯集成一股勢力的時候了。新的獨立政治力量壯大到一定程度時，便可起到

制衡執政黨的作用。當各種政治實體通過和平競爭，用選票而不是用槍桿決定他們的政治選擇時，民主政體便已讓人民初步確立。

第三、中國民聯並不認爲是新的獨立政治力量的代表，我們認爲是這股分散力量中的小小一股，我們願起拋磚引玉的作用。我們的工作在於推動這股散在力量的大聯合、大統一。在實際運作中，我們公開宣稱要團結國共兩黨內部開明的、民主的力量，團結了他們，也就是壯大了自身。

第四、實現任何一個政治理想都必須正視現實，承認現實。我們承認中國現有的兩大政治實體——共產黨和國民黨，尊重他們的政治信仰。但是，我們也希望國共兩黨能夠尊重我們的觀點和立場，尊重我們的獨立選擇。

第五、對於大陸共產黨政體和台灣國民黨政體，我們曾一再表明我們的看法。如果有些人不明白，我們願再一次的申明。我們認爲，中國大陸是極權主義政體（TOTALITARIAN SYSTEM），台灣則是權力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 SYSTEM）。在民主化進程上，台灣在若干方面已領先於大陸，但要達到民主政體的程度，尚需突破幾個政治瓶頸。中國共產黨近來實行的經濟開放政策，我們是支持和歡迎的，它在客觀上有助於中國的進步。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收緊和搖擺，與其經濟開放政策是相矛盾的，阻礙了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程，對此，我們也要提出批評和警告。

今後，對於國共兩黨任何一點的進步和開明，我們都將繼續予以肯定；對於他們阻礙民主進程的任何做法都會提出批評和建議。

在這一原則下，「中國之春」雜誌登一兩篇肯定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的文章，並不意味著中國民聯被共產黨招安；反之，登幾篇贊揚台灣經濟建設成果的報導，也不意味著被國民黨收買。只要大家理解了上述原則，就不會誤解中國民聯的一貫立場了。

●用實際行動捍衛獨立形象和獨立立場●

一再標榜獨立是無濟於事的，只有用具體的行動加以證明，即所謂聽其言，觀其行。

過去，當我們察覺某成員被台灣國民黨策動而赴台時，我們採取了斷然措施，停止了他的職務。今天，我們發現港版第十一期雜誌有親台右傾味道，也毫不猶豫地決定編排重印，以正視聽。今後，我們還會面臨更複雜的局面，我們將不斷用類似的行動，而不只是用語言向世人表明中國民聯及其機關刊物「中國之春」的原則立場。

當然，我們也要指出，中國民聯既然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民主團體，就不可能要求純之又純。個別成員的行動和言論，均由其個人負責，不代表整個團體。過去曾經發生，今後也能發生的個別成員投台或投共，都是其個人的選擇。我們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但有一點應予強調的是，正因為是個人的選擇，以此做文章來攻擊整個團體也就是徒勞的了。共產黨出了吳榮根、國民黨出了馬璧，都不代表其整個黨的立場有了轉變。我們和國共兩黨的原則差別則在於，我們尊重個別成員的立場轉變，尊重個體的自由選擇，我們從來不指責他們為叛徒，更不是設法去消滅他，而是認為，他們只不過是選擇了另外的人生道路，他們雖然離開了原來的團體，我們還會以和平共存的方式，共容於一個社會之中。

事業是艱難的，但我們有決心繼續探索下去；獨立形象是難於維持的，但我們願用生命捍衛她。歷史上將留下兩個版本的第十一期「中國之春」雜誌，這兩個版本的對照，將是中國民聯獨立立場的有力證明。

最後，我們僅向讀者因十一期問題造成的不便致以歉意。

附圖：第八頁

圖一、港版十一期封面。

圖二、港版十一期封三。

圖三、港版十一期封二。

圖四、港版十一期之卷頭語。



我們為什麼要和台灣 海峽兩岸公開接觸？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紐約發起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成立「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剛滿一年多。在這一年裡，我們的政策和政治主張，都有其一貫性和連續性。

最近「中國民聯」作出決議，願意和台灣海峽兩岸國共兩黨政權以及香港政府，作初步的、公開的接觸。

接觸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溝通觀念和認識。

第二、爭取「中國之春」在兩岸發行和營業。

第三、表達「中國民聯」希望能派員到台灣海峽兩岸旅行和考察的願望。

第四、爭取「中國民聯」在台灣海峽兩岸以及香港取得合法社團的地位。

我們為什麼希望接觸？

首先，中國民聯要推動的是中國民主政治，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事業，中國民聯不是一個秘密團體，我們的政治主張，政策和策略都沒有任何秘密。

之所以見諸文字，公諸於衆，是因為我們願意和全體中國人民交流我們的看法，願意和中國任何政黨和民衆社團交換意見，唯有通過交流，才能互相了解，唯有加深了解，才能相互協商，得出均衡的解決辦法。今日的世界政治正在走向理性。中國的政治，也唯有走向理性才有新的起點，我們不能苟同中國國民黨的「三不政策」，這是鴛鴦政策。閉關自守不利于國家的統一，只會加深隔閡加深仇恨。

其次的理由是，中國民聯推行的是合法的政治

。我們尊重客觀事實，我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以及香港政府的法律，儘管這些法律都有着不合理的地方。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合法而不合理的。我們敢于承認既成事實，是因為這樣才能改造它，感情用事，用偏激來對付極端都是無濟於事的。謾罵和阻撓是落後政治的特色，最終會被世界潮流所拋棄，最終會被中國人民所拋棄。

最後，中國民聯的大多數成員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民國公民；我們所說所寫的，都有關於中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和台灣海峽兩岸接觸，爭取一個公民應有的公民權利。同時，我們覺得這也是對北京和台北的一個政治上的考驗，考驗那一方更尊重法制，哪一方更尊重民主，哪一方更有理性，哪一方更有決大黨的風度。

當然，申請的權利在我們，批准的權利却在各方的政府。但是批不批准，都應該說清楚，應該有個交待。因此，接觸是第一步。不要害怕接觸，我們不是老虎，不是怪物，只是一群關心國家，並把關心付諸於行動的中國人。連跟我們這些手無寸鐵人說上句話都不敢，還談何去「統戰」荷槍實彈的對立面呢？

目前中國民聯正在組織首次接觸的人選。

如果國共兩黨能拿出誠意來，如果海內外各民衆團體都拿出誠意來，則中國的政治幸甚，民主政治幸甚。

我們隨時準備和各方面人士談話，談出成果來最好，談不出也無妨。談了，總是有利於觀念的溝通有利於彼此了解。讓我們走出這接觸的第一步吧！

中國之春

一九八四年三月號

第十一期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

目錄

堅決維護「中國之春」的獨立

——就重印「中國之春」第十一期告讀者……………「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3

社論：我們為什麼願意和海峽兩岸公開接觸？…………… 5

中國之春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迎來趙紫陽總理訪美……………本刊評論員 9

國內快訊

北京「元帥」銜頭爭奪戰…………… 曉楓 10

思想論壇

科學民主主義提綱…………… 國內理論小組供稿 13

大陸專欄

說異化…………… 怡文 23

胡喬木向周揚、王若水開火…………… 本刊資料室 25

給走狗…………… 范公 28

務實與務虛…………… 黃迪 29

彭德懷故居題詞…………… 金立仁 31

僑社專欄

陳若曦女士談文學政治…………… 本刊記者 32

老華僑的心聲…………… 老華僑 33

問題與觀念…………… 江心 41

經濟問題 爭鳴園地

論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林超 44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N. Y. 10185. Tel: (212) 728-7008

	現階段農業如何實行計劃經濟	官希浩 48
	中國農村社會的今天與明天	桑梓 51
香港問題 爭鳴園地	香港可以組黨自治?	蘇微言 56
	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主、治權後香港能否保持繁榮?	司徒港人 57
	英國政府能否代表香港民意	陳剛 60
文藝園地	老Q新傳(小說續完)	伯仁 61
	雲的惆悵	華旒 68
	新移民尋根記	雁子 39
	上訪閻王爺	「民心」 69

懷念故鄉 照片專輯

本刊資料室 33

封面：夾縫中的堅持 本刊資料室

封底：這不是前朝，是今日 本刊資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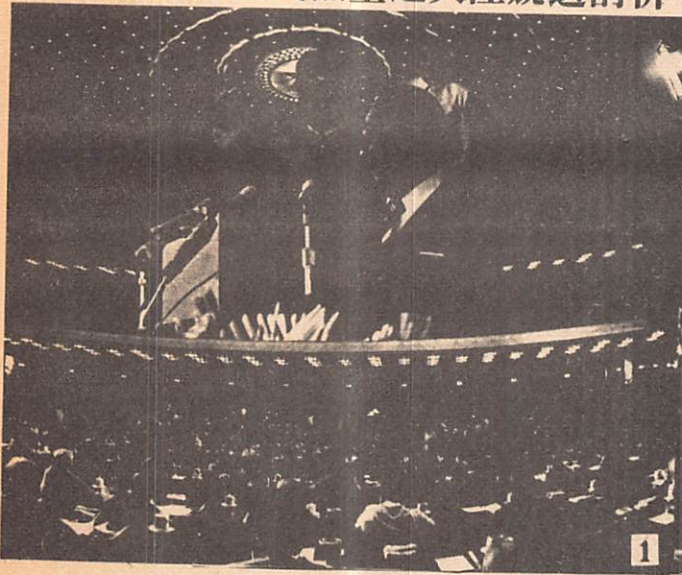
封二：國內生活一瞥（一） 本刊資料室

封三：國內生活一瞥（二） 本刊資料室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論「堅持黨的領導」 台灣此時不應談組黨？ 中共將容許國民黨重返大陸競選剖析



1

圖一：港版第十一期封面
圖二：港版第十一期封三
圖三：港版第十一期封二
圖四：港版第十一期卷首語

卷首語



本期從這一期起大事新聞，除了在編排上新穎的版式外，更將邀請大量資深時事評論員撰寫專欄，更將邀請大量資深時事評論員撰寫專欄，更將邀請大量資深時事評論員撰寫專欄...

右圖一文，就對目前兩岸關係的現狀，作了比較詳盡的分析。這就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提出比較具體的建議。這就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提出比較具體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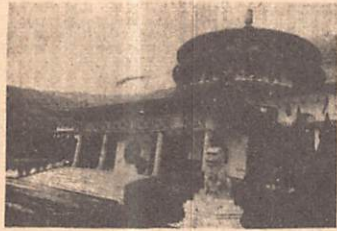
副總統的李登輝

獲選第七任總統的蔣經國



1984年2月13日召開有九百餘人出席的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会

在台灣的國民大會一屆七次會議於二月廿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開



台灣對中共統一呼籲的回應

信開公超穎鄧給人夫蔣 國中一統主義三服信勸

耳在猶言情國國中合不義主產共出指重鄧理總
衷由出言能希羣超解識途前家國對曾日昔生先



鄧小平舉國華團到處題詞



鄧小平在廈門參觀陳嘉庚故居



紅場在舉行安德羅波夫喪禮



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逝世的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



契爾年科為安德羅波夫喪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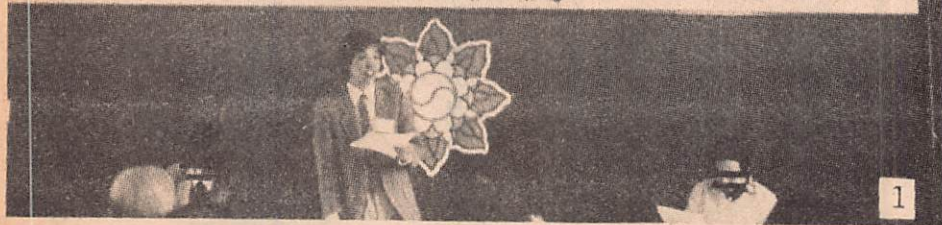
蘇共新總書記契爾年科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A SPRING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1983 12 27-30

美國 紐約



「中國之春」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迎來趙紫陽總理訪美

· 本刊記者 ·

今年元月十日，在美國華盛頓的白宮門前出現了一條醒目的橫幅標語：「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召開迎接趙紫陽總理訪美」。這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官式訪美以來，唯一對之表示歡迎的華人政治團體。

在白宮門前，中國之春的成員向中國代表團廣泛散發了傳單，還向他們作了宣傳。有的代表團成員開始不敢接受宣傳品，回去請示領導後又復出來索取。有的中國代表團的成員還與中國之春的成員們交談。中國之春成員們對代表團成員說：「我們有很多是國內留學生，我們的所為是要使中國盡早達成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目標」。對此，中國代表團的同志表示同意和支持，但亦有所禁忌地問：「你們這種作法會不會讓外國人笑話我們？」中國之春的成員回答說：「外國友人絕不會嘲笑要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做法，倒是在現代文明

的日子裡中國仍沒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這對我們的國家才是最大的嘲諷。」中國之春成員繼續說，「我們要求見趙紫陽總理，我們中有不少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公、自費留學生，作為中國公民，我們有權參與國事；作為中國留學生，我們要求向本國總理反映情況是合法合理的。」中國之春的成員把給趙紫陽總理的信和有關於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文獻交給了中國代表團。

在趙紫陽訪問美國期間，我們了解到，一些國內羣衆、中國駐外工作人員、中國留學生及學者對趙紫陽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印象：慎言寡語，少空談政治，一張嘴就談中國的經濟，如工業、農業如何，商業如何，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問題等等。人們說，他數說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好像數弄家裡的油鹽柴米，鍋碗瓢盆。還有許多人把他譽為中國經濟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異化論」的首腦。趙紫陽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日高一日，人民希望有更多的紫陽式經濟務實人物管理國家，而不希望有更多的政治投機家。

中國之春對於趙紫陽總理訪美，公開表示歡迎。中國共產黨內的經濟改革派在短短幾年便做出了顯著的成績，我們肯定他們的經濟調整政策是一種進步的政策，同時也應指出，光有經濟調整還不夠，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途徑是體制改革，是法治。中國之春主張在中國施行以市場經濟為主，計劃經濟為輔的多元化經濟，並以司法獨立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益。目前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着開明與保守勢力的激烈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中國之春堅決支持開明派的務實政策，堅決反對保守派勢力的進攻。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曾在不同場合表示要與國民黨和平共處，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談，為什麼就不敢同中國之春坐在一起談呢？為什麼就不能容得這批懷有赤子之心的青年回國同共產黨一起改造中國呢？其實，中國開明派搞開放政策，如果步子邁得再大一點，改革再徹底一點，也就與中國之春所主張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近乎一致了。我們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能與我們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談談，共同商討國策，建設偉大的中國。

北京「元帥」銜頭爭奪戰

曉楓

自從打倒了「四人幫」，鄧小平上台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直在進行「整頓」，這場全面的「整軍」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到現在已經七年，其中經歷了好幾個階段，其中主要內容包括五大部份：(一)軍隊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二)改革兵役制。(三)實行精兵簡政。(四)武器裝備現代化。(五)改革軍隊訓練。最近，又爆出重大新聞，引起了海內外的注視，令世界各個關心和研究中國政治和軍事的國家和集團為之側目。這個新聞就是恢復軍銜制。

●●●●● 第一家報導

首先報導這項消息的是「中國之春」雜誌。早在一九八三年「中國之春」第八期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發表以後，在新聞界和輿論中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只有在美國加州出版的一份中文週報「論壇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其他報人們和記者們太大意了，輕易地放過了一條當時大有發掘價值的重要新聞（三個月後華文報紙才公佈了這個消息）。但當時某些外國的中國軍事問題專家和評論家，馬上有了反應，打電話進行了採訪詢問。跟著的反應是來自中國大陸，去年年底，一名身份不明的大陸來人來到紐約，進行了秘密的調查，到底是誰把恢

復軍銜制等消息洩露給中國之春？可惜，他是徒勞無功地回去了。

●●●●● 名單將提前公佈

最近，我們又得到確鑿的消息說，軍銜的正式頒佈，將從一九八五年提前到今年八月一日。來自北京軍區大院的消息來源說，由於種種的因素，中央軍委已經決定在今年的八月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建軍節」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歷史上最大規模、最現代化的盛大閱兵典禮，並公佈恢復軍銜制的第一批元帥和將軍名單。這個決定的實際意義就是：一九八四年的八月一日，將把一批「文化大革命」後最有權勢的軍人頭目從軍階上固定下來。

這個新聞馬上瘋魔了北京機關大院和軍幹子弟。各種預測、各種傳聞正在秘密流傳：誰將是今年登上天安門閱兵台上的元帥？這份名單會不會引起軍界的新的權位之爭？

關於這些，我們還得從頭分析起。

●●●●● 「舊」元帥將昇為大元帥

早在廿八年前，中國共產黨學習蘇聯的軍銜制

，在一九五五年任命了十個元帥、十個大將。

十個元帥是：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這十個元帥除了朱德、羅榮桓病死，林彪外逃摔死之外，彭德懷、賀龍、陳毅都是含冤而死，現在剩下來是老態龍鍾的四人：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徐向前。

這四個人何去何從？使鄧小平頗為頭痛，要「去」吧，這四個人都在軍內「德高望重」，誰也沒有天大的膽子叫他們「去」，要「留」吧，占住茅坑不拉屎，下面的人上不來。於是有人出了個妙主意，把他們封為「大元帥」，這樣一來，下面的人也可以過過「元帥」的癮了。這樣兩全其美的提議一下子就為各方面所稱道，似乎已成定局。

當然「大元帥」這個名稱也還有一個問題：因為一九五五年時，彭德懷曾建議學蘇聯授斯大林大元帥之稱，也授毛澤東為大元帥，却遭到毛澤東的駁斥。不過，現在老毛已死，何況也不是「最高指示」，「一句句是真理」的時候了，鄧小平大可以置之不顧。

因此，今年「八一」建軍節，葉帥、劉帥、徐帥、聶帥會以四個「大元帥」身份，被護士「扶」著上天安門了。

最後一個難題是：鄧小平本人要不要也當上大

元帥？因為他是軍委主席，又是以前「二野」的政委，理所當然地也應該是。據說鄧小平對大元帥一銜也是津津樂道，楊尚昆等一批忠臣又大力勸進，在此情況下，鄧小平成爲第一大元帥的可能性極大。

誰會在「八一」當上元帥？

「大元帥」之爭可能周折不大。真正令人注目的，却是下面誰會爬上元帥寶座的問題。

上面我們提到的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軍銜制時曾授了十個大將，他們的名字是陳庚、粟裕、羅瑞卿、王樹聲、譚政、黃克誠、許光達、徐海東、蕭勁光和張雲逸。在他們之中，老死的老死，病故的病故，被毛澤東、林彪整死的整死，目前只剩下三個：譚政、黃克誠和蕭勁光。按理這三個人順升爲元帥，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他們三人的元帥「運」，還在鄧小平手裏掌握著。

況且，這三個「大將」，並不足以佔滿了元帥額位，誰還有一爭的可能呢？就看原來的「上將」了。

目前尚在世的「上將」有些什麼人呢？計有：政治局委員王震、國防部長張愛萍、總參謀長楊得志、政協副主席楊成武、人大副委員長章國清、人大副委員長韓先楚、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許世友、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傳鍾、國防部副部長蕭克、政協副主席蕭華、副總參謀長伍修權、總後勤部政委王平、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中央軍委常委李志民、原鐵道兵司令呂正操、原任武漢軍區司令和鐵道兵司令陳再道、原防化兵司令陳世榮、蘭州軍區司令鄭維山、新疆軍區司令劉震、原總後勤部長張震、原副總參謀長李達、原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還有因林彪四人幫事件尚在拘禁的黃永勝、張宗遜和冼恒漢。

這些人裏頭，除了黃永勝、張宗遜、冼恒漢之外，個個都有資歷順升爲元帥，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有人曾提出一案：採取「一刀齊」政策，即原有上將一律升爲元帥。中國大陸在定技術職稱、升工資時最拿手的就是「一刀齊」。如一九五六年前畢業的統升爲副教授，六一年以前畢業的統升爲講

師等等。升元帥也來個「一刀齊」，問題就多了，一是人數太多，二是鄧小平、楊尚昆等並不願將他們不喜歡的上將都擢爲元帥。鄧曾設想過一個方案，即目前不在軍職而掛行政職務的上將都不升元帥，這樣一來，蕭華、楊成武、章國清等鄧小平的政敵都可以排斥在外了。

按目前機關大院裏輿論預測，以王震、張愛萍、楊得志、王平、宋時輪等的呼聲最高，伍修權、許世友、呂正操等人次之，其他人均不弱。

低銜的要爭元帥，「無銜」的也要爭銜

除了原來的「大將」、「上將」之外，還有一批在一九五五年沒有授予軍銜的文官、黨官，現在正高據軍界的要位，這些人也在虎視眈眈。其代表人物是現任軍委常務副主席、軍委秘書長楊尚昆。楊是現任軍中除鄧小平外的第二號實權人物，文革前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現在，據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透露，鄧小平已決心鞏固和加強楊尚昆的地位，以便爲其百年之後做準備，因此，楊尚昆極有可能登上第一元帥的寶座。

還有三個人物非常引人注意，是否能擠入元帥之列，已成幾個總辦大院議論課題。這三個人物是余秋里、洪學智和李德生。

余秋里在一九五五年時授予中將銜，但很快脫離軍隊，被毛澤東、周恩來重用於石油工業系統，對開發我國石油工業頗有貢獻。余以此一直扶搖直上，成爲政治局委員，並在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三朝均被重用。余秋里在章國清下台後，出人意料地以平衡人物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和軍委副秘書長。論現在的黨內及軍內地位，余秋里完全可獲元帥銜，因建國後第一任解放軍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就是元帥，但按論資排輩，余秋里原來只是個中將，一下子跳入元帥，很多上將就不服氣了。

洪學智現任總後勤部長、副總參謀長和軍委副秘書長，爲鄧小平之嫡系和軍中實力派人物。洪學智原官拜中將，此次也有心擠入元帥之列，然而一般的揣測是，洪學智儘管有老鄧的保駕，頂多能弄個大將當當，他當元帥的可能性還小於余秋里。最令鄧小平、楊尚昆頭痛的大概是李德生。李德生一九五五年時只得少將軍銜，但由於文革中走

紅，目前高居政治局委員、瀋陽軍區司令要職，但是所有少將中職務最高者，連很多大將、上將、中將都望塵莫及。目前十大軍區司令中，僅李德生一人在政治局。按實際地位李德生理應升成元帥，但鄧小平是不會答應的，他正尋找合適地理由阻止李的升遷。

據中央軍委一名高幹子弟講，鄧小平曾和一些老軍頭們商議過，原上將級以上的人這次才有資格升爲元帥，原中將至多升爲大將，原少將至多升爲上將。這種方案可以大大限制李德生在軍中的地位。此方案行得通否，就看這幾個月的角鬥了。

鄧小平的一盤棋

姑無論未來的元帥「帥位」之爭，抑或跟著而來的「將位」之爭，也無論目前各有機會者如何磨拳擦掌，也不能掩蓋隱藏在背後的最大背景：那就是鄧小平正在逐步達成他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軍銜」的頒佈，只不過是在名份上把他的計劃固定下來而已。

自從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復出以後，他就眼睛看着軍權，他總結了毛澤東幾十年來治黨的經驗，也得出了劉少奇和他被整肅的教訓，歸根結底一條：「槍桿子裏出政權」。血和監牢最能教育人，因此他一旦復出，什麼位都可以讓，黨主席可以讓，國家主席可以讓，唯獨軍委主席不能讓。不單這個位不能讓，這個位下面的整個系統也要換上一「自己人」。

爲了這一局棋，鄧小平走了兩步。

第一步：自下而上奪最高統帥權。

這一步從一九七七年七月始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止。

首先是整肅和隔離一大批與林彪、四人幫有關的高級將領，以威懾人心。這批人有副總參謀長胡煒、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總後勤部長張宗遜、國防科委政委陶魯茄、海軍政委王宏坤、空軍司令馬寧、政委傅傳作、瀋陽軍區政委毛遠新、南京軍區司令丁盛、成都軍區司令劉興元、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

繼而換馬三大總部，以掃清道路。除自己兼任總參謀長外，任親信楊勇為副參謀總長，張震為總後勤部長，任舊屬章國清為總政治部主任，從而改變五十年來由紅一方面等勢力對「三大總部」的領導地位，將三大總部逐步納入了自己的系統。

最後借清除「凡是派」之機，在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批判華國鋒，同年九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逼使華辭去國務院總理，十二月進而停止華主持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職權，終於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正式罷免了華的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鄧小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

第二步：自上而下大換班。

鄧一旦接收最高軍權，便著手安排下一步。首先是提出了「體制改革」，製造輿論準備。並且在「體制改革」之前，對決策機構「軍委」和「國防部」進行局部的人事調整，從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二年九月，把粟裕、耿飈、楊尚昆、余秋里、張愛萍提了上來，為全面換班作好準備。

從一九八二年九月起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全面的整頓，調整的棋子便紛紛下到棋盤上了，調整之大，震驚中外軍事觀察家。在這短短一年裏，先後的人事調動如次：

任命楊尚昆為軍委常委、軍委常務副主理兼軍委秘書長、楊得志為軍委副秘書長兼總參謀長、余秋里為軍委副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洪學智為軍委副秘書長仍兼總後勤部長、張愛萍為軍委副秘書長兼國防部長、徐信為副總參謀長、劉華清為海軍司令員、賀進恒為第二砲兵司令員、劉立封為政委、向守志為南京軍區司令員、江擁輝為福州軍區司令員、尤太忠為廣州軍區司令員、周世忠為武漢軍區司令員、王誠漢為成都軍區司令員、萬海峰為政委、鄭維山為蘭州軍區司令員、譚友林為政委、傅崇碧為北京軍區政委、陳仁洪為海南軍區政委、謝振華為昆明軍區政委、劉振華為瀋陽軍區政委、譚善和為烏魯木齊軍區政委。

這種調整後的結果，大大加強了鄧小平的「自己人」勢力。包括海軍司令員劉華清、北京秦基偉、瀋陽李德生、南京向守志、廣州尤太忠、成都王

誠漢、蘭州鄭維山、武漢周世忠等七大軍區司令員，以及北京傅崇碧、南京郭林祥、昆明謝振華、成都萬海峰、烏魯木齊譚善和等五大軍區政委，均屬原「二野」系統或原為「紅四方面軍」出身幹部。能夠下的掌有實際軍權的「棋子」都下去了，大局基本已定，鄧小平這才放出第三步的「空氣」：把權力的名份從軍銜上定下來！

另外，近兩年鄧也提拔了一大批三、四十歲的中青幹部到師、軍級崗位上來，這些人在一九五五年授銜時不少尚未入伍。現在，要使這批中青軍幹名正而言順，使他們成為軍中支持鄧派的基礎，最妙的辦法莫過於授與他們將軍的銜頭了。

總之，稍為明白的人都知，鄧小平是想借此授銜之機，把自己一派人的權位以法統的形式固定下來。

禍福相倚，四種潛伏症。

當然，看起來鄧小平的這幾步棋都下得似乎不錯，但是「福兮禍所伏」。定名位這個東西，非同小可。種種矛盾都可能隨時爆發，以至使「評銜」半途夭折。

1「大元帥」之職，可能增加幾巨頭之間的矛盾，特別是鄧小平和李先念之間的矛盾，鄧小平和幾個老帥之間的矛盾。葉劍英、劉伯承自從鄧厲行改革以來，早就改變了堅決支持鄧的態度，開始有了微言，這次更會採取制衡的作法。胡耀邦、趙紫陽、陳雲雖然希望不大，但是也會在中央常委審批時作出有利「自己人」的選擇。華國鋒「老實」又「不蠢」，在軍中也有不少同情者，明知無望而與風作浪，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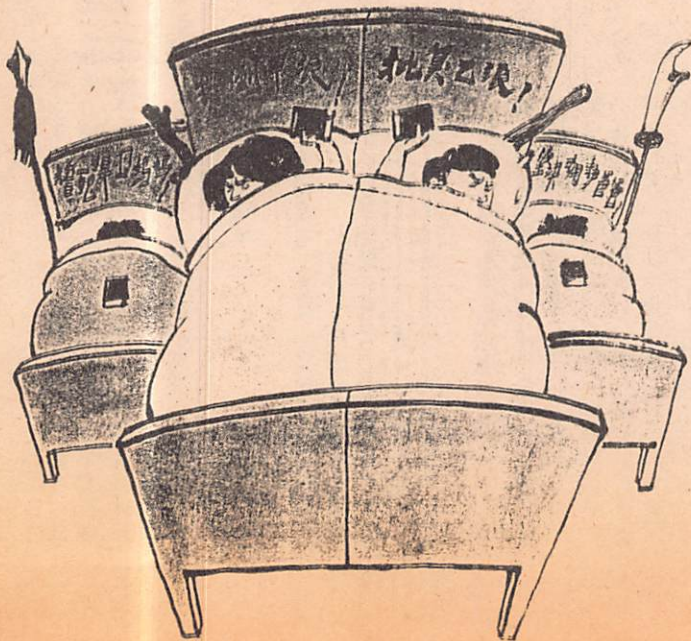
2「元帥」之職，將會是軍隊內各山頭的「決戰」，目前「四方面軍」和「二野」雖然連勝告捷，毛澤東的「一方面軍」、林彪的「四野」可是最強大的力量，自然會不甘罷休。

3軍中資歷老，但現在實權不大的人和軍中資歷較淺但現掌實權的人，是一種矛盾。五五年有軍銜的人和五五年無軍銜的人，又是一矛盾。例如許世友、陳再道等等「大老粗」，是不會服氣楊尚昆、余秋里這樣的「文官」爬到他們頭上的。

4「元帥」之銜誰屬？又直接影響到下面「大

將」、「上將」、「中將」的評定。現在的軍區司令員、副司令員，有的是原來的「上將」、「中將」，有的却是「少將」，甚至「大校」，有的軍師級幹部是最近鄧小平提倡「年輕化」才提上來的，三、四十多歲，毫無「軍銜」，這樣參差不齊的局面，將會令「評銜委員會」大為頭痛，而他們也自然會爭一長短，形成以後的新、老矛盾的隱患。

八月一日已經為期不遠了，這場權力角鬥的序幕已經打開，各方面研究中國問題專家，又將會把他們的眼光投到這張未出爐的「軍銜」名單上去。



同床異夢

科學民主主義提綱

國內《中國科學民主主義小組》

編者按：

我們向讀者鄭重推荐「科學民主主義提綱」一文。這篇文章，比較扼要而系統地分析了我國古代專制社會結構、中國大陸現有社會制度的性質及共產黨國家暴發革命的可能性。本文還對未來科學民主主義社會作了描述。文章雖長些，但立論明確、條理清楚、分析深刻，讀來並不乏味。更重要的事，本文較能代表中國當代民主運動中某些激進派人士的觀點，對研究當代中國民運思想理論的人來說，尤其值得一讀。海內外民運人士、廣大讀者及中國民聯成員讀完此文後有何心得，請函告我們。

在一種民主制度中受貧窮，也比在專制統治下享受所謂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樣。

—德謨克利特

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只有在人們能自由地信仰時才會繁榮起來。按照後來強加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一個依賴於這種虛假信仰的社會由於缺乏健康生長的科學，將不可避免地發生癱瘓，最後必定要自我毀滅。

—維納

序

共產黨國家發生了一連串舉目所瞻的事件，何

牙利暴亂、捷克「布拉格之春」、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中國天安門廣場事件、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這些事件像一縷縷曙光，預示着太陽升起——這是民主的太陽！

民主思潮在今天又站起來向稱雄一時的共產主義挑戰，這反映了共產黨國家的人民在心理上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意味着什麼？

是西方古典的民主主義幽靈又被召喚回來了嗎？

是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精神在半身不遂的共產主義制度的軀壳中復活了嗎？

西方傳統的民主主義認為，民主是人權，是人天生的、普遍的、抽象的權利的體現。民主產生於人本主義的人道和人性。這種人權的民主主義孕育了西方代議制民主政治。

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不是抽象的，它只是一種政治手段，是為階級的政治利益服務的。為了說明這一點，馬克思指出過壟斷資本的操縱常常使代議制民主在實際生活中成為騙局的事實。

對於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現代的「人道馬克思主義者」證明馬克思本人的民主概念實質上聯繫着「個人自由」，因而符合傳統的西方人道和人權主義。而「極端馬克思主義」者則反對這種說法。他們給馬克思的思想劃分出前後兩個不同階段。這樣，馬克思的民主概念一部分歸於人道主義的影響，而另一部分是專制主義的「成熟理論」。

共產黨國家中歷次民主事件的失敗，却證明了以往一切的民主理論在共產主義的專制鐵拳下是不堪一擊的。問題不容許人們僅僅回到西方古典民主主義中去。也不容許僅僅從「官方」馬克思主義回到「人道馬克思主義」中去。

民主思想需要一個新起點。

當今世界進入科學革命的時代，追求民主思想新起點的人們欣喜地發現：起源於西方的科學的結構世界觀，控制方法論和動態的結構認識論越來越成為現代人劈開思想頑石的利劍。在這時，人們開始覺得存在着某種擺脫的觀念危機的希望。

新科學思想給社會學、民主理論帶來了什麼呢？

以往東方人理解的西方論及民主問題的社會學，都是從「本體論」的哲學立場出發，在那裡，概念沒有一個不是從某種絕對本原（例如「物質」「精神」或「人的本性」）或絕對超律中推尋出來的。

現代科學的思維精神是一種「結構」哲學，它拋開「本體論」的起點，乾脆就把世界看成是在我們的認識結構中展現的世界，它把無窮無盡的本原的追溯和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的追求却看成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不在乎追求基本元素的數量，而着重於研究結構的內部機制。它認為觀念不過是主體向客體命名和規定的產物。人類的認識既不是被動地反映客觀世界秩序（像唯物論的反映論那樣），也不是先驗地存在於頭腦之中（像唯心論的先驗論那樣）。人類是逐步地運用理性不斷建構着新的

思想規範，而思想的真理性僅僅在各種觀念與現實在一定層次的復合中體現出來。

人們可以從中意識到一個新的立場，超驗地建構的，整體結構式的（不是主體式的）從相對程度上把握的，從或然上判斷的（不是因果必然式的）一種認識論新規範。

這是一個世界觀的革命。

現代科學的思維精神啟迪着我們，先驗地規定一個社會本原，看來是不必要的，超驗地建構成一個社會結構思想，然後以它來復合現實，看來是可行的。

這就是新起點。

對於這樣的民主理論研究，我們稱之為科學民主主義，或按通常的劃分稱之為結構主義的民主主義。

共產主義世界中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機。在科學民主主義看來，共產黨國家中的民主運動，應該是立足於現代科學的世界觀，并孕育着未來新社會的萌芽。

中國的科學民主主義者立足於自己的社會，着重於對現存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研究，探求一條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

一、科學民主主義的歷史——社會觀

A 對馬克思主義唯物一元史觀的批判

唯物二元史觀是經濟一元史觀和單錢發展史觀。唯物史觀認為：一切社會史都是階級（經濟利益集團）的鬥爭史。它之所以特別着重階級鬥爭，是因為：「一切政治文化的歷史現象都可以在經濟生產方式中找到最後的原因」。因此，經濟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反駁唯物史觀的人有理由說：一切經濟生產的歷史現象也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政治和思想的烙印，也都同樣可以在政治形態和思想形態的方式中找到深刻的淵源。例如歐洲資本主義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發展，那為什麼不可以認為政治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呢？現代科學革命喚起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產力，并推動着生產方式

的變革，那為什麼不可以認為思想形態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呢？

那麼，究竟是那一種因素在成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呢？

問題不能按照這種一元論的提法來回答。

果然，在如此豐富多彩複雜變化的社會結構中，妄圖尋找出一種佔主導地位的原動力，是偏廢徒勞的。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都必然按照一條單一的循序漸進的秩序去發展：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他們將之美稱為「社會發展規律」。對於這種觀點，用不着我們多費唇舌，世界各民族社會發展的多樣性多線性，已用歷史事實駁倒了馬克思臆想出來的這種「規律」。

唯物史觀極其輕蔑地對待那些將歷史發展純粹歸結於偶然因素的說法，但是，它否認不了一些偶然因素在歷史事件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作用）的事實。

那麼，歷史的必然性表現在那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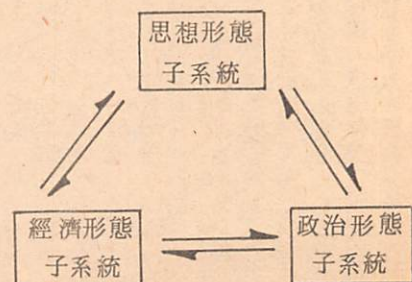
在科學結構世界觀看來，不應該像某些機遇論者那樣崇拜神秘的偶然，也不應該像必然論者那樣忽略偶然。從微觀上觀察，歷史是由大大小小的偶然因素堆砌而成；但從宏觀上觀察，那些偶然因素在作用機制中按其貢獻的大小表現出一個統計平均的效果。這個效果就是必然——人們可以觀測到的必然，概率統計表現出的偶然的必然。

社會結構內部機制的描述，無非是對天數偶然作用的總描述，歷史的必然性，無非是描述社會結構內部機制演化的連續性。

因此，我們總是避免把歷史事件「還原」到「最終原因」方面去描述（看起來它們都是偶然地插入歷史的），而力圖把它們放到一個結構和機制的背景上來描述它們。

科學的多元結構史觀向人們展示的是一個隨機但又是連續的歷史和一個將存在但又或然的未來。

在科學民主主義看來，人類社會是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政治形態、經濟形態和思想形態是互相作用的三個子系統。為了更形象地了解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用下面的圖解法來表示：



（說明：在社會分析中，我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劃分法，因為事實表明，馬克思主義的劃分是極不準確的，而往往是荒謬的，牽強附會的。）

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系統裡，思想、政治、經濟三類子系統相互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的，每一個子系統，都要求其他兩個子系統適應它在各自的範疇內取得主導地位，而排斥其他不符合其生存利益的各個範疇中的「異己物」。

例如：在自由社會中，自由競爭經濟在社會中佔主導地位，它也要求符合它本身生存利益的思想，政治形態在各自範疇中佔主導地位（「信仰自由」、「結社自由」、「議會民主」等等）而排斥不符合其本身生存利益的異己物（「壟斷經濟」、「思想專制」、「一黨專制」等等）。

又如：在「共產黨」當權的國家中，由於其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獨尊性、霸道性，所以它發展完善的社會結構是：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唯我獨尊，剝奪其他信仰自由），一個政黨（共產黨控制一切，剝奪人們的集合結社自由），一種經濟（共產官僚控制的經濟，剝奪各種經濟自由發展的可能）。

應當着重提出，在現實的社會中，並不是每個子系統在各自範疇內都能時刻「和平共處」，更多的則是處於激烈鬥爭的狀態。在每一個範疇內，佔主導地位的因素并非能永遠佔據優勢，在一定的條件下，其他因素也會發展起來爭奪主導地位；原來佔主導地位的因素本身也會發生變異的傾向，變異物也會向本來的霸主挑戰……每一種爭奪主導地位的因素却力圖在自己所屬的範疇內取得主導地位，都力圖在其他範疇中獲得同盟者，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取得支配地位，從而根本改變整個社會結構。

例如：西方的自由制度在封建社會的軀殼中生長出來的時候，是先有思想（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繼以發展到政治鬥爭，取得了政權後，才又反過來促進了思想和經濟的發展。

又如：共產黨取得社會的支配權的過程也是這樣：先有思想，後有一系列的政治鬥爭，取得政權後，才建立起符合其利益的經濟、思想的絕對統治。

又如：共產黨國家中的「共產主義民主改革派」，就是從官方的「馬列主義正統」中異化出來而向當權者挑戰的。

從純理論的邏輯上來說，每一個社會範疇中產生的變異，都可能發展到危及整個社會現存結構的生存，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原因是有些變異因素具有社會生命力，有些則沒有。

例如：在共產黨國家中持以復辟封建宗法秩序是沒有多大顛覆力的，因其沒有社會生命力；但鼓吹自由思想和制度，則大不相同了，必被視為洪水猛獸，當權者必為之恐懼，原因是有社會生命力。又如：在先進國家中鼓吹共產主義思想和制度，是沒有多少人響應的，原因也是其沒有社會生命力；但在落後國家的社會中，共產主義反而很有市場，原因是其有社會生命力。

概括地說，人類社會是一個大系統，它具有內在結構的特定模式。思想形態、經濟形態、政治形態是這個大系統中的三個子系統。這三個子系統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又互相獨立、互相制約的。每一個子系統，都力圖在自己的所屬範疇內取得支配地位，都力圖要求其他子系統來適應自己，每一個子系統所屬的範疇，都會產生變異的傾向——不斷產

生新的與原本佔主導地位因素相斥的變異物。這些變異物亦會力圖在各自範疇內爭奪主導地位。鬥爭的結果，或者是原本佔主導地位的因素戰勝爭奪主導地位的因素，社會便得以保持原來的基本形態；或者是變異物戰勝原本佔主導地位的因素，社會便帶來新的變化。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子系統能永遠決定性地作用於社會的。只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才會使某一子系統的因素在暫時地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站在科學結構觀的立場上，顯然就不可以繪出一切社會結構的統一的發展模式。因為各民族社會內部的結構各不相同，所受外部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各民族社會的歷史發展也就迥然不同。歷史的動因是多元的，歷史的面貌因而才是各異的。

這是一個多元的歷史觀和多綫發展的歷史觀。這就是科學民主主義的一般歷史觀——社會觀。

果然，這種歷史觀并不絕對排斥唯物史觀，而只是指出唯物史觀的片面性及因此造成曲解歷史現象的荒謬性。

B 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及其內部機制

唯物一元史觀的絕對化錯誤，在它對中國古代史的運用中表現得極為明顯。

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首先就可以發現被人稱為「封建生產關係」的經濟因素，并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那怕是就「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而言）。

中國自秦王朝以來，長期是作為一個官僚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存在的。這個國家有着完備發達的官僚統治與這種官僚統治相適應的大量的分散的脆弱的小生產經濟以及為官僚統治提供理論根據，被官僚政治「定於一尊」的正統思想形態——儒教學說。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中，恰恰是官僚（皇帝是最高官僚）與人民之間的政治聯繫大於純經濟的聯繫和純思想的聯繫，官僚集權政治籠罩着一切，束縛

着經濟和思想文化的任何獨立性發展。

在古代中國，商品生產的出現不是逐漸使官僚貴族衰落和商業化，而是政府不斷使商品生產官僚化，以致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新思想（包括外來的宗教思想）的出現不是把儒教正統摧毀，而是不斷被改造和同化，一同被拿去作官僚政治的武器。這種經濟形態的思想形態對政治形態的依附，在西方也許是罕見的，而在中國却實實在在地維持了兩千多年。

在古代中國，不但真正的封建制度發展不足，而且奴隸制經濟形態和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也同樣發展不足，充分發展的恰好是一個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實質上是一個被官僚政治嚴重控制着的、獨立性極小的經濟形態。不是它的變革和發展決定性地作用於政治，而是政治決定性地制約着它的發展和存在。

在中國大一統的社會結構中，官僚政治對經濟形態的影響是全面的強制性的，而且具有強大的親和吸附作用。官僚政治每次形式上的變化，總是迫使經濟和思想來適應它和鞏固它，這種適應又做成官僚政治的進一步發展（正反饋）；相反，經濟形態和思想形態發生變化，却總是被官僚政治的壓制和反向親和作用所抵消（只要沒有強大的外來干擾），總是一再地回到與官僚政治適應的狀態（負反饋）。

在這種社會結構的內部機制作用下，社會的歷史進程呈現的效應是：不是經濟決定歷史，而是政治決定歷史；不是生產方式革命性地發展，而是王朝戲劇性地更換；不是經濟開放，而是政治封閉；不是發展變化中的穩定，而是穩定中的振蕩。

難道這樣的社會結構可以與西方封建社會納入同一模式嗎？

這樣一個大一統的社會結構，與其稱為「封建社會」不如稱為官僚集權社會。

官僚集權社會每一次形式的變革，其導因與其說是經濟生產方式的要求，不如說是官僚集權統治的腐敗和削弱，造成經濟崩潰的結果。（當然更談不上是思想革命的原因）政治動蕩造成了社會混亂，生產破壞，異端並起，即所謂「禮崩樂壞」的局面。然而，即使到了社會維持不下去時，因為變革本身不是由經濟形態和思想形態的變革需要產

生的（長期被官僚政治控制約束的經濟思想一般無法生長出新的生命），因而，災變式的農民戰爭總是在政治上扶出新的官僚集權王朝。變化總是保留在形式的方面，原來社會結構的內部機制經過社會大破壞後又得到恢復。從社會機制的效應上來看，每次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却成爲官僚集權社會這種超穩定系統調節器。

二千多年的中國古代史可以說就是這樣一部官僚政治的變遷史。

C 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西方文明侵入中國，正處清朝末年，當時正是大一統集權社會又一次開始周期性的內部腐敗的時代。

這時的中國面臨着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結構解體

相當腐敗的清王朝一方面仍用強力抗拒外來力量 and 內部力量的打擊，另一方面也盡力發揮同化、親和作用；對新興的資本關係，它吸附和改造爲它所用的官僚資本（「洋務運動」）；對於輸入的西方文化，它採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方針；甚至由於西方政治形式的「輸入」，官僚政府的門面也掛上了「立憲」的招牌。但是，不管如何，官僚政治在舊軀殼中已不能再存活下去了。

那麼，新的歷史條件（西方入侵）能革命性地造就出一個新型的社會結構嗎？官僚政治能否代之以代議民主政治？官僚政府控制的小生產經濟能否代之以資本主義經濟？「名教綱常」能否代之以西方自由文化？一句話，政治起決定作用的社會結構能否改變成西方式的經濟起決定作用的社會結構？當時有不少先進的革命家思考過這個問題。

如果說，西方入侵能使中國社會系統具有更大的開放性，那麼舊的政治關係、經濟關係、思想關係，舊的社會機制，官僚政治統治的基礎就會有更大的動搖。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甚至包括思想因素）會通過官僚政治控制的削弱和民主主義政治萌芽的誕生來放大自己的作用，結構根本變革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洪秀全雖然披上了基督的外衣，但天朝不啻是一個新集權官僚政治的雛型。孫中山雖然舉

起了「三民主義」理想的旗幟，但那些對中國傳統文明死抱不放不放的軍閥、官僚和買辦、地主充斥滿了他的政黨。因此，「先政」只能在他的頭腦中放射出天才的閃光，而革命始終沒有造成社會結構根本解體的必然趨勢。

悲劇還在於：西方的入侵更多地表現在它的實用功能主義政策方面，而不是表現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新方式上。這種政策一方面用武器來協迫中國打開封閉的門戶，傾銷西方的鴉片，掠奪中國的白銀；另一方面却希望中國保留一個落後的社會結構，以保障他們在世界性的掠奪中從中國取得永久的好處。

西方這種政策直接打擊了中國民主主義先行者的願望，西方入侵的外部條件并未造成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的根本改變，只是外部形態變化了，官僚政治轉化到列強各國共同支配的傀儡官僚政治，官僚政府約束的小生產經濟轉化爲殖民地附屬經濟；正統儒教轉化爲奴化色彩的「中學」如此等等。內在的變化不過是新軍閥——集權官僚政府上台，外在的變化却給整個民族加上帝國主義控制的鐵鍊。獨立的中國社會舊系統行將轉變爲外部大系統的從屬部分。

這種西方侵略政策的作用：第一，並不是積極影響中國社會結構的解體；第二，它在中國引起的總反饋是負向的，不僅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勢力猛烈反抗，受西方文明影響而興起的民主主義運動也激烈反抗。

中國第二種可能的選擇是結構再生——內部機制恢復，「改朝換代」。

近代中國的集權社會再生需要這樣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找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爲官僚政治同化、親和、相適應的思想形式和經濟形式。

在對官僚政治的歷史作用缺乏根本性認識的時代，社會變革力量爲尋找出路時，不可避免地象歷代農民戰爭一樣去打破舊的國家機器。但他們只懂得讓新機器按舊方式運轉。當然，在悲壯的歷史運動中，這是社會革命內部的「潛意識」。人民往往在機器更換的「徹底」上滿足了，因而他們把革命宣布爲「根本性的」。新機器按舊方式本能地開始運轉，這在最初則幾乎不被人感覺到。

馬克思主義作爲一種「革命理論」傳入了中國。一開始，保守勢力就把它視爲洪水猛獸，與端邪說；改革的力量則把它作爲「造反有理」的學說，加以熱烈的歡迎。一時衆說紛紛，鬭爭激烈。然而，在誰都沒有來得及弄清楚馬克思主義時，有一些潛在的因素發揮了作用。

在那些最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思想深處：(1)馬克思對西方民主與法治的批判在心理上成爲中國人替自己特有的「人治」精神辯護的武器；(2)馬克思的社會——國有制經濟理論中隱藏着與中國傳統的政治強制管理經濟的方式密切相連的成份；(3)馬克思主義的黨派性、強烈的排它性，正適合中國傳統的思想服從政治和「一定權於一尊」的習慣。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和某些中國政治家的大一統觀念一拍即合。

那麼，社會需要一個新的集權政治的直接代替物，還有比這樣一種革命思想更適合需要的嗎？

從一切階層中湧現出來的激進的革命者，重視政治實踐的革命者，幾乎全部都成了共產主義者。這不能歸咎於他們的輕率，只能歸咎於歷史演進的行程還未深化。

不可避免的是，結構再生的革命主力又是農民的。一個農民化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化的農民戰爭興起了，他們擎着社會主義的旗幟高呼猛進，盡管他們不知道社會主義究竟是何物，馬克思却成了他們的救世主，他們把大一統的政治精神留在心底，準備好了在他們重建國家機器時，以馬克思的名義加以發揮。

舊的傳統在新的形式上復活了，革命運動已倒退爲終結。詩情般的理想掩蓋着新帝王的權力慾，爲理想流血的戰場燃起了新王朝開疆拓土的篝火。這不是一個新中國的方向，但却很像一個新中國的方向。

當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面對着一個繼承了清王朝的腐朽而披着民主外衣的蔣介石政權時，當它把握了日本入侵所造成的客觀環境容許其發展的機會時，就像秋風一樣席捲了中國大陸。

人民爲它獻出了一切，但是在社會結構的復辟中獻出了一切。毛澤東用血和火掃蕩了社會崩潰時代的鴉片妓

院，十里洋場，他在延安時已編制好了各種新官僚政治的秩序和名份，他的手同時握着「資治通鑑」和「共產主義ABC」，以一個超過秦皇漢武的「英主」姿態進入了北京。

新集權社會終於再生出來。

新政府把土地從地主手中奪來賜予農民，但立刻又從農民手中把它奪走了，「這是爲了農民的利益！」把工人從私人資本下解脫出來，但接着又投入到國有資本的鐵蹄下，「這是爲了工人的利益！」知識分子被許諾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但很快就發現自己被禁錮在「黨天下」的羅網之中，「這是爲了知識分子的健康成長！」「新民主主義」的口號曾經是對人民情緒的安慰，但「階級鬥爭」和「專政」立刻迫使一切人俯首貼耳，這也不過「是爲了保護人民的江山！」

這就是再生出來的結構。

二、中國大陸的現存社會

A 現存社會的總結構

中國大陸現存的社會是一個再生出來的集權社會，但是中國歷史上有那一個王朝的官僚政治比共產黨的官僚政治更集權的呢？有那一個朝代的經濟體制比共產黨建立國有——集體經濟更直接受控於政治的呢？沒有！有一家學說的統治比共產黨的思想專制更完備、更極端的呢？也沒有！

這個官僚政治、官僚國有——集體制經濟和共產黨的思想專制的三位一體，就是中國現存社會的基本結構。

這個社會結構的內部機制有着下列的基本特徵：

- (1) 官僚政治決定着一切，它力圖把整個社會都打上一種官方色彩。

- (2) 官僚政治通過行政體制來直接控制和管理經濟，這就使得國有制和集體制經濟的生產目的、方式成爲非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東西。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爲了鞏固和強化政治統治，因此它不斷納入政治控制的軌道，基本上排除了按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的意向。

- (3) 一切社會輿論工具都受到官方的嚴密控制，

思想不能任意發表和真正獨立，因此社會輿論工具上的消息往往是虛假的，不真實的。

(B) 官僚的政治結構

首先考察一般的集權官僚政治系統的機制。

集權官僚政治系統是一個金字塔模型。從縱向看，塔的頂尖到社會基層是一束多級的輻射狀通道。這是一個頂端合在一起的串聯信息網，包括自上而下的輸送指令和自下而上的輸送情報。同時，它又是多環節串聯成的人身控制鏈束。官僚機器自上而下地推動運轉，爲保證每項最高指令都不容違抗地向下通行，和每一個重要情況都不受阻礙地向上通報，官僚政治要求每個環節和每條通道上的人都能保持普遍的絕對的忠誠，因而人身權力的控制是必須的。集權官僚政治的金字塔是一個雙重意義的金字塔——訊息通道束縛的金字塔和政治警察控制的金字塔——一個是另一個的靈魂。

從橫向來看，官僚系統的每一級都有一定的權利範圍，每一種級別都意味着某一種利益：薪俸、特權、權力交易、貪污受賄等等，有人說過：「權力是腐蝕人的，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蝕人。」人們抓住權力，在沒有外加的社會約束時，就會在權力能及的範圍內建立起利益的獨立王國。於是，集權官僚系統的橫斷而又分割成爲大量利益領地的封建集群。

在這樣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政治社會裏，一方面有一種直接的、全面的、非法律性的約束：要求下級對上級唯一絕對負責，政治職能被簡化爲命令和服從。這樣，每一個人都成了長官意志的奴隸；另一方面，由於權益分割，每一個人都可以欺騙上級，這種基礎又不斷培育出利欲熏心的鑽營家和野心家。

官僚的人格化爲雙重：公開的順從和秘密的抵制，表面的奉公和私下的競爭，忠耿耿與陰謀奸詐，守職和貪婪，愚蠢與權變，克己與放縱……這些矛盾的品格，常常是奇妙地結合在一起。

下級官僚的秘密人格，深藏的野心造成了上級官僚的提防和恐懼，這就迫使「一元化」的政治約束更嚴。而強化的統治又使下級增長仇恨。因此，

不可避免地，集權官僚政治內部每一層上下級之間都存在心理的「戰爭」。這種心理上敵視是潛伏着的權力衝突危機。

古代官僚政治的無數血腥的宮廷內亂可以作爲例證，而「文化大革命」前後毛澤東與他所有「親密親友」之間的戒備和敵視，已爲後來披露的文件所證實。

表面上的高效率，一元化的機構和鐵幕後面的腐化、分裂，這就是集權官僚政治系統的特徵。

這部機器的管理、控制着整個社會。用控制論術語來說，集權社會系統是被官僚政治這個「有干擾系統」控制着，因此，官僚政治系統內部干擾的量就決定着社會系統的變化，顯然，官僚政治內部的權力鬥爭激化立刻就會造成訊息通道的堵塞，因而引起社會經濟和思想的混亂。

現存中國大陸的中國集權官僚政治具有一般集權官僚政治的特點，而且使它更典型化了。

第一個「一元化」高效率支配社會的例子是，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毛澤東曾躊躇滿志地說：「七千萬人上陣，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不是共產黨領導，誰能辦得到？」

再舉權力鬥爭「干擾」爲例子，「文化大革命」公開激化的官僚集團內部權力鬥爭不是直接造成社會動亂，生產停頓，社會瀕於崩潰的邊緣嗎？

中國的集權官僚政治從建國到現在可以基本劃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四九年到五七年，這是集權官僚政治系統發展的階段，是實現、鞏固大一統的階段。第二階段從五七年到七六年，這是集權官僚政治內部干擾公開化，特別是個人獨裁的徹底暴露的階段。第三階段則從七六年之後，這是集權官僚政治內部干擾造成的社會弊端全面暴露出來，因而集權官僚政治不可抑制地發生潰爛，癱瘓下去的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後，爲了排除干擾，大規模的「平反」膨脹了官僚機構，緩和「階級鬥爭」則使貪圖享受、腐化之風盛行起來。「精簡機構」和「查禁腐化」越來越成爲最上層官僚頭腦的問題，一切都表明，歷代集權官僚政治延存的這一屆「共產黨政治」已經超過「更年期」，無可避免地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C) 官僚國有制，集體制經濟的結構

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形態嗎？確實如此。

古代集權社會中大量的私有和小土地經營到哪裏去了呢？被「合作化」掃蕩掉了。土地的經營與實際的所有——支配權被分開，農民只是從形式上經營着土地。在他們形容枯槁的身影後面，站着一個大腹便便、神氣活現的身兼政府和大土地壟斷者雙重身份的集權官僚階級。

龐大的政、經合一的組織「人民公社」建立了起來。這不過是對大農業生產的諷刺。整個農村仍然在延用着幾千年來的古老落後的耕作方式。農民年復一年地重復着繁重的勞作，但沒有任何可能進行個人積累。（集體積累這種半官僚政治建制的積累也極為有限）所謂「生產積極性」不過是盼望從國家征收之餘能維持糊口，因而不不得不拼命工作。「國富民貧」確是農村的真實寫照。

當農村經濟被「竭澤而漁」而面臨破產時，官僚國家便把控制的僵繩稍微放鬆一下，這就是所謂「三自一包」。「三自一包」總是與即將窒息而死的農村經濟聯繫在一起的。

至於城市工商業，原來的城市私營、官辦和買辦經濟在「公私合營」後，全都被「社會主義化」了，這就是官僚國有制經濟。這種經濟恰類似古代的「官商」、一切生產、流通、消費、分派都由集權官僚政府以長官意志，指令（「計劃」）來決定。

整個集權官僚政府控制之下的經濟系統表現為：經營者失去了經營的自由，失去了所有權，沒有市場價格的自由波動，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更沒有工商業資本的自由活動。工業和農業的市場經濟干脆就被取消了。共產主義理論的「社會主義」經濟以集權官僚政治控制的方式得以「實現」。

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像農奴一樣依附於集權官僚的國家，工人也被集權官僚國家強制性地「雇用」，不過他們勞動力的「價值」不再表現在勞動力市場上，而是表現在集權官僚的「計劃」、「配給」的恩賜上。工人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僱傭制的奴隸，而是人身權利被約束和佔有制度下的奴隸。這樣的經濟關係，就叫作集權社會的「社會主義」。

如果說這樣的「社會主義」「解放」了工人和

農民，那就是使他們成爲了徹底的無產階級。工人農民和集權官僚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的對立，直接地表現爲政治關係的尖銳對立。

這樣的社會經濟活動方式確是罕見。市場流通手段不再是對生產有效的推動力，不是大工業生長起來去促進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反而是落後的農業規定了工業的發展，工業成爲農業的附庸。官僚國家挾持着農業常規性生產的命脈。而以從農村中強制征集起來的資本，任意轉爲工業投資，農業好轉，工業就盲目膨脹；農業惡化，成千上萬的產業便「下馬」，甚至新設備也被立刻匆匆棄置。一切都不是爲了直接滿足社會的需要，生產只是爲了完成集權官僚政府的「計劃」。「計劃」本身執行着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經濟學成了長官意志之外的多餘之物。農民養活了國家，而國家却轉手養活了城市。一切經濟規律體現出來的內在活力都不存在，而社會就在這樣的「養活」中維持下去。

建國初期，官僚國家剝奪社會資本完成了原始積累，並且利用人們盲目樂觀的情緒使生產有了一個階段的發展。隨着集權官僚政治對生產的破壞作用日益嚴重，尤其是集權官僚系統內部權力鬥爭激烈時，貧困和蕭條籠罩了「社會主義」的現實和未來。

(D) 共產黨的思想專制

集權官僚政治建立的共產黨思想專制不是學說式的、而是教會式的思想專制。但是它又不是由宗教集團操縱政權。而是世俗政權利用教條來束縛人民思想的專制。在集權的共產黨國家中一切哲學、社會學、教育和藝術、自然科學和技術發明統統都不過是集權官僚政治的婢女。

而統治寶座上的思想形態，在中國是毛澤東化的馬克思主義。

由毛澤東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已經不是一種哲學——政治經濟學的理论，而是一種包羅萬象的中國「雜家」式的體系。其中摻合着多種傳統的集權統治思想。從總的方面看，這種思想由於它直接爲政治統治服務的性質，不是偏重於「學」，而是偏重於「術」。

儘管現實使其每一個思想出丑，但共產官僚

却總是把這套觀念不斷修補補，再張貼出來。毛的思想社會化了，也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思想了，而是屬於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優良傳統」，或者說是「神道設教」的正統。

這種毛式的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式的毛家「儒教」被規定爲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民的唯一「信仰」。這種強加的信仰必然限制了科學思想的自由成長。

集權的官僚政治和官僚政治化的經濟能夠提供社會思想獨立發展的土壤嗎？反過來說，強調思想的獨立發展又能夠用公開化的方式影響和改變官僚政治——經濟的本質嗎？不能。

中國的知識分子唯一出路是經「科學」和「仕途」爬上「專家」或官僚的位置，而所謂專家的作用，只不過是在思想檢查官的監視下發表符合共產主義教義的意見。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名鼎鼎的文化人把多種學術觀點牽強附會地解釋爲共產主義教條的重復。這是爲什麼呢？爲了生存的需要。翻開共產黨思想專制下的出版物，常常只看到千篇一律的公式化語言，而誰又敢從根本上對這些現象不滿和抗議呢？

檢舉制度，戶口和檔案制度，用封官收買告密者的手段，「群眾鬥爭」的手段，還有懲罰「反革命」犯的刑律和監獄，迫得全社會人人自危。

但是，思想形態會因爲政治的羅網編織得足夠嚴密而永遠被禁錮嗎？思想形態及自由生產的本性必然會從下面滲透出思想專制外殼的裂縫，按其本身的固有規律發展着，從而也潛移默化地改變着社會上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這是現存集權社會內部具有革命性發展活力的原始因素。

三、科學民主主義革命

(A) 共產主義社會爆發革命的可能性

共產主義制度在這個世界上存在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也已經有三十多年了。共產主義制度一方面固然加緊其對國內的極權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其內部又不可避免地產生着日益深重的危機。

先看看共產黨國家普遍存在的共同的危機：

一、周期性的社會癱瘓

共產主義的教義雖然娓娓動聽，教人要有「大公無私」的美德，但共產主義的頭目的靈魂深處却充滿了自私和奸詐。他們之間的爭權奪利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將來也不會溫良恭儉讓起來。我們在前面指出過：集權官僚建立起來的金字塔型的控制網，是全社會性的，一環緊扣一環的，一旦他們之間鬥爭起來，丟下他們本身承上啟下的職責不管，那麼社會的某些環節就斷了連接，社會的正常運行機制就不靈了，便出現亂了套的現象，各方面的社會工作都呈現癱瘓的現象。每當統治階層出現大的鬥爭前後，都會出現這種狀況。這種周期性的社會癱瘓，吃苦的主要還是老百姓。但這種社會苦果，也使社會產生普遍的失望和憤懣情緒。

二、統治階級爭權奪利鬥爭的結果，總有勝利者，也有失敗者。失敗者被清刷下來，降為一般貧民，甚至被打入牢獄。他們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有着前後截然不同的強烈對比。這種巨大的刺激，使他們自然產生強烈的報復心理。每一次權力鬥爭的結果都有一批新的失意者敗陣下來。日久月累，但形成了一個不小的失意者階層，因為他們曾為高官，熟悉官場的內幕和派系鬥爭，容易成為其他社會報復勢力的操縱者和情報提供者。——「文化大革命」中呈現的複雜局面，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三、馬克思主義教義中堆滿了民主、平等的華麗詞藻和令人陶醉的美好遠景，因此吸引了不少幼稚的具有理想的熱血青年為之獻身奮鬥。但現實生活的教訓一旦戳穿了這些美麗的謊言，覺醒過來被欺辱者便會產生比其他人強烈百倍的報復心理。——不少昔日狂熱的馬列主義信徒紛紛成為今天堅決反對專制的民主鬥士就是明證。

四、官僚機構的無能使國民經濟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老是提高不上去，共產主義的美景越來越渺茫，使廣大人民群眾乃至共產黨的中下層幹部越來越失望，對共產主義信念喪失信心。

五、共產黨極權統治的結果，造成社會上存在着兩大對抗階級。這兩大對抗階級是共產官僚階級和勞動者階級，也可以稱為有權階級和無權階級。

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之所以成為共產官僚階級，是因為這個階級壟斷了社會的一切權益，但並

不是歸官僚個人所佔有，而是作為階級的集體佔有；另外，在所有制的法權形式上，它並不明確宣佈將社會的財富和權力據為己有，只是在實際上佔有絕對支配權。——這是與其他類型的社會結構中的官僚階級不同之處。

這個社會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之所以稱為勞動者階級，是因為原來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級他們的社會權利已被共產黨剝奪得所剩不多，相差無已，經濟地位的貧困也相差無已。他們之間的差別只着重在職業的不同，而不是經濟地位的不同。所以工、農、知的差別是階層的差別，而不是階級的差別；又由於他們都共同受到共產官僚階級的欺壓，同是官僚佔有制下的奴隸。總之他們的共同性大於他們的差異性（就政治、經濟地位而言），所以將他們統歸為一個共同的勞動者階級是合適的。

社會上的這兩大對抗階級，他們尖銳對立的階級利益是不能調和的，最終只能求助於社會革命才能解決。

六、共產黨集權專制制度由於搞經濟無能，不得不引進或容忍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養活自己。這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喚發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和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是無聲的教員，用事實表明哪一種制度才有優越性。這種在共產黨專制制度下殘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集權專制制度有着長遠的瓦解力。

所以，當這種不完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共產黨又要使用強暴手段將其勢頭壓下去。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依賴關係是這樣的：「沒有就活不成，多了就要命。」資本主義的份量到底要多少才是適中的呢？這是每一個共產黨政治家都深感頭痛的問題。

除了上述所共有的危機外，中國的現有專制制度有着特殊的更深刻的危機：

一、中國由於缺乏斯大林式的清洗，統治階層中依然派系眾多且互不聽令，難以取得統一步伐進行統治。本來毛澤東在世時有可能進行淨化組織的大清洗，但隨着毛的逝世，四人幫的垮台，這種大清洗就更難以出現了。現在的統治階層中，缺乏象毛這樣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呈現群龍無首的狀況。

在中上層佔大量比例的農民出身的高官，由於他們的狹隘近利的品格，要他們為了整個制度的利益而犧牲一些個人眼前小利，也受到了他們的頑強抵制，這就更加深了統治階層的渙散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把共產黨專制制度的一切黑暗面暴露無遺，對人民群眾的教育極大，而文化大革命中鼓動起來的造反精神，很容易轉化為反對現有專制制度的造反精神——四五運動前後民主運動的興起，決非偶然。

三、中國經濟的落後，技術水平低下，造成大量個體經濟的存在，這些個體經濟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也是一個很大的潛在的敵手。

四、中國目前農村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仍佔很大比重，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村的集體經濟是由下層的共產黨官僚所把持的，但下層官僚同中上層的共產黨官僚機構亦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經常存在着控制與反控制、統治與反統治的鬥爭，上層稍一放鬆或不留意，下層就背離上層意志行事，為地方的利益打算，而不顧上層的利益。這種上中下之間的矛盾、鬥爭，對整個共產制度有很大的離心，是一個大有文章可作的地方。

五、值得注意的是在共產黨專制統治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極端貧困化和被漠視化。在今天中國大陸，廣大知識分子（包括教師、文藝工作者、專業技術人員）的收入水平還低於一般工人。他們衣食簡陋、家務繁重、住着低矮狹小的房子，每天的上下班時間還要為着兒女的教育問題、一日三餐的吃飯問題，甚至燃料問題擔憂，根本無法專心致意在自己本職專業問題上。即使在專業上有些成就，並得不到重用，原因是自己的頂頭上司多半是外行的「草包」黨吏，他們只關心下屬是否對黨的忠誠，而不注意專業人才的發掘。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貧困化和被漠視化，造成了廣大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極大的不滿心理，比其他共產黨國家的知識分子具有更廣泛深刻的反叛性。

在某種意義上，知識分子是社會的靈魂，是社會性行動的天然號召者和組織者。一旦這些被漠視的貧困的知識分子行動起來，將對共產黨集權專制制度造成極大的威脅。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名言：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這句名言雖然聳然聽聞，可惜已

被歷史證明是一句謊言。
今天的時代，歷史將證明：共產黨培養自己的掘墓人。

(B)兩種社會變革的機制

社會變革有兩種：一種是社會結構的內部機制基本不變的改革，另一種是社會結構內部根本變化的變革。

社會結構的內部機制取決於結構內起決定性作用的子系統。這個子系統形態決定了人們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只要這子系統形態的社會作用不改變，即使其他子系統形態的形式變化了，但整個社會機制仍然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社會的本質也就不變。例如：中國集權官僚政治對社會的決定性作用不變，經濟形態可以由私有小生產變為官僚國有和集體制。但社會的本質依然沒改變。

我們引出一個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內部起決定性作用的子系統形態不變，因而社會內部機制賴以不變的原則，這個概念是「規範」。在科學哲學中，這個概念表述着科學認識中內在的決定性的規則的意思。

第一種社會變革是規範不變的變革，也就是常規變革。

而規範改變的變革，也就是必然引起社會結構內部機制根本變化的變革，顯然是第二種社會變革，也就是變規變革。

這種變革使原結構內起決定性的子系統形態的作用發生重大的變化，因而它對社會的作用由決定性變為非決定性。因此人們的社會關係也就會得到根本的改變，一種社會結構便會演化為另一種社會結構。例如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便是這樣一種變規變革。

兩種社會變革都產生於社會結構的自我調節機能，即同化新歷史因素和結構「整合」的功能。但是第一種變革主要體現於適應性調節，而不意味着結構改變和重新組合；而第二種變革則是真正「建構主義」的，即結構徹底改變，因而是「新質」、突變性的變革。

(C)中國科學民主主義革命的政策

(略)

四、科學民主主義社會

我們所設計的應該是怎樣的一個社會結構呢？我們應該明白，世界上並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人類能夠創造出來的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帶有缺陷，我們不應苛求有完全理想化的社會。我們只應追求盡可能接近理想化的「不完美的社會」。這是我們討論設計新社會藍圖的前提。

社會革命的目的無疑是要創造出一個活生生的社會結構。沒有革命創造出來的社會結構意義上的民主，便不可以保證反民主的力量真正受到抑制和不可再生。革命一旦過去，民主便會消亡。因為只要實際生活中存在着官僚集權政治、資本壟斷、思想專制一類絕對支配力量，社會機制就總是抑制着人民自由創造性的發展而導致不民主。

因此，科學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在革命成功後的中國，建立起體現「民主與理性」原則，使絕對支配勢力不可再生的社會結構。

根據以上的原則，我們提出如下的新社會藍圖

(A) 政治領域

過去社會不民主狀況的根本癥結是權力中心的單極化。權力中心的力量只有另外的權力中心才可以與之直接對抗。因此，政治形式的民主化，首先以政權結構的權力中心多極化為條件。多之化帶來的內部對抗，監督、批評和辯論，才會使思想、理論具有價值和力量。其實，道義和明智等等才會有效地成為人們客觀衡量政權決策的標準。

因此，軍政分治，軍界不參與政事，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這些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則，自然不能動搖，應當繼續堅持。

另外，我們還提出新的原則：

一、廢除政黨輪流執政的政治制度。各級行政首腦的候選人，以個人資格、以自己的真才實學來博取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不是以親黨派候選人的

資格來參加競選。

近代西方政治上採取的政黨競選輪流執政的制度，在實踐上有很大的弊病：各候選人及廣大選民往往被黨派的紀律所束縛和狹隘的黨派利益所左右，被迫幹出些違背自己心願的事。例如：為了自己黨派的利益和紀律，被迫選舉自己所不喜歡的人當選，或者幹些自己本意所不願的事。這種黨派參政的制度，實質上就是黨派這種絕對支配勢力在左右政局，使社會上有一部分人沒有實際的民主自由的選擇。選民實際上能了解和把握的是某個候選人，而不是某個黨派（因為黨派的立場、宗旨可以隨時更換）。因此，廢除政黨參政的制度，是真正符合民主與理性的原則的。

而政黨，在結構民主化的社會中，應該化為純粹的思想信仰集團，或為進行理論工作和用輿論、用思想行為方式來影響社會政治的集團。

二、上級行政首腦由下一級行政部門任過職並確曾有良好政績的人中間選舉產生。

提出這條原則的宗旨，是為了防止社會的關鍵崗位落在一些無真正才學，而又靠如簧之舌作蠱惑人心的宣傳的煽動家、宣傳家手裏。——這是從歷史得來的教訓：共產黨就是靠蠱惑人心的宣傳而逐步取得政權的。

三、各級行政首腦的助手由行政首腦自由選定，不必具有行政資歷。

這一條原則是對上條原則的補充。上一條原則規定要有行政領導經驗及好的政績，是為了使關鍵性的崗位掌握在一些可靠的人手裏。但是如果這一條原則也適用於所有的政府部門，則將一些有想像力、有朝氣、有抱負的但未有資歷的青年人統統拒於門外了，這是智者所不為的。所以這後一條原則是專門為年輕人提供捷徑的。

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實行了這幾條新原則後社會將出現的場面吧：

例如，你想競選總統，你就必須當過省長或者前幾屆總統的助手，並且要有好的政績。說不定你要從鄉長做起。經過多年的掙扎，好不容易才爬上省長的地位，才有今天競選總統的資格。當然，你可能兩鬢如銀了。但是，如果你年輕有為，又會鑽營，能充分表現自己的才學，得到第一、二屆總統的青睞，那麼，你的前途就與別人大不相同了，你

可以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有資格競選總統。當然，你也得有好的政績給人看才行。如果單憑如簧鼓舌，決得不到選民的支持。

當你當上了總統以後，你可以挑選自己滿意的人當助手，不必理會在競選期間曾幫了你的大忙的各黨派集團的鼓噪（雖然你也是其中某個黨派的成員），因為你是憑自己的本事上台的，不是靠某些黨派的吹捧上台的。

(B) 經濟領域

科學民主主義革命要求經濟獨立於政治的絕對支配之下，也要求經濟支配權力的多元分立化。這種經濟權力結構的基本原則是：國家、企業（等同於私人投資者），生產者都應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經濟支配。與「社會主義」革命以改變所有制為目的相反，科學民主主義革命從改變實際的經濟支配權結構為目的。

這種內部分立和制約的支配權結構，使得社會分配將不是純粹按所謂私有制所有權的分配，那種分配確實是摧殘生產積極性，把人異化為財產的奴隸。同時，它也不是純粹「按勞分配」，因為「按勞分配」實際上只是按勞動力出賣價格的分配，是使勞動者只關心個人收入，不關心企業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把人異化為個人物質利益的奴隸。

民主的社會經濟結構，將不使人成為純粹的物質生產工具，也不成為排除於經濟活動過程之外的純粹「所有者」。人在經濟生活方式多重化，可以真正培育社會的民主因素。因此多樣化多層次的支配——分配權的經濟結構是必需的。

根據以上的原則，我們設想的新社會的經濟企業，是國家、企業、生產者三種成份佔支配權的混合經濟，可以說是「公私合營」企業。具體的法制形式，可能是採取聯合股份公司的辦法，即在一間大企業中，由國家、企業（等同於私人投資者）、生產者各佔一定比例股份。國家的生產者所持有的股份是法定股份，不可轉讓抵押（只表示在企業內持有的支配——分配權比例），而企業持有的自由股份則可在股票市場上自由買賣、轉讓。企業的盈虧，按各方面所持股份的比例分攤。同時，企業經營的好壞，就與國家、企業、生產者都有密切的聯

繫。這裏所說的生產者的支配權，確切地說，是企業管理的參與權，它的份量到底應該多大，是一個細致複雜的問題，是頗有爭議的地方。本文不準備多談。

這樣的結構，一方面既可以使國家有一定的能力預先了解大企業的動向，使大企業健康發展，以及國家能有效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使企業保持由市場經濟得來的活力。

上面所說的那種新的經濟結構，是從大局來看的形式。具體到每一個企業則不一定都要採取這種形式的經濟結構。要分別情況不同對待。

一、對於有些嚴重關係國計民生問題，不利於私人的企業（例如郵政事業），可以採取完全國營化，在企業內只採取單一的國家支配權。

二、對於有些與國計民生關係重大但宜吸收私人投資的企業，則採取「三兼顧」的支配權。

三、對於有些影響國計民生不大的小型企業，如國家無力兼顧，可以只採取私人投資者與生產者兩兼顧的支配權。

四、對於那些微型企業，可採取單一的投資者支配權。

當然，每一個企業並不限定採取某一種支配權結構，要根據不同的時勢來決定。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1)國家一定要通過一定的方法形式來限制壟斷經濟的出現。因為反壟斷法是保障自由競爭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2)體育界競技中的那種人道主義競爭精神應在自由經濟的競爭中得到體現。在這裏，主要應由國家擔當調節的角色。

共產主義把一切社會罪惡和不平等，都看作是所有制問題引起的。

其實大謬不然。

社會問題的癥結不是所有制問題，而是社會財富的支配權及分配問題。共產黨專政制度的問題並不在於它的財富歸私人佔有，而在於它的官僚階級成為社會的絕對支配力量。

(C) 思想文化領域

新社會保障人們的信仰自由，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像目前西方世界的那種狀況，還是不夠的。

西方目前在法律上選擇信仰的自由是無限制的，但在實際環境中往往沒有選擇的自由。例如，在繁華的都市，無孔不入的商業廣告在包圍着你，你想得到一個寧靜的環境過日子却不容易。又如：假如你是個佛教徒，你希望得到一個非常清靜的環境，但周圍充滿性感的环境使你無法靜心悟道。

針對這種時弊，我們設想的新社會將出現多種多樣的文化保留區：佛教區、基督教區、天主教區、伊斯蘭教區、儒教區、自由區、共產主義區等等。

在這些信奉多種教義的文化保留區內，這些教義所遵循的誠律便成爲其中活着（哪怕只是過路人）的人們的道德規範，爲了維持道德的純潔性，在這些文化區內可以設立道德法庭和道德警察，但道德法庭上能作出有關某人的道德名譽的判決，不可與國家法庭的嚴厲相比，道德警察的權限，也僅僅只在本區範圍內要求人們（信徒和過路人、來訪客人）按照本區教義行事，及制止違反本區教義的行爲發生，但不能禁止人們（包括信徒）自由地離開本區及選擇其他信仰的自由，不能侵犯人們的合法權益。總之，一切行爲不能與國家根本大法相悖。

建立這些文化保留區的好處：(1)使多種信仰的人們得到自己希望的生活環境，正所謂各得其所。(2)使多種文化信仰都有一個互相自由競爭的環境，以便在競爭中產生一些較適合大多數人和多種多樣的人需要的生活方式。(3)現實中的人是需要過多重化的生活的，有時需要寧靜，有時需要繁華，有時需要嚴謹，有時需要胡鬧。多種文化區的同時存在，正方便人們作隨時隨意的選擇。

跋

社會結構的變規範變革需要一個思想變規範的變革。

人類的認識發展同樣也有常規性發展與變規範發展兩種。

一切以往的經驗之中（感知的和理念的），潛在着認識的規範。這種規範決定着人們的眼光和思維方式，支持着人們對事物的一般性解釋。打破這種規範的條件是經驗的「反常」。多次的「反常」便造成認識的危機。

人的認識在常規的情況下習慣於直接的邏輯推理，可是危機使得認識體系的規範被動搖，直推的邏輯推導對反常事物不能再得出合理的解釋，這時規範的變革便將產生。

從「本體論」的社會觀到科學民主主義的社會觀，就是人們的社會認識規範的變革。

新的社會認識規範，不能從舊的認識體系中邏輯地推導出來，而是被人們運用直覺和自由思維構造出來。只要這種新的社會認識規範能展開成新的思想體系，而且是自給地、明確地、有效地、可證實地展開成體系，那麼，它就能夠成爲社會化的思想認識體系。科學就是創造。思想發展的歷史證明精神的生產有它的獨立性的品格。當一個違反舊規範，不合邏輯地產生出來的思想在與現實的覆合中展開時，儘管這種思想有種種不完善，有什麼奇怪？

科學史及現代科學哲學都證明了，應該這樣理解人類認識發展的結構，即以識一次次通過規範革命的「飛躍」來前進。

科學民主主義者敢於把「設想」出來的民主社會結構公佈於衆，就在於他們堅信社會的實踐是人們在一定社會的認識規範指導下的實踐。在這個意義上，在人們已經無法繼續屈從於舊的社會認識規範，在舊的民主觀念已經缺乏指導社會實踐的力量時，未來的民主社會結構的設想先於這個結構的實現怎麼能夠避免呢？正是在這裏，我們可以說一個思想勝過一百次行動。

社會認識的規範變革並不是特別強調新規範對舊規範的排斥性。社會結構世界觀承認歷史上的一切認識規範和結構也都曾在一定層次上覆合了現實。但是，歷史上曾經有過任何一種規範是絕對的，萬應不變的嗎？

自覺地改變認識規範是人類精神的真正偉大之處。

應該在這樣的認識論基礎上來理解科學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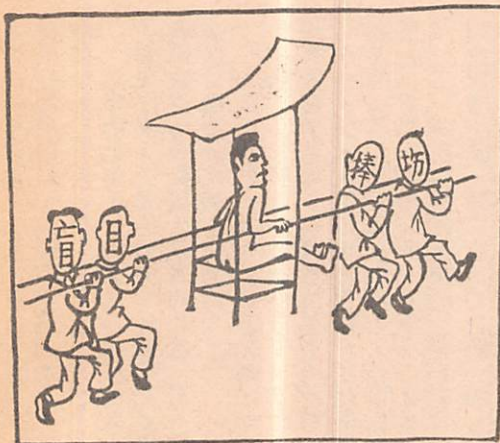
在一個日益趨向於多種化的世界系統面前，在共產主義陣營裏出現一系列的民主運動的現實面前，科學民主主義有理由認爲新的社會結構革命是在東方醞釀發生。

科學民主主義者是世界主義者，因爲科學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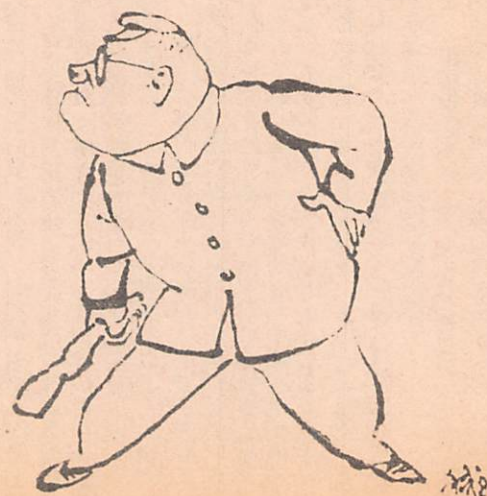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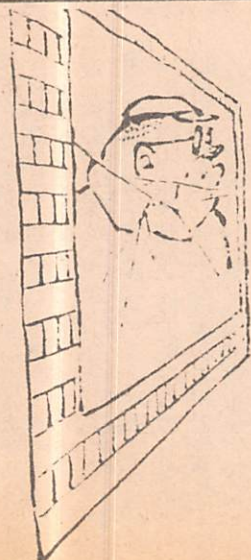
國界。世界文化中特別是現代科學中的最新成果都被科學民主主義者同時視爲自己的成果。一切集權主義、經濟壟斷主義都被視爲我們的敵人。同時，人權主義者、反集權政府的自由主義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中的民主激進派，不管他們在社會認識的規範上與我們如何不同，他們反對政治迫害、反對經濟壟斷，反對思想專制的鬥爭都和科學民主主義革命站在一個實際的立場上。

我們深知社會的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別和不平等，我們在自己冀求民主的新理想中只望消除掉最極端的差別和最懸殊的不平等。我們需要的是鑷除掉社會機制中對人的絕對支配，而這一切只有科學和科學所啟迪的新社會意識，決定性地作用於政治和經濟生活，以及影響到人們最一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才有可能得以實現。世界多極前景的優越性，民主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科學的進步，都必然地要把世界引向社會結構根本變革的方向。

我們在於去追尋一個「不完美」的但是全新境界的明天，即使面對着一個依靠強力維持和建立在虛假信仰上的社會，我們也不惜犧牲一切。讓科學的民主的太陽升起來吧！



皇帝的新衣



鏡子討厭

說異化

怡文

異化可以說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各種事物變化

的一種特殊現象。承認衍生、繁殖、繼承、進化、「猴子變人」是達爾文的貢獻，質變或部份質變是近代哲學的重要概括，但政治偏見常會遠離真理，在權大於法的情況下，有些人承認前者，却不承認遺傳變異中的誕生、蛻變、異化；承認社會主義下的進步、革命，却不承認它在一定條件下出現倒退、反動；只承認資本主義私有制下，錢和商品統治人的異化，不承認社會主義國有化下，沒有民主、法治，政治與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更有可能出現特權官僚的異化。中共批判「異化論」，只用高壓，不用說理，使哲學又重新走回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背離唯物論；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背離辨證法的老路，這是大陸思想理論界面臨的嚴重問題。

在打倒「四人幫」初期，鄧小平仍然「泡在水裏」，他在檢討錯誤，自我批評一番之餘，曾大唱「民主和太陽報的贊歌，到處伸手求援。等到衝破阻力復出後，便又鼓吹「異化論」，說黨內問題是封建遺毒，沒有民主，只有家長專制。然而，到他一旦抓了大權站穩腳跟，就棄此高調如敗絮，甚至

還倒打一耙。

蘇俄十月革命後，一直忙於美化社會主義的遠景，甚至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矛盾。他們一九三二年才首次發表馬克思一八四四年寫的一經濟學——哲學手稿」，因為在該文稿中馬克思講了異化問題。但蘇俄把它當做馬克思青年時代的不成熟著作，用沉默來否定這個理論。在一九三六年的斯大林憲法上，宣佈階級已經消滅，誰戰勝誰的問題基本解決，不能再談社會上的矛盾異化現象，即使社會上大量出現盜賊及殺人放火等刑事犯；黨內各級幹部嚴重違法亂紀、貪污腐化、墮落變質、搞官僚特權等。斯大林破壞民主，專橫獨斷、排除異己、大搞個人迷信，危害黨國達到驚人的程度，却被歌頌為天上的太陽。他的講話常被加上捧場的註腳，如「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全場大笑、狂笑」、「由掌聲轉為歡呼聲」、「全體起立，高呼烏啦！」另一方面，許多正直的人，成批被關進集中營、勞改營和精神病院。客觀上，蘇俄領導層的異化十分嚴重，這種情況一直有增無已。

一九五六年蘇兵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21大秘密

報告中，揭露了自己社會主義國家的驚人問題，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中共也被迫承認社會主義並非完美無缺，它存在矛盾，甚至部份會發展的對抗性矛盾，那是指當年的波蘭、匈牙利革命事件，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內的異化。

這種異化，也會在各個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內部先後出現。目前，北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被捧為人民的父親，比公僕變主人更上一級，他的年青的兒子金正日，已被公開冊封為這個封建社會主義王朝的繼位人，這種奇怪現象的產生，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是嚴重的歷史倒退，是地道的異化。

異化現象，還可以追逆馬克思本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雖然被稱為使過去的空想社會主義成為科學，但他的一生却在階級調和的環境中渡過。馬克思當年被德國統治者放逐，貧困的生活，造成他對資本主義的你虞我詐、巧取豪奪等現實恨之入骨，其同情無產階級被壓迫、被剝削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的不朽巨著資本論，奠定了他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的地位。然而，他本人，却與普魯士大臣貴族女兒燕妮結婚，同時，在經濟上幫助他一輩子的大資本家恩格斯也成了他最親密的革命戰友，就階級鬥爭的立場而言，這是不可調和矛盾的對立統一，中共理論稱之為階級調和論或階級融合論，它本身包含異化蛻變的因素。

在大陸，過去對異化也只稱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後來毛澤東根據馬克思總結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為防止幹部由公僕變主人，防止黨國變質變色，才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提出黨內當前最大的危險是現代修正主義，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黨、政、軍內，亦即是各個領域各個部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然，他沒有把自己也包括在內，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黨內領導集團的異化。毛要打倒包括國家主席、總書記和大批副總理、部長、元帥、將軍，地方領導幹部在內的幾乎所有當權派，要剝奪他們的

權力和撤消他們的職位。

如何看待中共幹部的這種變化呢？因為物質生活的轉變，人們的生活、思想總受時間、空間等條件的制約。

中共創建於五四運動之後，那是軍閥割據、民不聊生、國難當頭的年代，不少人是被逼上梁山。在這一階段，他們不惜自我犧牲，要求擺脫被壓迫剝削的地位。正所謂受壓迫越重，反抗也越大。那時的中共黨員，革命意志大多十分堅強。而在取得政權以後，他們已由被統治者向統治者轉化，在沒有建立民主法制和在國有化及權力高度集中的情況下，部份意志不堅定者，在長期物質缺乏的環境下利用自己握有的權力盡量爭取對物質的佔有，由是出現了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現象。他們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無限擴張權力，成為官僚特權集團，成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新階級。至此，他們已經由革命力量異化為革命的對象。

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異化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意志為轉移，決不能取不承認主義。中共現在煞費苦心，十分別扭地提出所謂反精神污染。開始時，大家摸不着頭腦，以為是針對人們的生活衣着或者文藝界的暴露、愛情小說；更或農村包產到戶、發財致富，城市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及發放獎金等等，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無所適從。鄧小平一見情況不妙，馬上急剎車，宣佈農村和科技界不搞除污，工商經營照舊，以免窒息經濟。現在，反精神污染的主要目標集中在反擊異化論和人道主義，他們恐懼在這種理論的顯微鏡透視下，會發現社會主義制度下許多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質變問題。

歷史往往嘲弄人們，提出「異化論」問題的王若水、刑賁思等，正是不久前被用來對付「凡是派」，在理論戰場上為鄧派衝鋒陷陣的大將，現在鄧小平却拿他們來開刀，自以為這樣可以捂住蓋子，這只是諱疾忌醫，問題總有一天會發生的。

《中國之春》月刊 徵求廣告

廣告價目表

	封底		封面裏		內頁	
	黑白	彩色	黑白	彩色	黑白	彩色
全頁	\$600	\$1,200	\$400	\$1,000	\$200	\$240
半頁	\$375	\$975	\$250	\$650	\$110	\$150
1/4頁	\$200		\$150		\$60	\$100
1/8頁					\$30	\$70

稀世珍品割讓

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國以來全套紀念郵票一百廿四套包括關漢卿梅蘭芳等小全張共四百廿二枚郵票紙質由粗劣而漸臻光潔特殊郵票七十五套包括牡丹小全張共四百四十四枚文革郵票廿一套共八十三枚新紀念郵票八套共卅九枚總計九百八十八枚一九七二年六月以後種類繁多已不在收藏之列此整套郵票係目前世上僅有二整套之一套其真實來源是「七十年代」主編李怡先生之父親李化先生（電影大導演）生前在國內拍攝外景之時與當年北京郵政局長在軟臥火車同赴北京途中相識而出資購得據悉國內僅存二套其中一套即為李化先生珍藏一九七二年李化先生病居澳門托本人在日本覓對象出售因感此珍品形同國寶不忍流失於日本人之手故出資承購珍藏迄今如有愛國人士自信有鑑賞能力珍藏資格者可逕與本人接洽願照當年原價割讓
（非炎黃子孫恕不出售）

夏威夷檳香山郵政信箱八二六三號王先生





胡喬木向周揚與王若水開火

本刊資料室



今年一月三日，身為中共政治局委員、被公認為鄧派理論權威的胡喬木，在中共中央黨校作了一次長篇報告，題為「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報告全文發表在該黨校的機關刊物「理論月刊」上，並由「人民日報」於一月廿七日全文轉載。內容有很多地方都直接指向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及不久前被解職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

現在將胡的報告與周、王論調針鋒相對的地方原文摘錄排對如下，以供讀者自己去作分析。周的錄文見於去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所發表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王文則見於「新聞戰綫」一九八〇年第八期之「談談異化問題」。

關於人道主義

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社會作用，在不同歷史條件和不同環境下，有所不同，因此也要作具體考察和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在某種條件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也可以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軍。

胡：資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以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偽善性質隨着資產階級反動傾向的發展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興起而日益增長。這時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常常成了資產階級暴力鎮壓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甜蜜補充，而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隊伍中，它的影响常常成爲革命鬥爭的銷蝕劑。

周：我不讚成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的體系之中，不讚成把馬克思主義全部歸結爲人道主義；但是，我們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包含着人道主義的。當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胡：應該看到，現在確實出現了一股思潮，要用作爲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甚至要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爲或部份歸結爲人道主義。

周：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的創立，使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思想放在更科學的基礎上，而不是拋棄了人道主義思想。

胡：他們或者要把馬克思主義納入人道主義而成爲



周揚



理論權威胡喬木

周：社會主義社會比之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優越性。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任何異化了。

王：社會主義應該是消滅異化，但究竟是不是已經消滅了異化，沒有了異化呢？我想我們應當承認，實踐證明還是有異化。

胡：一些同志認為不但資本主義社會有異化，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拋開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的方法，把如此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爲一個社會主義的異化，似乎有很深刻的內容，實際上思想極爲貧乏。它在認識上不能推進任何對真理的接近，在實踐上不能提供任何解決的辦法。相反，由於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當固定的反現實的傾向，又具有可以到處亂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會上的一切消極現象都歸罪於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黨和政府的領導，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在社會上散佈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和悲觀心理。

周：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就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就是經濟領域的異化。由於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與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

是個人崇拜，這和費爾巴哈批判的宗教異化有某種相似之處。所以，「異化」是客觀存在的現象，我們用不着對這個名詞大驚小怪。

王：不僅有思想上的異化，而且有政治上的異化，甚至經濟上的異化。

胡：在談論社會主義異化的文章中，有的實際上已經根據這個概念的邏輯，引出了結論，說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領域處處都在異化，說產生這些異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別處，恰恰就在社會主義制度本身。

※ ※ ※ ※ ※ ※ ※ ※ ※ ※

有一些同志把馬克思用於描寫資本主義制度下僱傭勞動和資本的對抗關係的概念——異化，引伸運用到社會主義社會，把我國在社會主義時曾經發生過而已經解決的和現在仍然存在或新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困難、曲折、缺點、弊病，甚至實際上並不存在而只是某些同志在誇張中虛擬出來的所謂缺點和弊病，統統說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化。似乎只要蓋上異化的印記，問題就得到了深刻的說明，弊病就找到了有效的藥方。「異化」論真有這般法力嗎？

王：首先，個人迷信，現代迷信，是思想上的異化。

胡：企圖以「思想異化」來說明個人崇拜現象，除了給人一幅簡單化的漫畫以外，絲毫不能說明事件的原因，更不能說明黨爲什麼能夠這樣順利地拔亂反正。

※ ※ ※ ※ ※ ※ ※ ※ ※ ※

對於個人崇拜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現象，決不能抄襲費爾巴哈說明宗教的方法，簡單地用異化來說明。

王：是否光有思想上的異化？我看政治上恐怕也有……二十多年來我們一直認爲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當然現在還要反修、防修，但是的確應該考慮一下：主要危險究竟來自何方？可能我們的主要危險還是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大家可以考慮主要危險是否在這裏。

胡：二是所謂「政治異化」或「權力異化」。



可憐的周揚

在我們的社會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有不健全的地方，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體制有不合理的地方，某些幹部中存在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甚至存在以權謀私、欺壓羣衆等腐敗現象……用所謂「政治異化」或「權力異化」來說明上述各種消極現象，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國家學說，歪曲了客觀事實，同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背道而馳。

※ ※ ※ ※ ※ ※ ※ ※ ※ ※

今天鼓吹「政治異化」論的同志們，何不學習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榜樣呢？那樣，他們或許會發現，在嚴肅的問題上輕率地玩弄異化的標籤，離開馬克思主義有多麼遠。

王：在社會主義社會，除了思想上、政治上還可能出現異化以外，經濟上也可能出現異化。當然這種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不同的，主要不是剝削造成的，而是由於不認識客觀經濟規律造成的。此外還有官僚主義的問題，體制的問題。

胡：至於有些同志把經濟工作中由於缺乏經驗，由於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而犯了錯誤，幹了蠢事，說成是經濟領域的異化，更是把異化概念濫用到無邊無際的程度。任何錯誤、挫折、事與願違，都是異化，這是多麼廉價而又萬能的科學！

王：費爾巴哈講人性的異化，馬克思講勞動的異化。這樣就一步步擺脫唯心論，走到徹底的唯物論了。

甚麼叫勞動的異化？（即是）產品本來是勞動者創造出來的，杯子是工人生產的，桌子是工人做的，結果生產出來的東西勞動者享受不到，都給人家剝削走了。工人創造出來的財富越多，他自己越貧困；他創造出來的智慧越多，他自己就越愚昧。

胡：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僱傭工人的勞動，異化爲反對和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的。社會主義的異化的說法，或者是把社會主義社會中許多舊社會的遺留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現象叫做異化，這同他們自己的異化定義相矛盾；或者是認爲社會主義在發展中由於自己的活動必然要產生出反對和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這倒是符合他們的異化定義，但等於說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是一樣的。

王：其實，晚年馬克思也講異化，盡管講得少了一點，但他從來沒有拋棄這個思想。

胡：熱衷於異化理論的同志們喜歡引証馬克思在《資本論》和準備寫作《資本論》的手稿中使用過異化概念。這也幫不了他們的忙。

關於馬克思使用異化概念的情況，在他創立馬克思主義以前和以後是很不相同的。

馬克思未及最後整理的傳世遺稿中，異化一詞使用得比較多些；但在他一八六七年完成了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只有四處使用了異化；而在他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親自作了大量校改的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他在一八七八年還曾寫信給《資本論》的俄譯者丹尼爾遜，要求他「應始終細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對照，因爲後一種版本中有許多重要的修改和補充」）中，只有一處保留了異化，其他三處都改換了表述方式，就是明證。

給走狗

范公

見「中國之春」第六期四十一頁，有中共棍子理論權威胡喬木的口號詩：「給叛徒」，讀後不禁仰天大笑，哈哈！世間真多賊賊捉賊的勾當，真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

白芒先生對該口號詩做了一些詮釋，我則來試勾勒一下胡權威的「光榮」「德行」，爲求相映成趣，恕我借用胡權威的套套兒，也來個口號詩，這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當年拜叩得勢的四人幫，乞饒狗命！

在「偉大旗手」（註）的感召下，

怎會沒卑鄙的靈魂去效忠？

且莫嫌這「喬木」老點頭哈腰

如今他扭着腰狠捧矮鄧

寫口號罵「叛徒」搖尾爭寵

臉皮厚且黑

硬是不知羞

好一個搖筆桿子的走狗！

傑作完成了

狗化成人形

任怎樣也化不掉滿身惡臭

那裡是靠山

狗頭那裡湊

祇要有骨哨

腐屍也愛嗅！

註：當年林彪稱江青爲「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手」

姓名：英文

NAME

地址：

ADDRESS

中文

零售：每本 \$ 1.5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 9.00

學生訂戶：\$ 7.00

贊助訂戶：\$ 30.00 以上

學校機構：\$ 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 12.00

平郵：\$ 4.8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美國）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務虛——務實小論



黃 弛

①務實的表象：共產黨人的

思想恐懼症

鄧小平為首的黨內改革派在國外有一個美名曰務實派，這一榮銜在國內也曾為不少人所承認。理論界的活躍份子為他們所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喝彩。這個實用主義的哲學為他們衝破思想禁區，突破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框框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闡述的「社會主義異化論」便是依據這個原理，從社會主義現實中抽象出來的。這個「異化論」是在馬列主義的古廟中，穿過毛澤東思想的廟堂，走過早期以唯生產力論為特徵的馬克思主義的後殿，從青年馬克思派的後門逸出的一種理論。而領導層中的改革份子則以「真理標準」為依據拆去凡是派所設下的層層障礙，大刀闊斧地改革。不過最能感受到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的「務實」好處的還是農民。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使最講究實際的農民得到最實際的利益。

實用主義的哲學——「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便是好貓」；實用主義的政策——允許受「籠子」限制的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允許國外資本主義經濟的輸入（包括資本、設備、技術和人員）和開闢經濟特區；這種在思想和實踐中的表現，似乎使人們有理由認為鄧小平為首的黨內改革派是名符其實的務實派。

但是在作這個定論式的判斷之時，人們却把現象和本質，具體政策與基本路線，改良與革命混淆了。要說明這點，同樣須要「務實」，讓事實去說明。

②務虛的深化過程：從「四

個堅持」到「反精神污染」

一九七八年五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務實派的理論宣言。雖然

文章作者只不過是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胡福明，但未發表前已經胡耀邦親自修改定稿。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則是務實派的政治宣言。但就是在這改革的浪潮興起之際，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務實派「務虛」本質的第一次流露。魏京生當時提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加上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相反地，鄧小平對於四化的外加條件則是政治獨裁化，即是四個堅持。鄧小平「務虛」發言很快便務實了，即落實了。他的「務虛」之言成了宣判正在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的判詞，這種務虛之言很快通過公安部門落實為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務實的「四化」路線加上「四項原則」的枷鎖，首先便產生了取消「四大」的法律行動。魏京生等民運份子成了務實派「務虛」的第一批犧牲品。其後中央發佈的「九號文件」，取締民刊和逮捕民運份子，則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犧牲者。

如果說先覺而果敢的民運份子在全國人口中只佔少數，屬於共產黨統計學分類中的百分之一，那麼對他們的鎮壓可以說對社會觸動不大。更有一些充滿幻想的人替這些「務虛」的表現作一廂情願的辯解，他們認為這些「務虛」的表態只不過是暫時對保守派的一種安撫和緩兵之計，只是暫時的姿態而不是長期的方針。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剛剛相反，這不是一種姿態而是長期不變的原則。從七九年三月提出四項原則到新憲法對四項原則的確認，直到最近「人民日報」社論的「四根擎天柱」，這個根本的方針從沒有改變過。

四項原則的提出和據此而對民運的鎮壓，是務實派在政治思想上「務虛」的第一階段，開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不稱運動的運動則是第二階段。前一階段波及的人數和範圍不及第二階段大，但第一階段涉及的是尖銳的政治問題，所以使用的手段是粗暴的專政手段。而第二階段涉及的主要是思想問

題。它主要表現在文藝學術界，所以使用的手段相對來說較溫和。它既沒有動用專政手段，也沒有文革式的大批判。不過「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上的檄文也是火藥味相當濃的。這一階段是以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為標誌而開始，追溯更早，應是鄧小平在該年七月十七日的「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據此，中央於八月發出了批「自由化」的卅號文件，砲火首先集中在軍隊作家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上，此外還有詩人葉文福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以及他在北師大的講演詞「我和詩歌」。

十二屆三中全會後開展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反右運動，標誌著務實派的「務虛」行動進入第三階段。至此，相信在第一和第二個階段仍對鄧小平寄予幻想的人，大多數已清醒了。因為回復毛澤東時代的迹象已太明顯。

這個運動也是最早由鄧小平發起的。鄧小平在七九年三月務虛會上的談話是針對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四項原則與政治民主化是相對的。他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的談話則以白樺的「苦戀」和葉文福的北師大演講詞為例，說他們「放肆」，「和我們站在對立的立場」，並說「這樣下去要亡國的」。而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講話則不點名地批評「異化論」。結果，魏京生、白樺、葉文福、周揚和王若水分別成了這三個階段運動的代表性靶子。不過，第三個階段波及的範圍和人數更廣更多，在知識界，尤其在理論界和文藝界，不少人在無形的壓力下被動地却又以主動的形式作了檢查，周揚是其中最早的一個。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在人大常委會上也作了檢查，在理論界，如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率先作了自我批評。在文藝界，正在批判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遇羅錦的「春天裏的童話」以及寫現代派朦朧詩和寫意識流小說的作者等。更嚴重的是王若冰被「調職」，葉文福可能被定性為反革命份子而失去自由。

③思想恐懼症

一代「務虛」大師毛澤東，其注重意識形態的箝制是舉世皆知的。建國後從批「武訓傳」和「清宮秘史」一直到文章的大批判，他念念不忘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浪漫型的毛澤東搞「務虛」人們不會覺得奇怪。但被稱為務實派的鄧小平在這幾年來却越來越「務虛」，從四個堅持，反自由化一直到現在的反精神污染，這倒是有點令人奇怪。

人們往往只注重共產黨不同領導人在具體政策推行上的差異，却忽視了他們都是共產黨人這個共同的本質。

「務虛」，即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箝制，是共產黨的一個本質特徵。因為共產黨能從一個秘密的小團體發展為目前幾乎遍佈世界的組織，並在十多個國家成爲主宰社會一切的執政黨，靠的是虛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共產主義的理想。這個學說是共產黨的生命之源，立黨的基礎，亦即命根子。他們在未成爲執政黨之前，是靠宣傳來吸引和鼓動羣衆爲自己奪取政權而出力。宣傳是他們最爲成功的一個手段。毛澤東的總結便是「凡要推翻一個政權，就先要作輿論的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個奪權的成功經驗在奪得政權後又反過來成爲維護政權的方法。像毛澤東這類過來人是特別敏感於「書生謀反」的隱患。有這種由經驗而至敏感最後發展爲一種病態的恐懼，有引蛇出洞和消除隱患的反右運動和文革。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和地位，他們是必然要「務虛」的，必然要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的。否則就如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講過的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務虛」的本質除了從政權的奪得和維護的需要上得到外在說明，還可從這種「虛」——馬克思主義——的內在本性得到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本性是「非人的」，這個人是指具體的個人。因爲這個學說的目的和達到目標的手段都是否定人性的。共產主義的目標是以集體主義取代個人主義。而達到共產主義所使用的專政手段更是以犧牲個人眼前利益爲絕對條件的。在自由的人頭上加上四項原則的枷鎖便是一個最近的例子。由於這種學說違反人性

，所以這種學說就有著致命的虛弱性，它不能靠人的自發性自動接受，只能依靠迷信和專制。爲了補救內在的虛弱性，它的生存便要求意識形態的絕對排他性。這一方面要靠宣傳來樹立自己絕不容許懷疑的所謂絕對真理的位置，另一方面則要不斷地批判各種異端邪說。正面宣傳是靠不計工本的愚弄，反面批判則不惜動用專政工具和無形的壓力。馬克思主義內在反人性的特徵決定了它內在的虛弱性，而這內在虛弱性却要以外在真理性作支撐。要使這種真理性得到人民的信仰和信任，就必須大肆宣揚和實行對「離經叛道」學說的大批判。只要共產黨失去了這個生命之源，它就真會亡黨，但國是不會亡的，人民之國是不會亡的。

務實派的根基原來仍是在「務虛」的土壤之上。在這種「務虛」的土壤裡，在這種充滿腐敗思想氣氛和在專制的政治環境之下，「實」的經濟大成果又怎能取得呢？四化加上四個堅持這種廿世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公式變形，只能導致十九世紀洋務派搞洋務運動時那樣的結局。



彭德懷故居的題辭

董立仁

「彭德懷同志是英勇的共產主義戰士」這是陳雲最近為彭德懷的湖南「故居」所做的題詞。在這個題詞中，陳雲對「英勇」一詞的使用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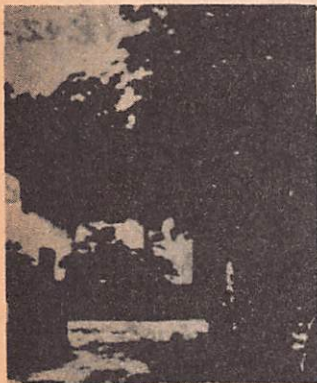
彭德懷身為中共的元帥，大半生征戰疆場，讚他「英勇」當然可以。但是，包括林彪在內，哪個元帥不「英勇」？如果不「英勇」何以能被授銜為元帥？

筆者認為，陳雲的用意不在於肯定彭德懷戰場上的「英勇」，而在於贊揚他性格的剛直不阿。對上，他敢揭毛澤東的錯誤；對下，敢和「造反小將」頂牛，這確實比在戰場上揮軍百萬、英勇奮戰還要困難得多。

當年毛澤東頭腦發脹，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和



彭德懷與夫人潘安修在延安機場



土法煉鋼，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之際，中共的高層領導者中，包括至今健在的鄧小平（當時的黨總書記）、陳雲（當年的黨中央副主席），有誰曾向毛澤東提出過異議？還不都是為毛澤東的愚民政策及錯誤主張鳴鑼開道？而彭德懷却能深入調查研究，體恤民心，勇敢地給毛澤東上萬言書，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這種表現確實是一種「英勇」的行為。待毛澤東老羞成怒，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發難之時，又有哪個大人物站出來為彭說句公道話？還不是個個爭先恐後充當毛澤東的幫兇打手，竭力表現效忠「主席」，最後一致舉手表決，將彭德懷貶回鄉？

彭德懷的「英勇」還表現在「文革」的批鬥會上。他敢於和已經達到瘋狂程度的「造反派」據理力爭。即使遭到毒刑拷打，受盡非人的折磨也不說句軟話。這種人，不要說和那些助紂為虐的野心家、明哲保身的軟骨頭、專和稀泥的兩面派相比，就是比起已經受到批判，還要表示「我是忠於毛主席的」鄧大人來，彭德懷也不僅表現得「英勇」，而且，人格也高尚得多。

今日陳雲贊揚彭德懷「英勇」，無疑是承認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懦弱。

彭德懷所以「英勇」，因為他無私，無私即無畏。與之相比，其他的大人物之所以懦弱，屈服於毛澤東的淫威或當了毛澤東的幫兇，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為止，在中共黨內的高層幹部中，像彭德懷這樣的「英勇的共產主義戰士」實在太少了，他們多數患有「崇拜狂」和「軟骨症」。誰的資格老（不管是否老而昏庸）、地位高（不管是否高而無能）、權勢大（不管是否大而自私）就把誰吹上天、奉為神。真是惡癖難改，品性難移。

彭德懷儘管晚景悲慘，飲恨而終。然而，他比起那些靠着阿諛奉承，出賣靈魂，玩弄權術而至今身居要職的幾朝元老，至少在黎民百姓的心目中顯得更更有地位。



陳若曦談文學

與政治

本刊記者

今天（二月廿二日）下午，女作家陳若曦應香港市政局之邀，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中文文學創作」。

在演講中，陳若曦說，寫政治題材的小說兩面不討好，往往會同時受到左右兩方面的干擾，所以，她今後決定不寫這一類題材了。她說，寫愛情小說便可以避免上述麻煩，她今後會多寫愛情小說。

但是，陳若曦顯然沒有看輕文學的社會功用，而且，她所肯定的那種功用，又都與政治有關。比如說，她看見海外的中國人一盤散沙，既有左派、右派之爭，又有香港人的圈子與新加坡人的圈子之分，比之无太人的團結，相差實在太遠了。她希望海外作家能用自已的作品去鼓動海外中國人的民族團結心。

與此同時，她又告訴大家，前不久，當她見到台灣的「離心作家」王拓與楊青矗他們時，曾對他們說，作家不一定都要直接捲入政治的漩渦。文學對政治既有簡接，又有直接的影响，有抱負的作家，完全可以相信自己在這方面是大有可為的。

她說，文學的功用就像是吃中藥一樣，功效是漸見性的，作家不必急功近利，也不應恢心喪志。

最後，當她回答聽眾的問題時，亦一再觸及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譬如，人家問她，作家的創作動機與作品的社會效果，是否往往會與政治牽連在一起時，她作了肯定的回答。又譬如，當她被問及，由於她曾經在幾個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生活過，她有沒有因此而想到要寫一部史詩式的作品時，她的回答是：她沒有這樣的想頭，但是如果可能的話，她願意在這方面努力。

看來，如果她沒有因為某種理由故意言不由衷，陳若曦的內心是矛盾的。一個自信還沒有喪失民

族感情的中國作家，處在今天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想避開政治獨善其身，實則根本不可能。沒有社會良知的作家不可能成爲有出息的作家，而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幾乎沒有一種社會良知不會與政治連在一起。陳若曦寫尹縣長一類的作品，其實不過是一種社會良知的反映，但是陳已經把它們當成政治題材了。

所謂寫愛情可以不必受到政治煩擾，這要看有什麼環境。「污染小說」「離離原上草」，只因爲用肯定的筆調寫了一個愛上國民黨將軍的寡婦，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到政治上的麻煩，所以陳若曦，應該知道其寫愛情可以避免政治麻煩的說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作爲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和同胞愛的作家，我們爲什麼不更多地爲不適用於這句話的同胞作家想想，並以自己的有利條件幫他們爭取不受政治煩擾的創作條件？

看來，作家會不會遇上政治麻煩不一定與寫什麼題材有關。在許多國度裡，寫政治題材根本不會遭遇麻煩，但在中國這樣的政治現實中，寫愛情同樣也會遇到很大麻煩。

希望有更多的作家不要怕自己的寫作題材觸及政治，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人，走到那裡也逃避不了政治，政治沒有什麼可怕的。





老華僑的心聲

老華僑

老人在香港讀小三的時候，每天放學回來，必守在門口等「星島晚報」。報紙一到手，他就能朗讀出世界新聞給我作報告。來了美國之後，因為惡補英文，一下子就都忘了。

他去芝加哥上大學，臨行之前，我對他殷殷致囑：「在大學裡，有機會學習中文就千萬不能放棄。多多結交中國同學，尤其是台灣來的（因為那時仍未有大陸學生），特別是向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學講國語。你是本地人，有家在這裡，他們沒有。放假時，帶他們回來住，這是我們中國人固有的道義。從前在大陸，很多人到外地讀書，都會得到當地同學的家裡人照顧。」

第一個寒假開始，老大果然帶了六條大漢回來，我逐一問他們，五個是香港生，一個是東非生。我問老大：「你沒有認識到台灣學生嗎？」他還未開口，他的同學就搶先回答我：「伯母，台灣學生很驕傲，看不起我們廣東人。」老大補充說：「尤其是看不起台山仔呀，媽咪！」

我皺起眉頭想想，總算想出道理來了。我解釋給他們聽：「因為台灣近年來在各方面的成就很高

，受到世界各地的稱譽，他們的留學生也人才輩出，所以就自覺高人一等；好像白人看不起有色人種一樣的心理。還有就是你們之間言語不同，所以無法溝通。我希望你們學講國語的道理就在這裡。過去我看台灣作家的小說，在文字上發現過很多留學生罵廣東佬、罵台山佬的事。老一代的華僑，很多文化低落，在言語不通的情形下常起衝突。在華埠的雜貨店，我遇見過幾次這樣的場面：店員罵台灣人：「你係中國人，點解唔講中國話？」因而令到他們以為廣東佬都是不可理喻的。

有機會談話的時候，我又問到他們對自身前途的看法，他們都說不預備回香港，因為香港將來是會給共產黨收回的（那是八年前的事）。過去我雖曾親身經歷過中共的壓迫，但後來因為來了美國，沒有機會常常進大陸，縱然從書信的來往知道「文化革命」的恐怖，但也不十分了解其真實的情況。所以對於那些年輕人的想法，除了同情與感慨之外，自己也因為對他們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而慚愧。

老大學得一手好廚藝，他們索性租了一間屋子，在那裡經常聚了幾個留學生，儼然成了一個不具

形式的「留學生會」。他們畢業那一年，我剛去大陸回來，我也參加了他們的畢業典禮，回到他們的屋子談天說地。談話間，竟然全部的香港生都說不回香港去。我很驚嘆，我把我在大陸的所見所聞一一講述給他們聽，還把大陸內的年青人對現行政制如何反抗，他們如何努力掙扎希望開創一個新局面的事實告訴他們。他們有些是唯唯諾諾不表意見，有些則消極的回答我：「伯母，我爸媽對我說，不要對中共存有半點幻想，他們說在大陸上的人說一句國民黨或台灣，都會腦袋落地，唱幾句許冠傑的歌也要坐牢，這樣專制的政府，我們是不能做它的人民的。現在有機會不逃走，恐怕將來成了甕中之鼈想逃也逃不掉。走了出來管他搞成什麼樣子都不理了。」

我很感慨地說：「你們的想法錯了。要知道逃避不是辦法。你們也讀過古文了？「遠話異國，昔人所悲。不做自己國家的主人，跑到外國去受人岐視不是很好受的。而且不要以為在外國會永久安定。請看越南華僑，他們在越南的歷史夠悠長了吧？結果還是讓人家趕到絕境。還有你們的父母在香港努力建立起來的基礎，就這樣白白放棄了，是不是犧牲太大？過去大陸的人逃到香港，苟安了二三十年之後，結果又面臨一次大逃亡。一味顧逃走，能夠逃到那裡去呢？共產主義像瘟疫，像洪流，四面八方氾濫開去。年輕人放眼世界，那裡沒有共產主義在顛覆擾亂？如果我們不拿出勇氣來面對現實，哼！說不定將來在美國也要逃亡，在台灣也會。」

「我們香港人能夠怎樣？又沒有一槍一炮。」
「我沒有叫你們跟中共打仗呀！中國人永遠不
打中國人的。你們有嘴巴呀。用你們的唇槍舌劍去
抵抗，趁你們今天還有自由說話的機會，為什麼不
好好利用？大陸上的青年人比你們夠勇氣，槍尖指
住他們也敢反抗。」

「伯母，你說得輕鬆，因為你的兒女都在美國
。」

「你別誤會了，我不是這樣自私的人，我已經
幾次叫老大回中國大陸做劃則和建築師了。如果大

陸需要他，我會鼓勵他回去。」

「你不要傻啦，媽咪！你當我是貝聿銘呀？中國自己有很多劃則、建築人才的，沒有宣傳價值的人物，誰要我呀？」老大這樣說。

「伯母，你又知不知道中共害死了多少華僑？我坦白說，沒有這個勇氣去為中共做事。」

「我那有不知的道理。廿年前，我在香港已認識了一個星加坡華僑青年，她對我說：『受夠了中共的摧殘。』逃出香港後，星加坡政府又不准她回去，迫得流落香港。這裡有一個與我每天同一班車返工的印尼華僑，她知道我去大陸回來，竟然在車廂裡當眾灑淚，哭訴在大陸遭遇到的苦難。奈何這是我們的祖國，我們與她分不開，割不掉。雖然祖國這樣傷害了我們，但那裡有的是我們的親人，我們的同胞。我回去不是為崇拜共產主義，我是為愛祖國而回去，回去看看曾經印有我童年足跡的土地，看看我違別了幾十年的朋友，那份喜悅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也是無法比較的。』

我不知道他們對我所講的話有什麼感想。

後來老大帶我去探親，在路上他無限感慨地對我說：「媽咪，你對他們說的話是白費心機了。他們從不關心國家的事，祇知道拼命追女孩子，有了居留權就不必去受共產黨統治。」

也難怪他們的，中共對待人民實在太過份了。如果深圳那裡不是防得這樣嚴密，連大陸的樹都會跑掉。今天的中國大陸，正像個病入膏肓的病人，如果個個撒手不理，有正義的人和有才幹的人都通通逃到外國去，剩下那些混蛋對她亂投藥石，結果一定會把病人弄死。

「……………」
前年，一個遠在加拿大的朋友，知道我的老人在芝加哥做事，她寄來一封信，要求老大代為照顧兩個來自大陸的自費留學生。他們是大陸一個醫生的兒子，得到這裡朋友的資助，考進芝加哥一所醫學院，他們說是決定不回大陸，所以輾轉託朋友照顧他們，並介紹他們作假期工作。我當然是義不容辭答應下來，還把原信寄去給老大，再打了個電話

紐約華僑在街頭舞龍



詳細對他說明白了。

後來通過女兒的工作關係，以及我自己的工作關係，倒認識了好幾位自費留學生。有些台灣來的，有些大陸來的。其中有一位很特別的大陸留法學生，竟然利用暑假來到紐約找工作。我好奇地問她為什麼這樣跋山涉水而來。她說反正有了自由，她就要充份利用自由，喜歡那裡就到那裡，去看看自己一生從未見過的事物。但是自己的學費都是僑居法國的阿姨幫助，總不能再用別人的錢旅行，於是用工作的方法來完成自己的心願。也順便親自體驗一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方式。我問她感覺如何？她說很好。

連廣東粵劇名伶陳笑風的女兒在內，她們都說怕了共產黨不再回去。這種逃避現實的風氣令人覺得悲哀。

去年，忽然在大陸留學生之中發出了異彩：「中國之春」民運誕生了。

我為此消息興奮得向親友奔走相告，我說中國民族復興有希望了。可見，中國有思想、有作為的人不少。雖然他們年輕，缺乏經驗，但其心可敬，其志可嘉。我們應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協助他們完成拯救中華民族的偉大使命。也希望藉此，有助於解救香港五百萬同胞的困厄命運。

日本“讀賣新聞”對中國民聯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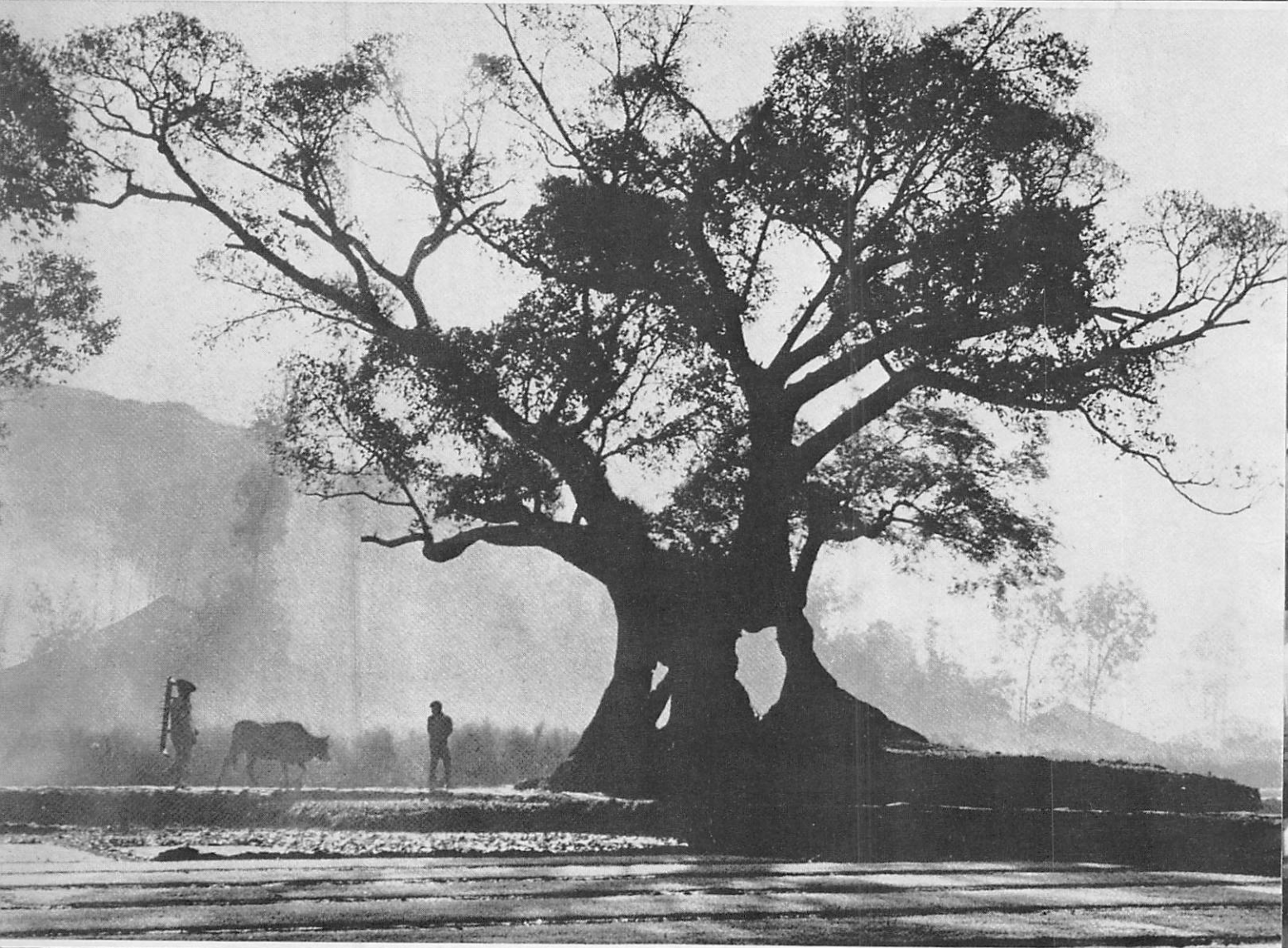
「中國の春」名称 変え活動開始

海外留學中の中國人で組織する民主主義要求グループ「中國の春」が、昨年末、米ニューヨークで結成以來初の世界大会を開き、「中國民主團結聯盟」と名称を変えて活動を始めたことがこのほど、読売新聞社に届いた文書で明らかになった。

同文書によると、世界大会は昨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から四日間におこなわれ、アメリカ、ヨーロッパ、香港、日本など二十数か國の支部代表五十三人が参加。三十五人の本部委員と九人の常務委員を選び、主席に「中國の春」(八二年十一月成立)発起人の王雨暉、副主席に汪展の両氏を選出した。

讀賣新聞 (1986) 59. 1. 16日記事

家們生長的地方



邵家业摄

憶江南 三首

白居易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

最憶是杭州：

山寺月中尋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頭。

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

其次是吳宮：

吳酒一杯春竹葉，

吳娃雙舞醉芙蓉。

早晚復相逢。



不说自己的家乡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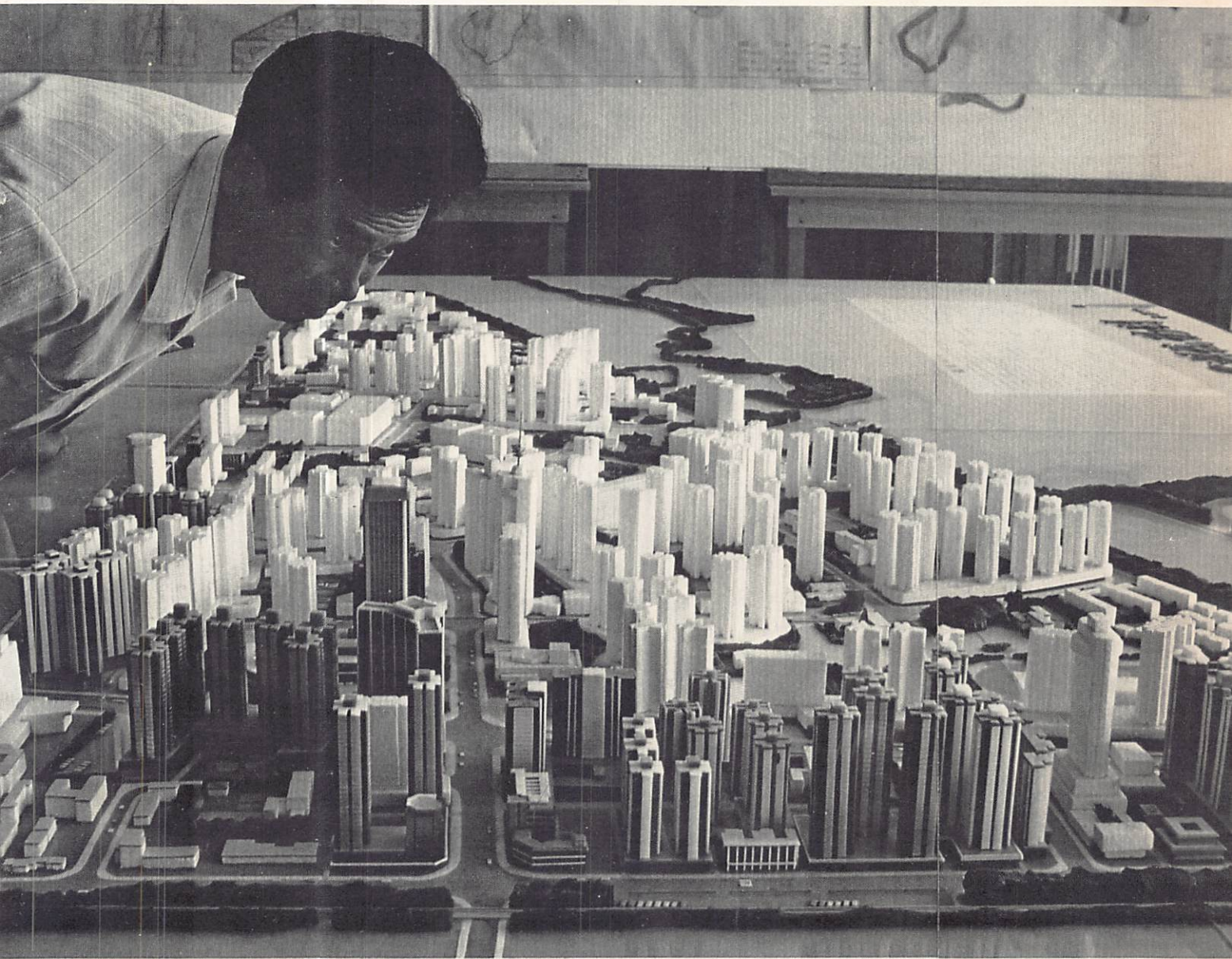
誰不懷念自己的
母親



誰



誰不懷念自己的
童年



誰不願自己的家鄉好？

尋根記

雁子

編者接：

尋根記這篇作品代表了留學生、海外移民思念家鄉的心情。身在異鄉的同胞都有自己的母親，都有自己的孩童時代，看了尋根記也會想起自己淚別故土，淚別母親時的情景。誰不思念母親？誰不懷念家鄉？又有誰不願意自己的家鄉好？中國民聯的每個成員和大家一樣渴望着回國，難道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爲了人們回國後能過平安幸福的生活嗎？

朋友們讓我們携起手來，爲返回祖國，在自已的故土上過真正人的生活而共同努力吧。

十三年前的一個夜晚，我跟同伴一行五人，在風雨交加的惡劣氣候的掩護下，突破邊防軍的警戒綫，跟驚濤駭浪搏鬥了四個鐘頭。終於抵達香港。後來又遠渡重洋，輾展來到美國。現在，我已從一個勁頭十足的青年，步入了老成持重的中年，孩子也有三個了。孩子們都是在美國出世的。從他們呱呱墜地時起，我就許下了心願，要帶他們回大陸走走，在他們的祖母墳頭叩個響頭，我要他們銘記住：孩子，不要忘記你們的先輩是從那裏來的，這裏就是你們的「根」！

母親去世得太早，也太突然。她沒有福氣看到她的美國孫兒，在撒手塵寰的時候，也不能再見她的心愛的兒子一面。

跟母親訣別，是在我臨行前，吃她燒的那頓「最後的晚餐」。滿桌菜餚，是母親平時節衣縮食，

將肉票、魚票，一點一點省下來，還有一些，是母親托人從新市等墟鎮，高價買回來的。母親叮囑我，要多吃些，盡量多吸收蛋白質，這種天氣出門，體力消耗大，如果營養不夠，是抵受不住爬山涉水的煎熬的。母親還爲我買了新鞋，她說穿新鞋，走新路，不會走回頭路。

母親的話，使我心中流淚。她說，希望我這回去，就不要再回來了。我強制着自己，笑着對她說：媽媽，不會的，不過那將是「衣錦榮歸」的日子罷了。母親被我逗得笑了。至今我還清楚記得，這一抹笑容裏，所隱藏的預感和悲涼。

臨行，我沒有吻別媽媽，連看她一眼也沒有，僅說聲，「媽媽多保重，孩兒這就去了」，頭也不回地出了家門。我感到，只要稍有遲疑或留連，感情的堤防將被沖決，而一發不可收拾。因爲這也許是永別，跟我我養我，哺育我成長的母親生離死別。

噩運傳來時，我還在香港。家裏人來信告訴我，千萬不可回家奔喪，因爲我在大陸的身份，依然是「壞分子」、「偷渡犯」、「叛國投敵」，回來正好自投羅網。於是，事情比預料的還要悲哀，我不但真的跟親愛的媽媽永別了，連回家扶靈的機會也沒有了。然而香港與廣州，僅是一水之隔，買張直通車票，兩個鐘頭就到了。

記得一位流亡台灣的國民黨前立法委員寫道：

葬我於高山兮望大陸，

這不正是現代中國人悲劇的寫照嗎！

家裏來信說，母親的彌留，延續了一個星期。在彌留中，老人家把我從香港寄回去，爲她治病的藥瓶放在枕頭邊，又把一疊鈔票，分給幾個兒女，其中一份，放在一個盒子裏，安靜地放在床頭，像是在等待她的另一個兒子，一定會在她臨終前回來……

媽媽，十三年後的今天，您的兒子終於回來了。這天，風和日麗，爸爸領着全家，帶上一些簡單的供品，來到銀河公墓的骨灰堂。穿過一排排高大的陰森森的骨灰櫃，我們找到了屬於媽媽的格子，爸爸叫我把媽媽的骨灰盒捧出來，一邊說：

「素琴，雁兒回來看妳來了。」
我將冰涼的盒子揣在懷裏，是想要讓老人家，體驗一下人間尚存體貼和溫暖，而這體貼和溫暖，不正是您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嗎！這份遺產看來平凡，却是人類生機相傳的精髓所在。任何戰亂殺戮，或者「運動」「文革」，都搶奪不走這份「寸草春暉」。

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學校裏的教科書分明寫着：「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是毛老太爺手中的緊箍咒，如果你要在這個社會爭上游，就必須照做如儀，那就是：黨性跟人性相衝突時，你必須堅持黨性，戕殺你的人性。

然而，烏雲遮不住太陽的光芒，毛老太爺手中的緊箍咒，鎖不住社會的良知。雖然，母親的去世，留給我創痛，但是現在，這個當年被入了「另冊」的、不爲黨性所教化的「壞分子」，不是終於回來奔喪來了嗎？

「好媽媽，孩兒來晚了，真對不起！」
我抱着「媽媽」，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簌簌的淚水滾在烏亮的盒子上，淌出一條道兒來。我在異想天開：媽媽一定理解兒子的歉意，聽得見兒子的祝福吧。

從骨灰堂出來，沿着石階信步而下，我的眼淚一直流着，心裏却覺得順暢。回來探望您老人家，這是我多年的夙願。等一會，我還要您老人家看看，您的幾個可愛的美國孫兒呢？

骨灰堂腳下，是一條沒有修飾的泥土林蔭道，樹下疏落排列着一些用花崗石開出來的石條檯，可

能是別無設施的緣故，人們就用這些簡陋的石槌拜祭。

正當我們架起媽媽的靈位，放上供品，開始祭候時，不知從哪裏吹來一朵黑雲，稀里花啦地落下雨來。我們只好走避到附近的一個亭子裏，繼續我們的追悼儀式。正當我引着孩子們，向祖母行三鞠躬禮時，硬是被一個嚷聲打斷了：

「亭子裏不准拜祭，快走，快走。」

肅穆莊敬的氣氛被擾亂了，我很不痛快，自鄧小平上台以來，大陸開放好幾年了，每年來賓絡繹不絕，爲什麼這些小幹部還是那麼硬梆梆，而毫無長進呢！

「他是華僑，第一次回國，可不可以讓我們做完再走呢？」姐姐忙不迭地跟來者解釋。

「華僑又怎樣？不行……」。

似乎「華僑」二字，使這位小幹部肝火大動。後來，他爲了「教訓」我這個「假洋鬼子」，以出外午膳爲理由，將骨灰的大門破例地鎖上。大概這是他可以行使的最高權力吧。聯想起海外華人家喻戶曉的「魏京生」案，是由於洩漏了「國家機密」給外國人，被判重刑十五年。是不是這滿堂骨灰，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機密，而這位小幹部大人，必須對我這個回鄉吊唁的「外國人」提高警惕呢？許多的回鄉客，都有過形形色色的不合理遭遇，他們喜歡以「左毒未清」一言以蔽之。在我看來，這「左毒」，就是這個社會形態的本質，談不上清與未清。

銀河公墓分爲兩邊，我們這邊，是平民的遺骨，他們生前，有些可能是「資產階級」，甚至「階級敵人」；而另一邊，却是無產階級大人物的禮葬地。學生時代，曾參加共青團組織的清明烈士掃墓，地點就在那邊的銀河公墓。那裏，殿宇輝煌，古柏參天，板石鋪路，墓碑井然，是個供人憑弔，發幽古思情的地方，跟這邊迹近亂葬崗的寒愴相，形成鮮明對比。以工作性質而言，那邊是服侍「無產階級」的亡魂，這邊却是乏善可陳，是「階級鬥爭」的場所，難怪這位「同志」出言不遜了。從活人到死人，這個社會，處處都有一「左毒」流行。百年前的那種「義和團」心態，剝開「左毒」，你就可以品味出來。

好了，言歸正傳。爲了使九泉之下的媽媽不受

驚嚇，我趕忙將媽媽的靈位移到亭外。準備就緒，天已轉晴。但奇怪的是，剎時間，天上響起兩聲滾雷，還灑下幾點細雨，像是天上人間的對話，媽媽在回應兒孫的慟哭，並爲他們的前程祝福。

掃墓畢，我又捧着靈盒拾級而上。這時，那「同志」的「嚴懲」還未結束，殿堂重門深鎖。我抱着媽媽，索性在門外坐下來。我并不介意這閉門羹，陪着媽媽，多呆些時日，不是很好嗎！大堂裏陰森黑暗，您一人獨處，一定寂寞孤苦，您能不能現身出來，讓孩兒接您回家呢？

從小接受「無神論」教育，現在，倒是希望有神、有鬼、有靈魂。剛才的兩點和雷聲，給我以信念：這次回來時，訂了南韓○○七客機，轉念間，換了航空公司，逃過大劫，這件事，又給我以信念；媽媽去世不久，一天，我夢見媽媽，她在窗外，向我招手，當我猝醒，屈指一數，正是七七四十九天，傳說中的魂兮歸來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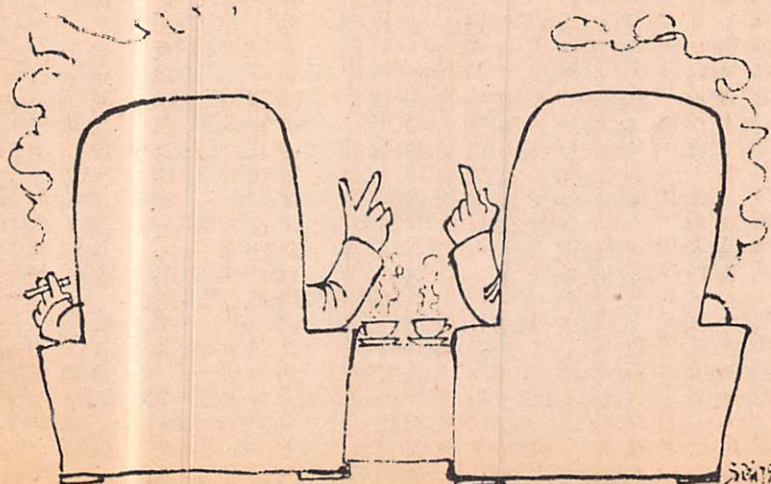
從過去的紅衛兵時代到現在，年紀大了，生活上，變得十分唯物主義，換句話說，很現實；精神世界却滲進了不少唯心的成份。不管唯心對抑或不對，它卻可以憑藉豐富的想像力，滋潤乾涸的心靈，救治人生的創痛。如果社會奉行「徹底的唯物主義」，人的內心世界會變得狹隘、暴戾，「左毒」不脛而走。

新生的信念使我相信，媽媽不是住在那大櫃子的格子裏，她生平克勤克儉，俸公守法，然而却在「運動」中，曾被奸人陷害，受過冤屈，爲了下一代，她茹苦含辛，默默地忍受一切。現在，她老人家應該上了花香鳥語的天堂。而那些「無產階級」的哀哀諸公，大如「五人幫」、「四人幫」、康生，小如保衛科的人事幹部，以在「運動」中整人爲是尚，雖有堂皇墓殿，難下地獄受煎熬。

我把妻子兒女招過來，將媽媽供在懷裏，開始跟他（她）們講一個十分平凡的，但充滿血淚的、一個現代中國人尋根的故事。

一九八四年 陰曆元月

子雁 於美國



國事閑談

——我們廠又虧損了一百萬，你們呢？
——兩百萬。

問題與觀感

江心

一、當今世界似乎人人忌談哲學。談哲學有類談禍，宇宙觀好像是天文學家，氣象學家的事；人生觀好像是宗教家，道德學家的玩意兒。個人偏見認為一個人沒有宇宙觀，便無從確立他的人生觀；一個人沒有人生觀，便是他立身處世沒有立足點。在現實生活的人間，人人對於天地鬼神，人情物理，立身處世，好惡愛憎，各有各套。自然形成，誰都難免。不過人們熟而習之，不知不覺，不去承認它罷了。個人認為事實上既然人人有一套，索性承認它，正視它，討論它，辨別它，掌握它，難道不是很應當，很正當的事麼？

- 二、個人堅信自然科學對於宇宙和生物的起源及其演變的解釋，相當正確，故對於聖經舊約創世紀的描寫及預言存疑不信。本於此種信仰，個人對於人類行為相信科學的人文主義（SCIENTIFIC HUMANISM）。所謂科學的人文主義，包括下列各點：
- (1) 多元而非單元；
 - (2) 相對而非絕對；
 - (3) 真理、道德和美術觀念均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 (4) 人的秉賦智愚不同，但一樣都有其獨立的人格；
 - (5) 人有獨立發展其個人才智的權利；
 - (6) 人與人之間應互相尊重，仁愛相待；在法律範圍內平等競爭；
 - (7) 所有宇宙世界，國家，社會，個人問題皆應用科學方法處理解決；

(8) 篤信民主政治；

(9) 篤信各種文物制度皆人所設，且係為人而設；

三、資本主義已屆沒落，臨近崩潰之說，膾炙人口，垂數十年。至今西方國家，經濟循環發展，時漲時落。近年普遍衰敗景象，幾無倖免。到底是已到期崩潰邊緣呢？

四、社會主義主要的原則為一切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財，勞力及生產工具）屬於社會（公有）。生產方式是「各盡所能」；生產的目的是「各取所需」。世界思想潮流，演進至於今日，此種思想應當為舉世共同努力奮鬥之目標。當今世界各國揭發社會主義者為數甚多，而其政綱政策，懸殊各異，視各國歷史背景及實際環境而定。各國背景與環境演變不同，無有止境，豈非各國將有永遠不同之社會主義？大同世界莫非將如今日之教會，一個上帝，一個耶穌，無數教派，各有是非，各奔前程？

五、世界歷史啓示我們：人類自草莽洪荒進入遊獵時期，又由遊獵時期進入農業社會，再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政治社會組織統治之權大致演進方向為神權、君權、民權三個階段。近數十年有黨權突現人間，民權大受威脅。此種趨勢，進步乎？倒退乎？人們似乎應當有所抉擇。

六、世界上擁有政權而實行共產的國家，應以蘇聯與中國大陸為代表。這兩個國家實行沒收人民私有財產及所有生產工具，一切生產事業均由國家控制管理。儘管有人把他們同法西斯的「國家資本主義」相提並論，但以他們堅持澈底防止私有財產

制度復活一點言，他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似乎無可懷疑。一個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其經濟政策必然走向經濟民主的道路，應當亦無疑問。但是放眼今日的蘇聯與中國大陸，在政治制度和社會政策方面，堅持「黨主」的意識型態，在政治民主與社會民主兩方面顯出落後，與西方民主國家如美、英、法、德等國比較，相去甚遠，有目共睹，無待繁言。

相反地，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深入人心，根蒂牢固。在所謂自由競爭原則之下，財富集中，有增無已；富者益富，貧者益貧。雖有國家立法如反托拉斯、禁制壟斷、擴大社會福利範圍各種政策，終嫌溝渠日濶，積重難返。

個人想法：蘇聯與中國大陸在黨權統治之下，形成黨人特殊階級，騎在人民頭上。世界上那有特殊階級不保護他們階級利益並企圖長久掌握政權之理？（南斯拉夫前副總統吉拉斯所著「新階級」一書，對此問題有精闢之分析。）豈非政治民主在蘇聯與中國大陸將永無實現之日？西方國家則主權在民，憲法明文規定。登台下野，選舉決定；政權交替不憑槍桿子，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國家教育日趨發達，人民教育程度日益提高。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實行改良政策，適應人民需要，則循序漸進，人民生活逐步改進，有何不對？如果資本主義者頑固死硬盲目倒退復古，走到末路，自掘墳墓，則人民覺醒，揚棄資本主義，取消私有財產制度，由多數人民投票決定，無需流血革命，豈不甚妙？這是不是痴人說夢呢？

七、社會主義者主張財產公有制度。這當然是人類至高無上之理想目標。實現此目標之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如蘇聯、中國；革命必須流血，血流成河，慘酷令人咋舌。而蘇聯紅色政權超過六十五年，至今民食不足，政府一直不敢相信自己人民；中國大陸政府掌握政權三十餘年，大眾人民生活水準雖有進步，與現代國家人民一般水準比較相差尚遠，憲法四次修改，證明政局迄未走上軌道。如此情況，不是證明以暴力革命手段成立之社會主義政府，尚不足為世界求進步國家的模範嗎？

第二種由人民選舉議會制度而成立的社會主義

政府，有時被人譏諷為，虛偽的社會主義國家。按之實際，如果承認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則人民用投票的方法，推翻已存在的政權，不必流血而一樣成立社會主義的新政府，如近年法國及西班牙兩國政府均屬於此種模式，有何不可？

八、社會主義公有財產是一個人類理想的目標。人民生活的形式與習慣隨社會環境與教育學習不斷適應，不斷改變。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似乎無妨用逐漸進步的模式更見實際。因現在大多數的人類社會，私有制度深入人心；智愚勤懶，差別懸殊；平等生產，平等分配均非一躍而能成功者。惟有教育文化更加進步，科學技術更加發達，政治制度法律規章更加改良又改良，人類才有達到真正平等的境界。

九、專制、獨裁、極權的統治是一脈相傳的政治體系。傳統的專制獨裁政體普通限於政治範圍，即是這種政權實施專制，成立獨裁政府，其人民惟有俯首貼耳，服從政府命令。但因其保留私有財產制度的關係，其人民經濟社會的活動尚能保留相當程度之自由。極權統治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沒收全國土地及人民財產，澈底取消私有制度；國民經濟、政治、社會的自由權利完全化于烏有；極權政府首領權力超越農業社會的地主之上，中世紀神權時期教皇之上，君權時期帝王之上（秦始皇帝之上，亞力山大之上），掌握全國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教育之大權，生殺予奪，唯我獨尊。這種政權視人民如無物，人類進化到了今天，我們能接受這種意識型態的統治嗎？

十、西方民主政治演進至于今日，有下列顯著之優點：

- (1) 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普選定期，不容更改）。
- (2) 多元主義（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
- (3) 妥協容忍，掣肘與平衡（CHECK AND BALANCE）。
- (4) 政治組織制度化，系統化，三權分立，權責分明。
- (5) 尊重人權（法律前人人平等）。

西方國家有識人士繼續奮勇鬥爭，力謀上述各點之普遍實現，惟恐不及。數十年前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之說風靡一時。而中國知識份子

至今尚有不少人認為民主政治「乃老番玩意兒，不合咱們炎黃子孫國情」者。嗚呼！辛亥革命至今垂七十年，先烈先賢仁人志士，擲頭顱，流鮮血；爭取「共和民國」，爭取自由民主，前仆後繼，難道他們全是笨蛋，傻瓜？他們所流鮮血不值一文錢？

十一、個人觀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可能性不大。理由如下。

(1) 雙方打鬥必有一方先動手。目前情勢蘇聯國內經濟情況一團糟，對外關係亦不妙。所有東歐衛星國家，那有一個真心靠蘇聯？波蘭過去一年之情勢最為顯著；阿富汗泥足深陷，進退維谷；伊朗反美高潮之後，照理蘇聯大有機會插手，於今兩年過去了，未見端倪。最重要者蘇聯軍備絕未超越美國（時下過份誇張蘇聯軍備超過美國之說絕不可信），而其國內民食堪虞，那能發動世界戰爭？

(2) 美國是個「掣肘與平衡」（CHECK AND BALANCE）的國家，不容任何人隨意發動戰爭。特別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戰勝德、意、日本，不但不能得到割地賠款的報酬，反而需要大力援助戰敗國。使其經濟復原，政治安定，以免拖累，所為何來？韓戰越戰的經驗尤其慘痛，所受經濟及士兵死傷之災難，國民公意因此而分崩離析，均為莫大之創傷。沒有人民熱烈擁護的對外戰爭，在美國政治情況之下，是無人能夠發動的。

(3) 蘇、美兩強都為客觀環境所限制，不能先下手打人，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從何處發動呢？當然有人說：過去的世界大戰，均從小國先起火，逐漸蔓延，惹成大禍，不可收拾。個人不否認世界將有無數地區的小戰爭，但是大規模的世界大戰似乎還相當渺茫。中蘇邊境雙方陳兵百萬以上，劍拔弩張，歷有年所，尚無走向一觸即發的情勢。可知大權在握的人都比較小心謹慎得多，不是嗎？

十二、中國現有的兩個政府，全靠槍桿子起家。他們說：「天下是咱老子們打出來的」。所以他們把國家看成囊中物。「朕即國家」，不容置疑。要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承認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豈非夢囈。怎麼辦呢？再來一個革命，培養一個新武力來奪取政權，假定可能，假定成功，亦恐怕再來一個「以暴易暴」的局面。（不要相信草莽英雄，也不要相信革命導師。華盛頓不肯登基作帝王，孫中山毫不猶豫讓出總統高位，是歷史的

偶然，不可希望其常有。）千萬要不得，怎麼辦呢？

十三、在極權政制之下，當權者隨時可以撥動大石頭（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政權、民主思想，顯就是南轅與北轍。故所謂「新民主主義」，「民主專政」，「最新最理想的社會主義」等口號名詞都是共產主義者的花腔濫調，與民主精神，民主制度完全是兩回事。

十四、中國大陸與台灣應當統一，是絕對大多數中國人一致的要求，毫無疑問。但是統一的方法如何呢？那就問題很多了。個人堅信方法最重要之一點：一定要用和平方式，反對用戰爭方式。任何主張動用武力者，都是中國統一的罪人。因為戰爭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無比的災難，千萬要不得。可惜兩國政府都在彈民主調兒，實行不折不扣的「黨治」。沒有民主法制的政府，政權嬗遞不循法律進行，當權者永遠抱定我是你非的態度；反對派除用暴力革命手段爭奪政權之外，永遠抬不起頭來。在這種情勢之下，怎麼能有和平統一的能行方法呢？

十五、大陸政府近年盡力鼓吹並推行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台灣亦在進行十大建設，都是好事，沒有問題。可是個人愚見，以四個現代化為標準，台灣、南韓都算已經搞得不錯。然而台灣政治情況，迄無明朗景象。總統蔣經國年老病多，一朝意外，何人接替，人民矇在鼓中。南韓樸正熙慘死於親信助手之下，全斗煥政權親信貪污以億萬元計，那是什麼政治？大陸人民憂慮四人幫蠢蠢欲動，禱告鄧小平萬壽無疆。所以「四化」建設儘管很好，謂其足以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個人實在不敢相信。怎麼辦呢？

十六、人人都想上天堂。你我都人，那有不理想上天堂去享受理想無窮幸福的道理。可是偏偏在現實的人間，天堂還是可望不可即。無可奈何，祇可想法子在這個人世間活下去。個人想到而願意身體力行的立身處世的態度大概如下：

- (1) 相信各個人均有其獨立的人格，均有獨自發展其聰明才智的權利。
- (2) 在現實社會環境中，應充分培植自己獨立的人格與能力（包括經營財產，保障自己獨立的物質生活）。

(3) 相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本仁愛互助的感情謀求共同生存的生活。在法律範圍之內平等競爭，反對彼此敵視，你死我活的態度。

(4) 相信「已立立人」的生活態度，故願盡個人能力之所及，儘量助人獨立。

(5) 其他立身處世之態度以前述「科學的人文主義」為準則。

十七、我們寄跡異邦，心懷祖國，阿Q精神，有時夢想有一天以美國為據點，鳩合同志，從事改造中國運動。這種夢想，恐怕到底是痴人妄想而已。因為海外華人雖然人數不少，都是一盤散沙，從未凝結，成爲一股力量。一般人祇營衣食子孫，知識份子何嘗不是以「自了漢」自豪，管他鳥事。真正捨身救國，百折不撓如孫中山先生之領袖人物尚待發現。可能大陸台灣有，正待時機脫穎而出，亦未可知。不可太過悲觀失望，不是嗎？

中國老話：「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海內外華人十萬萬，其中必有不少英雄豪傑之士。吾人對於鼓舞無名英雄之工作不可放鬆。吾人要不求及身成功，要貽謀後死者，中國才有希望。

十八、人類社會永遠在不斷前進中。即是新陳代謝，世代相傳，川流不息。每一時代皆有一時代之中堅勢力，領導社會向前邁進。故上了年紀的人，或在社會上稍有地位的人，千萬不可狂妄自滿，盲目藐視年輕一代之動向，加以厭惡或阻撓。相反地，應當虛心瞭解其時代的使命，體察其背景與環境，給予積極性的督促協助，同情鼓勵，使其循正當之途徑奮勇前進，裨益社會與人群。

一九八三、一、十五、

於紐約



稿 約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持各種不同政見的作者支持本刊爲本刊寫稿。內容最好是以同當代中國及中國人有關的各類題材爲主，可以寫國內、台灣、香港或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與中國留學生等各類問題。

來稿形式不拘，可以是：

- ① 學術或政治、時事論文；
 - ② 各種內容的報導性文章（附照片者尤爲歡迎）；
 - ③ 內容嚴肅文體輕鬆的雜文、怪論；
 - ④ 各種體裁的文藝創作；
 - ⑤ 評介國內外當代作家作品的文藝批評。
- 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清楚直接寄本刊編輯部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聲明。
本刊一般不負責退稿，欲退稿者請附回郵信封及郵票。
來稿一經錄用即向作者致送稿酬。

徵 文 啓 事

爲促進中國的民主建設，本刊理論版計劃在今後開闢園地，專門對中國的民主建設問題展開廣泛、深入的討論，園地絕對公開，歡迎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作者和讀者投稿。來稿以不超過一萬字爲宜，內容則希望以圍繞下列三類文題爲主：

① 關於各種學派民主、自由理論的介紹或批判，及作者自己在這方面的創新理論。

② 政治上的民主建設與當代中國及中華民族的前途的關係。

③ 今後的中國應該怎樣從事民主建設。

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清楚，譯稿請附原文，經本刊採用的徵文稿，除依特約稿標準發給作者稿酬外，還計劃每隔一定時期（如一年）進行一次評審，將優異作品集合起來出版單行本。優異作品的作者，將獲得本刊致送獎金或紀念品。

來稿請寄：中國之春月刊收

P.O. Box 243, New York, NY 10185 U.S.A.

爭鳴園地

編者按

從第十一期起，本刊設立爭鳴園地，為大家籌畫中國之藍圖提供討論場所。此期我們在中國經濟問題，香港問題上刊登了不同觀點的文章，請大家看後參與討論，若有新觀點盡請指出，本刊來者不拒，以實相登，目的是使諸子百家異說齊鳴，豐滿祖國的理论論壇，摒棄一黨論調之專制主義。

論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林超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走什麼路子，這是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趙紫陽同志在「當前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的報告中，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路子以及與之相應的十條方針，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十條要點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具體化。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新路子指明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是我們今後各項經濟工作的綱領，對於我國國民經濟沿着正確道路穩步前進和健康發展，將發揮着重要的保證作用。

一、新路子的內容及其特點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要走的新路子，究竟是一條什麼路子呢？趙紫陽同志在上述報告中指出，為了求得我國經濟穩步前進、健康發展，就要「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及其相應的十條方針是我國建國以來在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它既包括建國三十多年來的成功經驗，特別是近三年來取得勝利的實踐經驗，也吸取了以往經濟工作中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產生的失誤教訓。

我國建國初的頭七年，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發展較快，效果較好，人民生活也有顯著的改

善。一九五六年，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係」這篇光輝著作中，有五條是講經濟建設的，還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指明我國不能照搬蘇聯那一套模式。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頭十年，我國雖然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我們黨積累了許多重要經驗。毛澤東同志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重要工作中，進一步探索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第廿九條，列舉了一系列的思想原則，是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精華，我國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許多貢獻。「決議」對這些經驗做了概括，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級，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同志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同志提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雲同志提出了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

人民生活 and 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同志提出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黨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所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結晶，是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道路上的重大收穫。現在，我們黨經過對過去失誤教訓的深刻總結，逐步清除了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提出了這條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及與其相應的十條方針政策，使我國經濟經過了最困難時期，走上了穩步發展的健康道路。

過去，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經濟建設老路子與現在的新路子有着根本的區別：

第一、在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上，老路子急于求成，急于超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單純追求「高速度」，「高指標」。新路子始終抓住當前社會生產力落後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主要矛盾，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並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既要保持經過努力可能達到的發展速度，又要千

方百計地提高經濟效益，着重從提高經濟效益來取得實實在在的速度，取得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實惠的速度。盼望高速度地發展我國國民經濟是對的，而且我們也應該爭取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單憑主觀願望，還要看社會生產發展的客觀條件，單憑主觀願望就要違背經濟規律，造成嚴重惡果。這已有歷史教訓。

第二、在生產關係變革上，老路子脫離生產力水平，急于向更高的公有制過渡，追求「一大二公」。而新路子注意生產力水平與發展要求相適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與完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如果在生產關係變革方面，脫離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公有規模和公有化程度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就會破壞生產力的發展，這個歷史的教訓也很深刻。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經濟體制上的一些改革，如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恢復自留地和集市貿易，恢復與發展城鎮個體經濟等等，歸根到底，都是調整生產關係，使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第三、在生產目的上，老路子使生產建設同人民生活嚴重脫節，用抑制人民消費的辦法來不當地擴大積累，「為生產而生產」，造成「高積累、高指標」、「低收益、低消費」。新路子從一切為了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係，做到既保持適當的積累率，不斷提高國家建設能力，又能夠逐步提高與改善人民生活，按社會需要生產，講究經濟效益，真正給人民以實惠。

第四、在擴大再生產的途徑上，老路子主要依靠高積累、建新廠，而新路子採用外延和內含擴大再生產相結合的辦法，既要新建企業，又重視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工業企業的作用。建國初期，由於經濟十分落後，原有企業數量少，規模小，產業結構不合理，生產力配置不平衡，因而主要採取外延形式進行擴大再生產，這是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已有大批工業企業，生產技術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今後注重內含擴大再生產是正確的。

第五、在經濟結構與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上，老路子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使經濟結構畸形發展。

新路子則要求搞好兩大部類之間、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綜合平衡，實現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的合理化，保證國民經濟達到有計劃按比例地協調發展。

第六、在經濟管理體制上，老路子主要依靠國家行政手段，割斷經濟組織的內在聯系，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新路子則要求把經濟手段同行政手段結合起來管理經濟，實行生產責任制，擴大企業自主權，促進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按經濟規律組織生產，建立合理的、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經濟體制。

第七、在處理國內與國外經濟關係的問題上，老路子片面理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實行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盲目排外的鎖國政策。新路子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引進技術與外資，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第八、老路子重政治輕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的作用，而新路子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講究生財、聚財、用財之道。

綜上所述，可見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新路子及其相應的十條方針，是我們黨對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正反兩面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保證我們今後避免重犯歷史錯誤的康莊大道。

二、新路子反映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和十條方針的提出，符合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因而它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首先，它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起主導作用的經濟規律，它要求「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這條新路子和十條方針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它不僅提出了「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方針，而且它的每一條內容都是立足于逐步解決社會生產力落後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個主要矛盾的。要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需要從以下四個關係來解決這個問題：（一）

必須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并「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處理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關係時，首先保證人民生活的需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這是指導我國經濟建設必須堅持的原則。

（二）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建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因此，必須使「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能高于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如果不是這樣，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產的發展都會受到影響。同時，必須使居民購買力增加的幅度同社會消費品供應增長的幅度相適應。只有這樣，才能使居民真正得到實惠。（三）要使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和比重，這樣才能在保證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不然，生產發展就會慢，人民生活就不可能較快地改善。（四）必須堅定不移地控制人口的增長。如果人口增長超過生產的增長，人民的生活就難于改善。

其次，新路子符合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經濟建設要求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高，人民得到更多實惠，就必須根據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做到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相互之間，兩大部類之間及其具體表現的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在量上比例恰當，在質上結構合理。遵循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正確處理好各種比例關係，從財政、信貸、物資等方面，搞好綜合平衡，正是新路子和十條方針體現的精神。

再次，新路子符合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仍有一定的調節作用。因此，在商品生產中，不僅要抓好使用價值，而且要重視價值，增加盈利。在社會主義條件的循環周轉運動中，要保持資金循環的連續性，加快周轉速度，不斷提高企業資金利潤率。經濟建設新路子體現了價值規律的要求，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正確處理計劃調節和市場的主輔關係、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關係、商品運動和資金運動的關係，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穩步發展。

此外，新路子也符合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和按勞分配規律的要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這個規律的基本點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要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它的性質。新路子和十條方針正是根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要求，提出了生產關係的變革和完備必須同生產力的當前狀況和發展要求相適應地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而決不能隨心所欲地任意變動。同時，在分配上逐步克服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弊病，實行並不斷完善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

由此可見，這條新路子及其相應的十條方針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要求，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具體運用。這條新路子之所以正確，還在於它符合我國的國情。它首先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這個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的特點所決定的。一方面，我國已經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廢除了剝削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鞏固，這就有可能使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建立在一個比較實在的基礎上。但另一方面，我國經濟調整的任務還十分繁重，經濟體制的改革也剛剛開始，因此，近期發展速度不可能很快，應當求得一個比較實在的速度，並在經濟效益上下功夫，從而保證國民經濟穩步而健康地前進。

三、新路子的核心是提高經濟效益

經濟建設新路子的核心，是千方百計地提高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就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實效。馬克思說過：「真正的財富在於用盡量少的價值創造出盡量多的使用價值，換句話說，就是在盡量少的勞動時間裏創造出盡量多的物質財富。」(1)可見，耗費的勞動時間與創造的社會財富兩者之間比較，就是經濟效益。

經濟建設新路子三項主要內容的中心環節是提高經濟效益。效益與速度來講，效益是首位，是核心，經濟效益既是經濟發展速度的體現，又是決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基礎，經濟效益不僅是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多少的反映，而且是保證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經濟前提，如果我們不講究經濟效益而片面追求速度，這種速度就不可能是扎實可靠的，人民生活也不可能相應地獲得改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有深刻教訓的。長期以來，我們片面強調了速度，忽視了效益，結果建國三十年多年來，經濟發展速度雖然不慢，但是國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低於農業總產值的增长幅度，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又大大低於國民收入增长幅度，經

濟建設的效益較差，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勞動很不相適應。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〇年幾項主要綜合指標的增长幅度是：國營企業固定資產總值增长二十倍，占用的流動資金增长十八倍，社會總產品增长七點二倍，國民收入增长四點二倍，居民平均實際消費水平增长一倍。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社會總產品的增長速度大大低於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的增長速度，國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低於社會總產品的增長速度，而人民實際消費水平的增長速度。一方面是高積累、高速度，另一方面是低效益、低消費。新路子要求速度比較實在，正是為了把效益提到首位，真正做到在保證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實現盡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

效益和實惠，這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較好的經濟效果包含了要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但是，我們不能只講人民生活得到更多的實惠，而不顧經濟建設的增长需要，那樣也不會取得持久的較好的經濟效益。只有從生產、建設、流通各個領域提高經濟效益，才可能使人民生活消費水平得到不斷的提高。

我國以往經濟工作中的弊病集中表現為經濟效益差，浪費嚴重。具體表現在如下十個方面：

- 一、積累效果低。每百元積累提供的國民收入「五五」時期平均為二十二元，比「一五」時期平均三十五元降低三十七%，如扣除非生產積累，每百元生產性積累提供的國民收入，「五五」時期平均為三十四元，比「一五」時期平均六十元降低四十三%；全民所有制單位每百元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基建投資、挖革投資和國防費支出投資）新增加的利潤稅收，「五五」時期平均為七元，比「一五」時期平均二十元降低六十五%，許多行業每百元投資的新增加生產能力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水泥、煉鋼、鐵路鋪軌分別減少五十一、六十、煉鐵、煤炭開採減少七十%，就是說，過去一元錢辦到的事，現在要二、三元才能辦到（包括物價上漲的因素），不少單位只善于爭錢，而不善于用錢，花了錢收不到預期的效果。
- 二、建設周期長。全國大中型項目的建設周期，「一五」時期平均為六年，「五五」時期延長到十二年。據有關部門對四六三個民用項目統計，建設工期在八年以上的有二三二個，占五十%；五

八年的有一五三個，占三三%；五年以下的只有七十八個，占十七%。與歷史水平相比，目前同一行業建設條件大體相同的項目，建設年限都普遍延長，不少項目的工期比過去拉長一倍左右。

三、物資消耗提高。每百元社會總產品的物資消耗，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平均為五六·三元，比「一五」時期平均四四·三元多耗二七%。影響物資消耗比重上升的原因很多，其中浪費嚴重是一個重要因素。一九八〇年全國重點工業企業七一項消耗指標中還有三七項未達到歷史最好水平。每百元農業總產值的物資消耗，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平均為五〇·五元，比「一五」時期的二六·二元多耗五五%。

四、能源利用效果低。每噸能源生產的國民收入，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平均為五五·一元，比「一五」時期的一、一六七元降低五三%，單位產值消耗的能源高于工業發達的國家，甚至還高于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

五、固定資產的利用效果降低。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提供的工業總產值，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平均為一〇二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二八元降低二六%。

六、資金利稅率降低。全民所有制企業每百元資金提供的利潤、稅金，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平均為一五元，比「一五」時期的二九·四元降低四九%。

七、產品成本提高。全民所有制企業每百元銷售收入的成本，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平均為七二·三元，比「一五」時期平均六八·六元，提高五·四%。

八、產品質量差。一九八〇年全國重點工業企業五項產品質量指標中，還有廿二項未達到歷史最好水平，在已恢復到最好水平的產品中，也還有不少產品質量遠遠低於國外同類產品水平。

九、流動資金周轉緩慢。一九八〇年末全民所有制企業占用流動資金達三、二〇三億元，周轉一次需要四個多月，比「一五」時期的三個月延長一個多月。

十、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慢。每一社會勞動者創造的國民收入，一九八〇年只有八八〇元。按可比價格計算，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平均每年

只增長四·七%，慢于「一五」時期平均每年增長六·三%的速度。每一工業勞動者創造的淨產值，近兩年平均每年只增長三%，大大低于「一五」時期每年增長一六·九%的速度。(1)

近幾年來，國民經濟在調整中持續發展，取得了很大成績，經濟效益也有所提高。但是，由于過去左傾錯誤所導致的企業盲目發展，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管制體制有缺陷，經營管理較混亂和生產技術落後以及其他某些因素，使得我們長期形成的經濟效益差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改善，生產、建設、流通領域中的浪費現象還十分驚人，不少重要的經濟效益指標仍然低于歷史最好紀錄。由此可見，新路子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是非常必要的。

當前提高經濟效益的途徑，一是進行調整，二是進行改革。以調整為中心，在穩定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實行經濟結構合理化、管理體制合理化、企業組織合理化。而要實現這三個合理化，要着重抓好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根據國內外市場需要大力發展消費品生產，進行工業企業改組和企業聯合。第二、重工業部門要為人民生活、為國民經濟技術改造和國防建設服務，并按此調整和改組自己的生產。第三、充分依靠現有企業，在改組、聯合的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技術改造，嚴格控制基本建設，講求效益。第四、認真整頓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質量，降低消耗，注意經濟效果，關停一批消耗高、效益低的企業。第五、大力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努力增產和節約能源。第六、改善流通環節，加快流動資金周轉，減少流通費用。第七、狠抓投資效果，縮短建設周期，降低造價，進一步做好科技成果的應用。第八、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嚴格遵守與執行財經紀律。

今後，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狠抓經濟效益這個中心環節，在生產、建設、流通等各個領域千方百計地提高經濟效益。可以預見，按新路子走，我們的經濟建設將會取得更大的成效。

全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六個五年計劃，內容全面，重點突出，任務明確，措施有力，步驟穩妥，它體現了這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六五」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有充分的客觀基礎和科學根據。首先，計劃提出的速度是扎實的，指標是實在的，計劃通篇沒有高

指標，沒有不切實際的口號，計劃要求工業總產值增長二一·七%，平均每年增加四%，其中農業總產值和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的速度都訂為四%，在執行中爭取達到五%，即「保四爭五」。就農業的遞增速度來說，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〇年的二十八年中，平均每年遞增三·四%。由三·四%增加到四%，這個指標不低，但經過很大努力是可以實現的。就工業的遞增速度來說，四%低于過去二十八年的平均速度，這是考慮到近期內能源不可能有較大的增加，交通運輸的緊張狀況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變，同時工業的調整任務還很繁重，不把指標訂得很高，有利于調整比例關係，為第七個五年計劃作更好充分的準備。因此，無論從那一個方面來講，「六五」計劃都是考慮得比較周到，速度比較實在，只要經過努力，一定是可以完成的。其次，「六五」計劃還體現另一個特點是強調提高經濟效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前提。此外，在「六五」計劃中，我國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的經費將有所增加，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將繼續有所提高，居住條件將繼續有所改善。由此可見，「六五」計劃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第二八一頁。

(2)以上數字材料引自「經濟問題研究資料」第一九二期。



現階段農村如何實行計劃經濟

——官希洪——

編者按：

在此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之分別。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胡耀邦曾在十二大大會也提到關於指令性與指導性經濟計劃問題，看來不謀而合，大家都把目前中國經濟問題的注意力放在「計劃」上。到底計劃的定義是什麼？「計劃」（指令性）與「計劃」（指導性）的分別是什麼？有的人同意計劃經濟，有的人不同意計劃經濟；有的人側重指令性計劃經濟，有的人側重指導性計劃經濟，到底哪種形式最適合中國國情呢？爲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特設立了中國經濟問題爭論專欄，爲大家提供討論場所，使大家各抒己見，百花爭豔。

本刊向大家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中國共產黨最近在國內推行的經濟政策中擴大了指導性計劃經濟，限制了指令性計劃經濟，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個趨向意味着什麼請大家來探討。

我國農村正進入經濟改革的新時期。現在的問題是：在原是以生產隊爲基本核算單位的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組織裏，建立了以包幹爲主要形式的聯產責任制後，應如何正確理解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關係的原則，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本文擬就逐步實現農業計劃體制的改革，加強對農業計劃的領導問題作一些探討。

一、農業計劃指標要與農業生產水平相適應。受社會化、公有化水平的制約，農業計劃指標不必

要、也不可能無所不包，更不是越多越好。以往就曾把中藥材（選分耕地、非耕地）、蓖麻、草蓆等都納入計劃，這實際是計劃不了的。要按照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的原則，實行指令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相結合的制度。作爲農業計劃工作的一個重要工具，經濟指標是反映經濟活動的狀況和經濟效果的數量尺度。不同的計劃經濟指標反映不同的經濟問題，作用也是不同的。例如，有些作物的播種面積和牲畜年終存欄頭數等指標，作爲建議參考的計劃指導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作爲指令性指標就將脫離實際，是不適宜的。應該改變那種「只要面積，不顧產量；只要單產，不計效益；只要數量，不要質量；只要頭數，不管肉量」等等形式主義的做法。要抓主要矛盾，通過指標的科學運用，促進生產，取得實效。

由於農村廣泛存在集體所有制，我國農業計劃具有以間接計劃爲主的特點。但又由於我國農業生產水平較低，農產品的商品量不足，爲了保證城鎮人口的生活和生產建設以及出口的需要，「對於集體所有制經濟也應當根據需要下達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標，如對糧食和其他重要農副產品的征購派購」。(1)指令性計劃指標的特點是主要採取行政手段來實現，各級計劃執行單位必須完成；在形式及程序上，反映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關係；指標內容和數量則是根據各類農產品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程度和需要來確定，征購、派購的品種範圍也將隨着生產的發展發生相應的變化。

「由於我國還存在着多種經濟形式，由於對社會的各種複雜需求……難以作出精確計算等原因」，還由於農業自然再生產過程要求農業計劃要堅持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因此，除了指令性計劃以外，還「要實行主要運用經濟槓桿以保證其實現的指導性計劃」。(2)。一部分重要農產品及主要畜產品、水產品等各種的生產計劃就都屬於指導性計劃。生產計劃來自對需求的科學預測和綜合平衡性計劃的結果，是整個農業計劃及其工作的基礎，是征購、派購等指令性計劃的依據。生產計劃也是要逐級下達的，它實際是指導農業生產的一個信息。爲了充分發揮不同地區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條件的有利優勢，只能要求他們參照統一的計劃要求，調整安排各自的生產計劃。指導性計劃的特點主要是通過運用經濟槓桿來保證實現，但也不完全排除行政干預。如果調整安排不符合統一計劃的原則，上級就要通過行政干預來調節。

由上可見，對於集體農業經濟，在生產方面，主要實行指導性計劃，在流通方面，實行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相結合，這是符合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農業以計劃經濟爲主的原則。但「無論是實行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都要力求符合客觀實際，經常研究市場供需狀況的變化，自覺利用價值規律」。(3)。除了這兩類計劃指標之外，「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4)那些三類農副產品和完成征購、派購任務後允許在集市貿

易上進行自由買賣的產品都屬市場調節。但這種產品，品種繁多，需求不一，占總產值比重較小，因此，它在國民經濟整體中只能是計劃經濟的補充，起必要的、有益的輔助作用。

二、搞好綜合平衡是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一項經常性的基本任務。沒有綜合平衡，實際上就是沒有計劃。綜合平衡首先要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結合起來。一個統一的長期規劃反映着客觀規律的要求，從原則方向上規定了農畜主要產品（例如糧、棉、油、畜等）的發展規模、速度和比例構成，使農業生產得以持續協調發展。因此，要在長期規劃的基礎上編制年度計劃。

農業計劃要以計劃期的物質技術條件為依據。要使農業生產部門與農用工業部門在需要與可能之間，要使農業生產指標與技術措施之間，即在投入與產出之間相銜接。把農業計劃指標的實現建立在物質的、科學的基礎上。現實農業計劃工作的脫節狀況受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局限，其中有物質資料（化肥、農機等、農科技等）和資金不足與指標任務之間缺口較大等實際困難。但更多的是管理體制不統一的弊病。

綜合平衡中任務與政策的脫節是一個深刻的教訓，計委和生產部門應該積極參與政策的制訂，使政策成為實現計劃任務的有力保證。農業是一個綜合生產部門，如果只強調本部門、本地區的生產業勢和需要，就會出現強行推廣三季稻、小麥冬種、圍湖懇荒、圍河造田、甘蔗上山以及林木的濫砍伐等等情況，造成盲目性，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有計劃的生產業和流通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但實際計劃工作中卻又人為地將再生產過程分割。生產指標，基本建設，農副產品採購，支農物資，化肥、農藥的分配等等都各有主管部門。僅農業資金一項，有的地方是計委、財局、農行、人行、建行、商業局和外貿局七家分管，化肥據說曾有達到三十六家分管的，又如農副產品的採購就由糧食、商業、供銷、外貿等部門分管，唯獨農業生產部門不管，近幾年迅速發展的農村（社隊）工業，不少產品沒能納入計劃軌道，基本上與農業經濟管理脫鉤。人、物、財、產、供、銷脫節的狀況不利於綜合平衡，也無法發揮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因此，計劃管理體制的改革迫不容緩，要歸農口統一管理，由計委平衡，

目前因流通不暢，農產品供銷脫節的矛盾尤為突出，更要求把產銷平衡協調的工作搞好。

為了建立合理生態平衡的農業生產結構，使農業生產得以持續不斷地增長，除了要按農、輕、重的次序把農業作為經濟建設的戰略重點之外，還要搞好農業內部的生產比例關係，在農、林、牧、副、漁、各業中要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逐步克服單一農業、片面糧食種植的惡果，改變我國森林面積太少、覆蓋率低，畜牧業、漁業都很落後的狀況。在農業種植業內部，主要是使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比例結構從失調趨向協調。近幾年來，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取得了公認的成效。我國的糧食生產有着特殊的意義，必須貫徹「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開展多種經營」的方針。各種作物的播種不僅要因地制宜，還要考慮糧食優先種植的原則。在糧食播種面積不能再減的情況下，都應該穩定現狀，並採取相應的技術措施計劃，以保證單產水平的不斷提高。

還必須提出，目前糧播減少和某些經濟作物盲目擴大的原因，除了農產品內部比例不合理之外，主要還在於實現了財政大包幹之後，出現了統一領導和分散管理的矛盾。關鍵在於種植經濟作物對農民和地方財政收入都有利。因此，應該堅持「全國一盤棋」的統一領導，運用經濟槓桿協調管理體制中的矛盾，改進財政大包幹制度。

三、正確運用經濟槓桿是貫徹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必要條件。社會主義經濟既然存在商品生產與交換，因此，「國家在制訂計劃時，也要充分考慮和運用價值規律。」（1）在計劃經濟主體中，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是對價值規律的自覺利用，而市場調節則是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不論價值規律的自覺利用或自發作用，它都是要通過與價值範疇有關的一系列經濟槓桿，如價格、稅收、財政信貸等等來實現的。就中學的農產品價格政策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係到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利益能否兼顧；關係到農業計劃能否實現；關係到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能否貫徹，國民經濟能否協調發展的問題。

農產品價格中的超購加價以及各種獎售政策，對恢復和促進農產品的商品生產都會發揮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隨着生產的迅速恢復的發展，原

定的征購派購基數和獎售措施已不適應。例如：有些品種收購基數已經偏低，以致超購加價比重增大，獎售面太寬，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原來商品率較高的老產區，因基數高負擔任務重，超購加價和獎售收入相對較少，也加劇了與新產區、原低產區之間的矛盾；加價和獎售中土政策太多，收購農副產品獎售糧食的項目由國務院規定和批准的六十八種擴大到一九八二年的二百多種，圍糧圍糧的政策已複雜到「內行說不清，外行聽不懂」的地步等等。為了保證國民經濟的需求，應變死基數為活基數，實行以該生產經營者前三年出售的平均數確定基數，增加偏低地區和新基地的基數，逐步調減老基地不合理的偏高基數；或在總的計劃收購量中實行大頭牌價、小頭超購加價的辦法；根據需要和市場供求預測確定基數，對超基數部分或加價、或平價、或任由生產者自行處理，對未能完成基數的，亦應分清原因處理；獎售項目不宜太多，獎售標準更不宜太高，要減少糧食獎售項目。

為了貫徹以計劃經濟為主、實行統一計劃中的農業發展速度、規模和主要比例，國家還可以運用農業投資來進行調節，以加強重點農業部門或重點農業生產項目，以及商品基地的發展，大力扶持重點戶、專業戶的生產。可以在農業貸款的發放和利息、稅率等方面，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藉以促進各地區及生產經營者改善經營管理。在農業擴大再生產和收入的再分配上，充分發揮信貸和稅收的調節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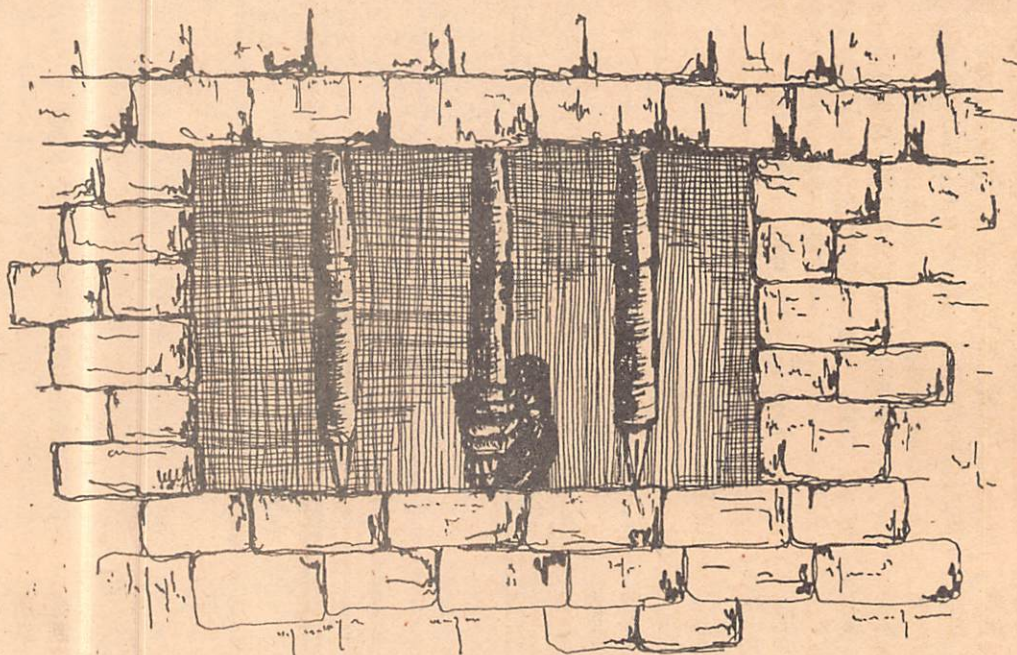
四、廣泛推廣農業經濟合同。農業計劃由中央逐級下達到縣以後，又如何跟對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或生產經營者實行間接的計劃指導相聯繫起來呢？實踐證明：簽訂農業經濟合同是一個好形式。經濟合同是合同雙方為實現一定經濟目的、明確相互權利義務關係的協議書。農業經濟合同的形式很多。在縣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根據統一計劃的需要，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編訂農業計劃（或綜合合同），以明確各業務部門和基層生產單位的職責與獎懲。在業務部門和基層生產單位與生產經營者之間則訂立各項承包合同。主要有農業生產承包合同；專業承包（或聯營）合同；農業技術合同；農業產購、供銷（農商）合同等等。它們分別是農業生產計劃、各業生產經營發展計劃、農業技術措施計劃

、農畜產品商品量（採購）等各類計劃的具體化和基礎。以農業生產承包合同來說，它是當前鞏固和完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要保證。通過簽訂承包合同，把計劃落實到千家萬戶，依靠他們創造性的勞動，從而奠定計劃工作的群眾基礎。

除此之外，還要按長期規劃改善農業生產和生活條件的要求，把農業基本建設和社會公共勞務以及計劃生育等任務、項目納入合同。從現在農業的經營管理水平來看，農業經濟合同的內容不宜過繁。重點是要跟農副產品收購任務相協調，其它合同項目只是建設或作為執行合同時的參考。

經濟合同對提高農業計劃管理水平有重要作用：它通過合同把整體、局部以及分戶之間的生產經濟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把雙方的經濟關係和經濟責任有約束力的合同契約固定下來；通過合同的形式把農業與其它部門，把分散的地區和生產者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因此，廣泛推廣經濟合同是當前農業計劃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是貫徹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必要手段；是把農業計劃工作的特點統一起來捷徑。在推行農業經濟合同中，應注意：一是經濟合同要堅持充分協商和自願互利的原則。沒有反復協商，沒有經濟利益，就沒有自願，從而也缺乏群眾基礎。二是要規定雙方的權、責、利，缺一不可。即不僅要規定農民向國家交售任務的數、質量，也要規定國家向農民提供相應的物質技術條件。否則，合同就缺乏經濟基礎。三是要統一領導和管理，這是保證執行合同的組織前提，要改變各行、各業、各部門一湧而上地簽訂合同。合同本一多，記不住，也弄不清楚，易流于形式。四是要加強經濟立法，完善有關規章制度，使合同有權威性。要創造條件使名與實相符，即逐步實現從暫時的「任務書」過渡到真正的「合同協議書」。最後，合同牽涉到農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體制改革等一系列問題，不僅要適應幹部的經濟管理水平，還要便于群眾理解和接受。因此，在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尤其需要加強調查研究，使經濟合同由粗到細，逐步完善。

- (1) 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 (2)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報告。
- (3)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報告。
- (4)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報告。



中國農村社會的 今日與明天

桑梓



一、經濟形態

1 所有制

中國國內的農村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來，多少有一點像文化革命。運動一旦起了步，不論其向前發展的速度和方向，都不是運動的發起者所能完全預料和控制的。很多時候，形勢事實上是在推動着領導者向前進。

就以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為例，在被稱為歷史轉折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還決議規定「不許包產到戶」，等到四中全會時便改為「不要包產到戶」了。「不許」是絕對的，「不要」則帶有一定的機動性。再過不久，中央發出七十五號通知（一九八〇年九月），「有條件地允許包產到戶」。及至一九八二年，中央批轉了「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把專業承包、聯產到勞和包產甚至包干到戶，「都認為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方式」。

還有，當運動開始不久，爲着不使改革造成新的階級分化，以至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當局曾經一再強調不準個體戶雇工。後來，在形勢發展的逼迫下，這一原則在不斷的修正、放鬆，以至將不准雇工改爲雇工數量不得超過某種實際上在不斷放寬的限度。時至今日，在中國農村的很多地方，雇工實際上已經不受數量上的限制。

這一急劇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使農村社會發生了極大變化，現在先談所有制方面的變化。

由於要推行包產和包干到戶的雙包責任制，已經毀掉地界打成一大片的土地，不得不拿來重新分割，以便分田到戶包干生產。同時，要想安定人心，使雙包責任制收到更大效果，分田後定期不變的年限便不能太短，不少地方正在提倡甚至推行「一定十年、二十年不變」的政策。這種分田到戶長期不變的做法，無論當局怎樣解釋，說它純屬生產管

理方法的改革，不至於引起經濟結構上的劇變，事實上，已經和正在造成農村經濟體制的質變。

首先是土地所有權問題。儘管政府一再強調，分給各戶的田地，所有權屬於公社集體，農民只有耕作使用權，而無買賣、租讓權。但是，分田措施加上其他各種經濟改革辦法，與及這些辦法、措施所造成的種種後果，已經在民間廣泛形成了一種私有制復辟的意念。有許多人公然在分給他們的包耕土地上建造房屋或者將自己不耕的土地租、讓給別人耕作。還有一些人甚至出賣包耕土地。政府將以什麼辦法去有效地禁絕這一類非法活動呢？歷史上曾經有過王莽一類的政治家，以最大的努力試圖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包括將土地國有化，嚴禁買賣。但是，到頭來，土地還是變成了私有財產任自買賣？

究竟今後的中國能否一方面成功地保持土地國有化，一方面順利地將目前的農村體制改革繼續推行下去，以達到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的目的呢？

人民公社的存在，使中國得以在過去二十多年內長期保持土地國有。而近年來的經濟改革，卻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的根基。到今天，不管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如何，要名符其實地保住人民公社的本來架構和原定功能，實際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事。儘管現在還沒有正式宣佈解散人民公社，但是，黨、政分家再加上包干到戶（形勢發展無疑會迫使越來越多的社隊放棄別的責任制改採包干到戶），已經使人民公社失去了除掉空招牌之外的幾乎所有一切。

在包干到戶的「責任制」之下，農民大多自己置備生產工具以戶爲單位從事生產。各戶對於生產隊的義務只是交付一定數量的農產品或者現金（通常是先在總產量中扣除本戶的口糧和「合理的獎勵產額」，再把剩餘部份交給社隊），這與向政府交稅的情形差不多。而社隊對於屬下農戶的責任則爲協助與指導大家從事生產（不是組織與領導日常生產）。這裡的所謂協助與指導，當然要以有利於或者至少不違背各戶農民的自身利益爲前提，否則大家不會接受。公社的這種職能，與一般政府的有關

單位差不多。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其實只是區、鄉政府中一個專管農業生產和稅收的部門——如果它確實還有一點經濟實體意味的話，那不過是因為它本身大多還在經營一些所謂社隊企業而已。

隨着個體經濟的日益發展與鞏固（這乃必然趨勢，絕非任何行政力量所能阻止。除非到了大多數人的思想覺悟都提高到馬克思據以設想共產主義社會的那種程度，而私有經濟的爲害又使未曾親見公社之禍的後代感到無法容忍的時候，政府想要全部收回已經分配到各戶的田地以發展集體和全民所有制經濟，那簡直是不可設想的事），公社的原有職能必將大大萎縮，到最後，人民公社將完全失去存在意義。

公社體制的進一步瓦解，會使中共深深感覺到，繼續將各戶自耕的生產方式當作純粹的生產管理方法而不是體制變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會遭遇到極大困難。

例如：既然公社體制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分田到戶只是生產管理措施的靈活運用，分田後，各戶不過是在分戶耕作的情況下對生產隊承擔一定量的耕作責任，那麼，各個社、隊就應該仍然是計劃和組織生產的經濟實體，繼續製訂本單位的全盤生產計劃，有時還得強制自己的社員去執行計劃，造成生產管理上的官僚主義和瞎指揮。另外，隨着各戶情況的不斷變化，每逢某一農戶出現了人口變動如生死、嫁娶或轉業、改行之類的事情，社隊都必須及時進行土地調整，這在實踐中會牽涉到許多問題，包括影響到政策的穩定性。

何況，政府在理論上也很難說服大家長期對公社單方面承擔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除非中國的農村生產力發展到比現在高出兩倍以上的程度（在農業機械化、國家工業化的努力收到相當效果之前，中國的農業生產實際上會長期徘徊在目前因經濟改革所達到的近乎高峯狀態的水平），絕大多數的公社根本不可能從承包給農民的土壤中獲得更多的錢糧以作發展社隊福利之用，這意味着公社本身不可能倚靠農業生產去爲從事農耕的社員謀求甚至只是起碼的福利。公社不能成爲農民的真正福利機構，又

不能像過去構想的那樣靠「一大二公」去發展農村經濟，那麼，公社的存在對於社隊農民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呢？

沒有實際意義的東西，自然不容易長時間存在下去，一旦公社這一類東西不存在了，政府以什麼理論去解說已經分給各戶的土地屬於集體而不是私人所有呢？縱然政府可以將集體所有的說法改作全民所有，宣佈土地一律屬於國家，請問，以國家名義行事的政府，又憑什麼辦法去確保這種所有制名稱其實地長期存在下去？

連土地所有權都會出現諸如此類的問題，其他的生產資料也就更不用說了。

在改革運動剛剛開始的一段時期內，改革的領導者爲着讓大家（尤其是反對派）相信改革不至於背離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曾經一再宣稱必須保持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但是到現在，不但耕牛、犁耙變成了個人所有，連拖拉機、汽車等等大型生產工具以至部份生產設施如倉庫、加工場等都紛紛以拍賣方式落到個人手上了。不難預見，在今後短短的若干年內，由於個體經濟的迅速膨脹和公社職能的日益消衰，絕大部份農業生產資料，除土地及基建、水利設施之外，都會在全國範圍內漸漸從集體所有轉變爲個體所有。

2. 生產與交換形式

責任制的全面推行，已經整個地改變了中國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業生產方式。

據截至一九八二年十月的統計，全國六百〇一萬個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中，已有百分之九十七點八建立了起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其中搞聯產責任制的佔百分之八十一點三，定額包工的佔百分之十六點五。在聯產責任制中搞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的佔百分之五點九，聯產到組的佔百分之十點八，聯產到勞的佔百分之十五點八，部份包產到戶的佔百分之三點七，包產到戶的佔百分之七點一，包干到戶的佔百分之三十八。①

兩年後的今天，除了極端個別的單位，各社隊

實際上已經全部推行了責任制。而且「我們不能不看到，現在已經逐漸顯露出一種趨勢，就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從貧困落後地區擴展到其他地區以至經濟發達地區。」②

爲什麼許多富裕甚至非常富裕（依中國國內的標準）的社隊都紛紛要求實行包干到戶呢？據「人民日報」上一位叫胡爾任的作者說，他曾訪問過幾個收入很高，社隊集體事業辦得很好的生產隊。這些社隊原來不願意實行包干到戶，縣社領導也不希望他們搞包干。但是後來，經過與左鄰右舍的比較，大家卒之要求實行包干到戶。其理由是：包干到戶就有了自主權，包括對生產的經營管理和產品的分配使用都有了自主權。大家「可以合理支配自己的生產時間和業餘時間。特別是農村婦女最歡迎包干到戶。他們說：過去我們天天被捆在田裡，活忙活閒都泡在一起，事事都被幹部管着，幹得再好也是七分八分，累了一天回家還有一大堆家務事，連走娘家也得看幹部的臉色。包干到戶以後……一家人分工合作，田裡活家裡活都幹得痛痛快快，趕集、走娘家也自由了。」③

這一段描述加上前面有關推行責任制單位的數字統計，已經使我們清楚地了解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絕大多數農民，目前是以怎樣一種方式從事生產勞動。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中國的農民，絕大多數已經回復到數十甚至數百年前的那種生活方式：大家破曉而作，斷黑而息。大清早多半以料理菜園、家務爲主。晚上如無特別的事，多半早早就寢。農閒或者風雨天，家長或者主勞力會以比較輕鬆的心情在家幹點副業零活，也可能乘着墟期在不同的集鎮上東一天西一天地做點小買賣。而年青人和年歲比較大的，便會乘此機會舒舒閒閒地消娛幾天，包括到集市上去湊湊熱鬧，在家裡三五成羣地聊聊天、玩玩棋牌甚至賭博。一到農忙季節，幾乎全家老少空巢而出。有些家長，甚至要在學的孩子暫停上學以便協助耕作或照看嬰兒、料理家務。

下田的時候，大家荷鋤帶筐、肩挑手挖。土地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各戶幹各戶的。當然有時也會



趙紫陽在福建三明市郊回瑤林果場

彼此隔着田壟地界數家常、發發牢騷。

在一些條件比較好、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機械和半機械化的工具已經在使用中。這些工具，有的仍屬生產隊或大隊所有，但是多半已經承包給個人使用，也有的是由比較富裕的「冒尖戶」從社隊或國家商業部門以私人資本或借貸方式購得，農民可以用現金或除賬形式租、雇使用。

至於耕作方法和種植內容，農民其實完全有權自作主張。雖然在早些時候政府一再強調，縱然推行了包干到戶的責任制，農民也得按照社隊和政府的整體計劃去種植生產。然而這在實際上是容易辦到的。只要農民能夠通過市場貿易如數交納承包品種的定額量，就算將包耕地全部拿來種植在當時獲利最大的作物，而不去種植社隊要他們種的東西，通常情況下，領導對他們亦無可奈何。硬性規定農民非種什麼不可，這不但在執行上有困難，也

會影響農民的積極性和有可能造成像過去那樣因計劃失調而造成損失。

事實上，這幾年來的體制改革，已經使中國的農村經濟漸漸從集體化轉為個體自由經濟（不管當局承認與否）。按照現代自由經濟的發展規律和中國農村的現實環境，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後的中國農村，除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繼續以戶為單位保持以農為主兼營家庭工、副業的經濟形態之外，必然會越來越多地出現一些專業農戶以至專業農村。例如，某些鄉村專門種植某類作物或加工某類產品（過去因為政府長期堅持以糧為綱，加上是在政、社合一的集體經濟之下，要搞區域性的專業化是不大可能的）。某些農戶則除了專種某類作物還可能專門經營各種工副業，包括養畜業、產品加工業、一般工商業以及運輸業等等。

不過，從中國農村現有的經濟基礎和政治體制的實際情況看來，這樣的分化發展過程，必然會相當緩慢。整個中國的農村經濟主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必定仍以個體農戶為單位，以糧產作物的耕種為主，兼營畜牧及家庭工副業。全面性而且高程度的農業機械化和經濟現代化計劃，至少在目前情況下看來，還只是一種遙遠的目標而已。

談到交換形式，隨着體制改革的廣泛展開，農村的集市貿易也因生產的發展及自由經濟的形成而得以迅速恢復和繁榮起來。各家各戶都於傳統的墟期（一般以三日為期，如一、四、七；二、五、八或三、六、九），帶着已經或可以節餘下來的農產品或者畜產品到集市上去交換自己缺乏而且需要的東西，例如賣蛋買鹽、賣雞買油、賣糧買豬鬃、賣豬鬃買布等等。也有時候，一些農戶出賣某種產品（以糧食為多），其實並非自己已有餘剩，而是因為一時急着要現金，不得已先將過一段日子才用得上的東西拿去變賣救急。等到自己用得上的時，又再想辦法籌了錢去買一些回來。這就形成了一種現象：在收穫或其後不久的季節賤價售賣糧食的家庭，到荒月往往要以昂貴得多的價格去購買相當數量的糧食，使職業性個體商販及季節性的投機買賣者能夠從中撈取一定的利益。

除了互通有無的交換買賣，市場上事實上亦有很多職業商販，他們逢一、四、七在甲集市買了當地比較充裕而價廉的產品，到二、五、八再拿到在當地比較缺乏而價高的乙集市去出賣以便從中圖利。

政府對於上述兩種買賣，事實上都是不加干預的，雖然對買賣某類產品的人可能課以一定的市場稅，而對職業性的商販則要徵收營業稅。

在開放自由市場的同時，政府本身也在從事自由市場性質的高價買賣。根據政策，各社隊各農戶可以在完成政府的牌價徵購任務之後，任意將剩餘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議價出售。政府為着保障農民的利益使他們不至於受到投機商人的過份侵害，也為着從中獲取相當的利潤，對於各地的主要產品，往往都在牌價之外，另定了一種議價品買賣價（其買價一般比自由市場為低，賣價則較高，差價視實際情形而定）。在這種價格之下，政府可以大量收購或出賣各類產品，一般沒有工夫到自由集市中去買賣的人，或者要買賣當地太多或太缺乏的產品的時候，都可以向政府有關商業部門以既定的「議價」買賣各種產品。

當然，農民如果要買工業品，一般還得與政府的各種商業部門打交道。尤其對於各類機械品和技術性要求較高的工業品，因為這些東西幾乎全部由國營工業部門壟斷了，而各個國營工業間的競爭制度又尚未很好建立起來，農民要得到這一類產品，往往還得受配給的限制（假如那種產品的生產還不充裕或者因供銷部門的過失造成地區性供不應求的話），甚至忍受一點官商作風的氣。

不過，這種現象近年來已經在逐漸打破中。社隊集體企業以至個體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打破了國營工業的壟斷局面，許多社隊企業及個體戶均以迫人的氣勢通過自由集市及其他管道與國營工商業展開競爭。甚至連國營工業品，也因集體與個體商業戶的紛紛出現，而至打破了政府供銷部門的壟斷。這些商業戶為着利潤大展神通，往往通過各種手段，從各地區各單位弄來大量全國性或區域性缺貨的產品投放到市場。凡此種種，

無不使沉死了長時期的農村市場漸漸得到復活。

從整個趨勢看來，農村集市的繁榮不但可以維持下去，而且還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不過這種發展是朝着資本主義路向的，這對於執拗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大概不是一種好現象，然而那是大勢所趨，恐怕誰也奈何不了，因為交換形式基本上是與生產及所有制形式相一致的，只要政府不想或不能改變後兩者，它自然也會不想或者不可能改變前者。

二、家庭關係

中國農村的家庭關係，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造成這種變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經濟結構的改變。自從建立了人民公社，家戶已經不再是農村中的基本生產和核算單位。各家各戶不再制訂自己的生產計劃，人人接受生產隊的統一安排，使各戶原來計劃和領導生產的人（多半是父母家長）失去了管領價值，也從而程度不同地失去了部份甚至全部原有權威。尤其因為公社實行了配給和統分制度，使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直覺地認為，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口糧，是生產隊配給的（其實，除了公社化初期「吃飯不用錢」之外，生產隊配給社員的口糧都只是指標，還得拿錢去買，而買糧的錢多半由各戶的工分款中扣除），許多無勞動力的老幼或不參加生產的學生，都認為他們吃的並非家長或家中主勞力所生產的東西，以至不認為自己是在依賴他們。這種情形，無疑會造成家長權威的消滅。

其二是長時期的政治宣傳。誰都知道，中共領導一向做宣傳無孔不入，在它的政權下，每一個人，從懂性的那一個時刻開始，就已經不斷地被灌輸某種定型的思想意識。不論在家中、在社會、在幼兒園、在小學以至中學、大學，人們都會經常聽到「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之類的政治宣傳，雖然這種宣傳與人性、倫理

極不協調，人們不一定都能接受，但因宣傳是長時期無休止的，對於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很難說不會產生一定影響。

其三是「十年動亂」時期，到處都在鼓吹破舊立新、反禮教、反人性，人們的倫常觀念受到了進一步的衝擊，這對於家庭關係的維繫更加不利。直到最近幾年，由於種種極端嚴重的社會問題，使中共各階層領導者深深意識到，過份宣揚反人性、反倫理會造成惡劣的後果，這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政治宣傳的調子，甚至搞起家庭關係的「文明禮貌」運動來。

這種轉變加上體制改革政策的推行、階級鬥爭基調的改變和公開對於黨在過去的許多方針政策，包括對文化革命和毛澤東本人的否定，都在人們羣衆中產生了一定影響，使大家逐漸意識到自己既往的錯謬，從而在社會上普遍引起了一種求變與復舊思潮。

這時候，也在朝着復舊方向發展的經濟變革，便在實際上促成了農村家庭生活的復舊式改變。比如說，已經實行了分田到戶責任制的地區，家戶又成了基本的生產和核算單位，各家各戶都需要有自己的領導者以便安排生產和統管財務。這時節，主管家庭生產和生活的人頭腦越靈活，家庭成員間的衷誠合作做得越好，那個家庭的生活也就可以得到越大的改善。結果，權威與服從問題又成爲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從現在的情形看來，一般農戶的家長，只要能夠抓住家庭的經濟權柄，欲使戶內成員接受其日常的生產與生活安排，通常是可以辦到的。而且，大多數的家庭，各成員間感情變得融合一些，生活過得和諧一些，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雖然，在一些家庭中，如果管治權落在四十歲以下的中、青年手上，由於這些人是在「十年動亂」中成長的，比較地富於造反性和缺乏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儘管其對於自己下一代的培育多半不至於懈怠，愛意也不會稍減，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父母尊長，感情可能並不十分濃（一部份是社會現實和長時期的生活習慣造成的，一部份則是政府進行政治思想教育

的結果），照顧也可能不十分週到，有的甚至出現虐待現象。

另外，由於政府的改革政策無不含帶着濃重的金錢掛帥意味，也由於對外開放使資本主義的金銀之光連同其「腐朽沒落的」思想意識與生活作風，一下子無孔不入地灌進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以至造成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中國，到處都在泛濫着一股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思潮。

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之下，加上復舊主義的幽靈又在社會上蠢蠢欲動，至使經濟和文化都還十分落後的中國農村，又有不少人在進行婚姻買賣了。婚姻之成爲買賣，除了造成因買方爲籌款不得不作出種種犧牲以至違法走險等社會問題，也必然會使以貨品形式出賣的女方，嫁進男家之後，地位大大降低，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些人的家庭生活，雖然這種情況還不能算是今日農村社會的主要問題。



孝道何存

三、社會結構

1. 血緣綫

根據血緣關係分析中國的農村社會結構，我們很容易發覺，除了數代同堂的大家族制度已經基本不存在之外，其他一切，跟數十、百年前的情形並沒有太大差別。

以家長為核心的各個家庭，仍然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個家庭的成員數，平均而言，大約有五、六個。包括一對夫婦與他們的父母及孩子。一般來說，如果這對夫婦仍在生育年齡，例如四十歲以下，還會再生孩子，其家庭成員除他們之外可能包括一至三個孩子及一個父或母（這是以平均而言，因為每一對年長的父母都會有幾個孩子，除嫁出去的女兒之外，通常還會有兩三個兒子，父母與那一個兒子同住，視感情與實際情形而定，但以平均來計算，一個兒子的家中應該只有父母中的其中一個）。等到他們年紀大些，不能再生孩子的時候，其子女數可能增至三到五個（這是農村中的一般育兒數，雖然近年來政府在雷厲風行的推行限生兩子提倡一子的生育計劃，但是生產責任制使農民比較容易解決多生子女後的口糧問題，在大家並不將教育子女的問題看得很重和把生孩子當作增加勞動力和壯大家族的手段這種情形沒有得到進一步改善之前，政府的生育計劃，很難在農村中得到有效的貫徹），但父母卻多半已經死去了，因為繁重的勞作及艱苦的生活會使農民大多在五十到六十五歲之間死去。

在家庭之上有家族。所謂家族，這裡的意思是同父母、祖父母以至曾祖父母的幾代同胞，雖然已經分了家，在經濟上及日常生活中都彼此完全獨立，但在對外的社會生活中，他們往往會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以至連成一綫，合成一體去保護自身的利益。

這種家族關係，在公社化高潮和文化革命期間

曾經被大大削弱過，但是始終沒有完全消失。這幾年，由於政治與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動，新的形勢已經使家族關係迅速變得密切起來。

家族之上又有宗族。前者由幾代之內的同胞組成，後者則往往只是很多代的遠祖同宗而已。這種關係，至少從公社化以來，已經大體不存在了。只是由於最近幾年的急劇變化，才使宗族活動逐漸地死灰復燃起來。

為什麼宗族活動會死灰復燃呢？分析起來，大致包括以下三種原因：

一是對共產黨及共產主義喪失信心的結果加上國門開放和黨的領導者一方面自己在否定自己的既往，一方面又在大力推介一向認定是反動沒落的東西，至使在社會上引發了一股強大的復舊潮。

二是黨和政府對於廣大農村社會的控制力，相對而言，已經大大減弱，使一部份有權力欲和一部份別有用心的人覺得有機可乘。

三是私有經濟的恢復，使農村因利害關係而發生的磨擦與衝突越來越多，大家爲着保障自己的利

益，都願意成爲某一比較有勢力的幫派成員。這樣的幫派，在農村社會，最可靠的當然是以血緣關係爲紐帶的宗族組織，這就爲宗族活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

從家庭到家族再到宗族，實際上已經將農村社會緊密地結成了一個網。但是，就社會功能而言，今日的家族與宗族，並不像歷史上我們所了解的那樣，是在起着協助政府管治社會的一種基層社會組織。這是因爲今日的領導者至少到目前爲止並不打算利用這樣的基層組織，理由是它們會有害於堅持黨的領導及維護社會安定。既然執政者不想利用這些組織甚至否定了它們存在的合法性，各族派的核心人物與行政部門的領導者也就拉不上職務上的關係和得不到應有支持，從而也就不願意主動地爲政府效勞。結果，各種族派對於社會不但不容易起到積極作用，反而因宗派活動而增加了社會的不安成份。

2. 政治綫

完全通過政治手段去組合和管治民衆以達到制約基層社會的目的，是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的一大特點。黨首先利用劃分階級的手法，將農人分成地主、富農、上中農、下中農和貧雇農，其中的地、富家庭屬於剝削階級，是專政對象；而貧雇農與下中農（雇農爲數不多，一般只稱貧下中農）則爲黨所依賴的特權階級。然後，黨的領導者天天強調階級鬥爭，一方面對地、富家庭成員諸多限制，甚至不時地批鬥他們；一方面又給貧下中農家庭一些政治或經濟上的甜頭，意在使他們相信，只有共產黨能夠令他們翻身做主人，也只有共產黨能夠保障他們不受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之害。

這不能不使相當一部份曾經從地主、富農那裡分得過田地、房產（雖然所有田地及部份房產早經在公社化的名義下交給了黨）的貧下中農，長期在潛意識中存在着一種相對的優越感，並且基本上相信，只有繼續依賴黨和跟着黨走才不會出問題。而黨也就因此得到了一些比較可靠的基層支持者。

但是，這還不夠，黨需要有一些更活躍更有衝動的帶頭羊，這就使「積極份子」與「先進人物」



一棵冬桃年結果實四千三百多斤

之類應運而生。這一類份子或人物，對於黨來說，比普通的貧下中農更有價值，他們實際上可以被看作不受薪的幹部，是協助黨管治基層社會的得力助手。

再進一層便是黨團員與基層黨政幹部了，他們是黨伸進社會體內的小動脈，黨的社會生命是依靠這些人才得到體現與延續的。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簡單地劃出一個中國農村社會的政治結構綫：

黨↓基層黨政幹部↓民間積極份子↓貧下中農↓階級敵人

這種政治結構的功能，曾經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表現得頗為卓越。可惜現在的情形改變了，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已經普遍失去；改革運動又使幹部失卻了嚴緊控制老百姓的經濟與政治生活的有利條件。加上物質刺激政策和拜金主義思潮造成了先進人物不吃香的現象，以至對階級敵人的摘帽和鼓勵個人爲富的政策使黨失去了借以拉緊一部份貧下中農作爲社會核心的有效法門等等，無不使黨對於農村社會的控制力大大減弱，而社會問題也就相應地增多起來。今後的發展情形如何，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這要看政治局勢與經濟變革的發展情形。但是有一點比較容易肯定的就是：中國目前的農村社會狀況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難望發生任何質的變化，它會依着現有的方向繼續朝復舊的道路邁出一小步。

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三日

註：

- ①「中國農民報」·P.3, No.128, 11-2-82。
- ②「紅旗雜誌」·P.16, No.23, 1982。
- ③「人民日報」·P5, 27-12-82。



香港可以

組黨自治？

蘇微言

香港市政局議員蘇偉澤在今年二月九日的香港扶輪社一個午餐會上說：香港人才會萃，大不乏有能爲的政治領袖，大家應該組織起來，在中英談判達成協議之前，盡快成立至少一個政黨，以便建立起自己的領導層。

棘手的香港問題，究竟是不是可以通過組黨自治的途徑得到解決？

任何對香港和中國問題稍有認識的人都會深切了解到，根據香港的地理環境及其固有的經濟結構，沒有中共的支持和合作，任何形式的政治架構都無法保持香港的安定與繁榮。而組黨自治說，則可以肯定不能夠爲中共所接受。因爲這不但與中共一

定要收回香港主、治權的立場有背，也會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嚴重損害到他們的「四根擎天柱」。

撇開中共的實際態度，姑且假設中共的某些領導人有徹底解決香港及中國問題的誠意，能不顧一切後果地支持或者至少容忍香港人組黨自治；同時英國政府又真能高瞻遠矚，竭力竭誠以支持香港人維護自身利益，那麼，香港人將確實在這方面爲自身的權益和中國的前途開創一番勳業。

可以預料，香港的「黨禁一旦解除」，組織起來的就肯定不是一兩個政黨的問題了。這些黨派，至少可以分爲四大類：其一當然是以中共和國民黨爲後撐的政治實力；其二便是不同性質的、受外國勢力扶持的黨派；三爲愛國華僑與各種華人工商團體支持的、真欲爲香港和中國問題的解決盡其所能的進步和愛國組織；剩下第四類即爲零星的、由各種政治上的個人野心家和社會上的黑幫份子構成的劫亂派。

面對上述各種政治勢力的紛擾，香港人眼前的安定與繁榮日子，必然會受到相當程度的侵害。但是，毫無疑問，這是別無他法中，最有希望徹底解決問題的一個好辦法。如果香港人能夠忍受暫時的損失，英國政府又能以其國力協助香港人使其不受中共的過份滋擾，十三年的日子（從現在到一九九七）是不能算短的。在這一段時期內，上述三種政治團體，必然會迅速壯大，它們會在國內外造成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可以利用香港和海外的有利形勢，包括地理環境、政治環境與經濟實力，爲徹底解決香港、國內和台灣問題作出巨大貢獻。

即刻爭取組黨權是香港人的自救之道，而如何維持香港在政黨紛爭中的基本安定則爲英國和現有香港政府的當急之務——如果它們確有爲香港人的利益盡力的誠意的話。

不要做觀望派，不要做走爲上着派，前途和希望是要靠自己爭取的，我們的命運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掌握，不要等待，更不要乞憐！

中共收回主、治權後

香港能否保持繁榮

司徒港人

認為中共收回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之後香港仍然可以保持繁榮的人，包括中共的高層決策者，其樂觀態度，多半基於下述兩大理由：其一是中共領導者確有保持香港繁榮的願望與誠意；其二是中共已經提出了保持繁榮的具體辦法，那就是推行「港人治港」和「港法治港」，把香港搞成一個特區，享有最高度的自治權。

先談第一點。

相信到目前為止，誰也不會懷疑，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在考慮香港問題時，的確是在想着，收回香港後，一定要好好保持和發展香港的繁榮。這裡面，既有願望，也有誠意。但是，現在的問題在於，到底有多少人相信，無論辦什麼事情，只要當事人有願望、有誠意就一定可以辦好？毛澤東，甚至四人幫，誰能說他們沒有把國家搞好的願望和誠意呢？結果如何，大家不是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嗎？

當你聽到中共的領導人一再宣稱，香港的繁榮主要由於有了祖國政府和廣大同胞的全力支持，而這種支持所指的主要是同香港做生意；又當你聽到他們為着安定香港民心一再宣稱收回香港後，島上

居民可以「舞照跳，馬照跑」時，你對於中共領導人理解香港民心及理解是什麼造成香港繁榮諸問題時的獨到見解，難道不至於大失望嗎？

這些「天真」、「單純」的領導人，曾經滿懷信心地在他們正在煞有介事地調查、徵求香港人解決香港問題的「民意」時宣稱，他們已經擬定了一套維持香港繁榮的策略，像這樣的「民主」精神和工作作風，怎能不使香港人覺悟呢？

香港的黃夢花議員說，在解決香港問題上，北京政府已經作了最大讓步，如果香港人仍不知足，敢以繼續向北京喋喋不休、討價還價，到頭來便會連中共目前已經許諾了的「港人治港」機會也將失去，到時北京就會直接管治香港，使香港連特區夢也做不成。黃氏的話已清楚警醒了我們：當領導者已經拿定主意之後，被領導者最好少說為佳，如不乖乖聽命，不知趣激惱了首長，到頭來，就算份內應得的東西也休想得到——這就是中國政治！

對於這種作風的首長，就算他們真有搞好香港的願望與誠意，我們又能寄望他們什麼呢？

現在談第二點，即香港是否可以在除英國人的

統治地位之外，現狀一切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實行「港人治港」和「港法治港」。

我們並不懷疑，北京的領導者現在確實是這樣想，認為保持香港繁榮的最簡單手法就是把英國人趕出香港之後，一切保持不變。

何所謂一切不變？除了「馬照跑，舞照跳」，前些日子許家屯社長又多開了一條「右派報紙照辦」。看來北京的首長現在還沒有精力來管香港同胞的「精神污染」問題，因為國內同胞近來正在患着嚴重的精神污染症，而香港同胞也就因此得以「馬照跑，舞照跳」。但是從法理上說，只要香港換上了五星紅旗，香港人便算是共產黨治下的百姓了。假如北京的首長確實了解到跑馬、跳舞屬於精神污染的一種表現，而精神污染則必然導致腐化、墮落以至斷送前途，為什麼他們可以置五百萬骨肉同胞於不顧？在港英時代，北京是力所不能及，等到主、治權都收回之後，他們怎麼能夠不聞不問？是因為他們曾經答應過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嗎？這有什麼關係呢，毛澤東在大鳴大放運動開始時不是說過鳴放者言之無罪嗎？一九七八年鄧小平他們

為鼓勵別人貼大字報攻擊汪東興、華國鋒時不是說人民應該有權貼大家報嗎？何以鳴放之後會有殺無赦的反右運動，何以等到有人貼大字報批判鄧小平時，大字報便被憲法禁止了呢？

他們不問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港人治港」、「港法治港」的特區嗎？「港人治港」又有什麼十分新奇的地方呢？香港人不都是普通的中國人嗎？港人中像郭沫若先生一類對領袖忠敬非常，像四人幫一樣奇左無比及像吳桂賢一樣孤陋無知的不也大有人在嗎？姬鵬飛主任「港人治港」八方案中不是有一條說，香港的最高行政首長，在自治初期可以由香港「具有代表性」之社團協商推薦，然後由北京政府予以委任嗎？甚至在「初期」比較寬大的時候，港人對於自己的最高首長也只有由「具有代表性之社團」（何謂代表性？代表意義由誰確定？）「協商」推薦之權。推薦只管推薦，接受與否，還得秉承乎北京的意旨。誰要想得到委任和受任後不被解職，第一要緊的，自然是按北京的「既定方針」辦，這與港人治港或者不是港人治港有什麼大分別？

黃夢花議員自己說，他曾經向姬鵬飛提出過兩點建議，並已得到姬的同意。其中之一就是從速進行有港人參與協商擬定之「香港行政特區憲法」，再送交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用法律來肯定將來港人治港的模式，以堅定香港居民的信心。看來黃議員對成文法是很信賴的，他以為只要是人通過的法律條文就一定信得過並可以起到「堅定人心」的作用，他大概忘記了，在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時，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只有人大會才可以作任免決定，但是結果如何？一批「乳臭未乾」的紅衛兵不就把他拉下來了嗎？甚至事後「追加」的免職令，不也是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的嗎？如果簡單地以非常時期和動亂時期作為解釋，又誰能担保類似的「時期」不會在中國重新出現？

新中國的領導人是大家公認最善於修改憲法的，誰能担保今天立下的「特區小憲法」不會在明天被修正？

香港大學的陳耀坤博士也曾提議說，要保持香

港的高度自治化，最好的辦法是「先將中共可能對香港的一切干預「制度化」」，其對於「干預制度化」的解釋是：在北京的人大常委會中成立一個香港委員會，其中應該有港人參與，擁有絕對否決權。

陳博士不知是否也信賴中共的制度，以為只要人大常委中設有港人參與的委員會，就可以制訂出有利於香港的法律，同時只要那個委員會能擁有像聯合國安理會中常任理事那樣的「絕對否決權」，一切不利於香港的議案就無法通過。但是，那個有港人參與的委員會，港籍委員要佔多大比例才足以真正成為香港利益的維護者呢？如果它多數或全部由港人組成而又擁有如此的特權，中共會答應嗎？就算中共答應，我們仍然想要知道，那些港籍委員將以什麼方式產生，代表誰的利益？如果他們也像「最高行政首長」那樣，由「具有代表性之社團協商推薦，由中國政府委任之」，我們怎麼可以對他們寄於如此厚望？更何況，整個人大常委會以至整



1997之後的黃大仙仍將烟火鼎盛？

個人代表大會今後的實際職能如何，是否會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權力機關」，實則還是一件十分值得我們去了解的事。假如我們大胆設想，中國的人大會成了名實相符的權力機關（？），它的代表，當然都應該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因為如果他們是由黨的領導者通過「協商」方式指派委任，這些代表根本就不可能擁有超脫於指派者意志的實在權力。既然他們是民選的，當然不必無條件遵照黨過去的領導者的指示辦事，鄧小平諸公今天的決定和承諾，對於日後的人大根本沒有約束力，那又何必今天煞有介事地搞什麼制度化？

假如終有一日，中國的人大會成了名實相符的最高權力機關，國家真正走上了民主法治之途，香港人有什麼理由還要怕自己的權益得不到保障，非把香港搞成個「特區」不可？香港希望成為「特區」是因為它深知國內的「四個堅持」扼殺了民主自由，沒有民主自由，香港現有的繁榮和香港人現在的「民主」、自由生活就會無法保持。反過來，只要國內不民主不自由的狀況沒有改變，任何形式上的「制度化」都不能使香港的「特區」夢最後成為現實。

黃夢花議員在他討論香港前途的書面談話中說：「有些人堅稱港人不能治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內容納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並無先例，而且兩種制度是矛盾而對立的。無先例並不等於無可能；再看英國，既有封建制度下的女皇，又有民主選舉的議會，君主與民主，不是共存得很好嗎？」（見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各大報章報導）

在這裡，黃議員想要以英國既有女皇又有議會來證明中國可以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但是他似乎沒有了解到，把英國的女皇與議會共存說成是君主與民主共存，實則很難令人信服。任何稍懂一點英國事務的人都會明白，現代的英國政治，在實際運作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君主主政的意味，君王只是議會民主制度之下象徵式的國家元首。黃議員拿這種虛君制度來比喻他認為可行的香港「特區」制，難免會引起香港人的恐慌。因為，如果中共真把日後的香港特區當成象徵式的特區，香港人究

竟能夠得到什麼？

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可以容納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就一般理解，應該是指經濟制度而言。這從粗略看來，當然不是不可以成立，最少這幾年改革的結果已經使國內出現了許多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什麼叫社會主義，本來就沒有劃一的說法，只要大權在握的人喜歡，甚至把香港現有的許多東西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又何嘗不可？

但是，在政治上，如果有人能夠證明，專制獨裁的國家可以出現和容納自由民主的社會，那倒真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正在對付一月十三日九龍暴動的防暴警察

黃議員在他的書面談話中最後還說，香港政府各部門的公務人員，負具體管理責任的，絕大部份都是香港本土的中國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業務上的經驗、學識與能力方面，比其外國籍上司還要高強。既然如此，「爲什麼硬要說將來港人不能治港」？

這地方，黃議員又錯了。香港的繁榮主要是香港中國人的功勞，這一點誰也不會懷疑。說港府中有許多本土籍的公務員很能幹，就才幹、學識而論，完全足以單獨挑起治港的重担，又有誰會不以爲然？可是黃議員不應該不理解，國內的政府部門，到處都有甚至比香港公務員能幹得多的人，何以他

們不能把我們的祖國治好？這裡的問題所在，根本不是有沒有人才而是在什麼樣的制度之下。

至此，有人會說，將後的「港人治港」不是先有一個現有制度保持不變的前提嗎？「港人」加「港法」，問題不就解決了？

事情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就算我們假定，香港政府中的現有官員，除總督及多數司署長官之外，到將來實行「港人治港」時都留職，只要那位「最高行政長官」是由中國政府委任之一，情況就會大大不同。今天的港府高級領導人，不管其有能無能，只因為他們不會動不動以個人好惡或「最高指示」爲依據干預下屬的日常工作，令上下級辦事都能依章依法，而那些「章法」又不是憑少數領導人的指示精神制訂出來的，一般的行政工作就容易做得有條有理，輝煌成績也就可能出在這裡。等到「港人治港」時，受委派的最高行政長官，只要他好好保住職位，就不能不視乎北京首長的臉色辦事。那廂首長的喜怒無常和慣於看見下屬奴才般辦事的習氣，相信已經無人不曉，那麼，大家還希望什麼？

「港人治港」與「英人治港」的根本不同之點在這裡：英人治港時，香港政府通常辦事都可以但憑其是否合法和有利於香港市民，欲行即行，欲止則止，中共政府輕易不敢干預也不容易干預。因爲這時節如果中共要干預，它就不是單純面對五百萬香港同胞，而是同時要面對英國政府，這涉及到外交上的重大問題，不但要慎重，很多時候還不得不做出犧牲性的讓步。

到「港人治港」時，香港人已經變成了中共的實在治民，港人與中共之間已經不再有個中間阻隔，首長們對於大家也就不可能有那麼客氣了（大家只要稍爲體味一下國內政府對待外國人與華僑、華僑與港澳同胞及港澳同胞與國內同胞的鮮明態度，就可以立即覺悟到一點東西）。到時候，香港縱然有了什麼好政策、好方案，只要北京的首長認爲有違黨的原則甚至只是違背了他們自己的心願，從而把眉頭一皺，香港的當政者，恐怕就不敢一意孤行。就算敢以頂着幹，也會因爲香港「自己人」中有

許多分散在各團體、各單位，思想左傾或喜歡拍馬鑽營的人在從中搗亂，以至事倍功半或以失敗告終。等到類似的情形出現過一兩次之後，敢以再逆旨辦事的人大概也就不多了，縱然有，其結局也必然會因搗亂者更囂張和市民抱懷疑態度而至弄得更加不堪承受。

舉例而言，儘管許家屯社長寬宏大量地答允了，中共收回香港之後，右派報紙可以照辦。但是，到那時候，假如有這麼一家「右派」報紙，每當黨發出重要指示或作出重大決定時，都能以大量事實加上最雄辯的文詞，逐一論証其爲不合國家民族利益或者有違人性、人道精神；又或者這家報紙會經常報導和論証一些有關黨的最高領導人（例如在目前把矛頭對準鄧小平）獨裁荒唐的事實，大家以爲，事情會有什麼結果？那時節，就算北京不直接插手（其實根本不可能，因爲類似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所爲危害到一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單單香港的左派人士和投機份子，就會令那家報紙吃不消——有人圍攻、有人討伐，甚至有人放炸彈，一陣騷亂之後，自然會有上上下下的壓力，迫使「港人治港」政府的有關領導人，作出果決行動把那家報紙解決了。一家報紙被解決了，別的同類，自然會從中得到啓發，使「局面爲之一新」。

這就是「港人治港」與「英人治港」的根本不同之處。請原諒我套用黃夢花議員書面談話中的最後一句話作爲本文的結束語：「香港人如何去治理香港?!」



瓷(刻)

英國政府

能否代表

香港民意？

編輯先生：

讀過貴刊第八期怡文先生的「密雲不雨」的香港局勢」後，我心裡很不是味道。現在有一連串問題想請怡文先生解答，希望貴刊准許將此信刊登在「來信摘登」專欄裡。

(1) 怡文三番四次在文中強調英國談判的目的僅是爲了本身在香港的巨大利益，換言之，假若香港對英國是無用的話，英國根本就不會去談判了。請作者證實一下他這結論。他憑甚麼知道這是英國唯一的目標？

(2) 文中提到「港法治港」，作者說中共「直接了當的拒絕」。但據我所知許家屯就親口說過，港人治港即港法治港，難道許家屯是中共的「叛徒」，抑或怡文在文中說謊？

(3) 怡文說：「港法治港……法律制度上仍然是殖民地化」。衆所周知，香港的法律即是英國的法律，難道英國法律的本質就是殖民地法嗎？香港市民絕大多數都希望九七年仍然是「港法治港」，從民主的立場來說，不管將來誰接管香港，是否都應該實行「港法治港」呢？

(4) 怡文把香港最近的經濟動蕩都歸於港府，但香港輿論界大致認爲是因爲中共不大遵守談判保密的原則，講太多話而導致港元暴跌。縱使港府應負一定的責任，但也是次要，最主要還是中共說

話太多，請怡文先生對此解釋一下。

(5) 以香港政府的開支和收入，除了年前的「高地價政策」外，能製造得了通貨膨脹嗎？香港的通脹加劇主要是港幣暴跌之故，並不是甚麼「政府大量加稅、加價」等等，如果怡文認爲我說錯，請拿出證據來支持你的觀點。

(6) 「中國廢除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平等條約、收回香港完全是天經地義的事」怡文講得好。但我要告訴怡文，香港的主權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而不是屬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香港人有足夠資格告訴中共：「我們寧願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也不要中共伸手進來，除非中共能保證在香港實行真正的民主、法治、人權和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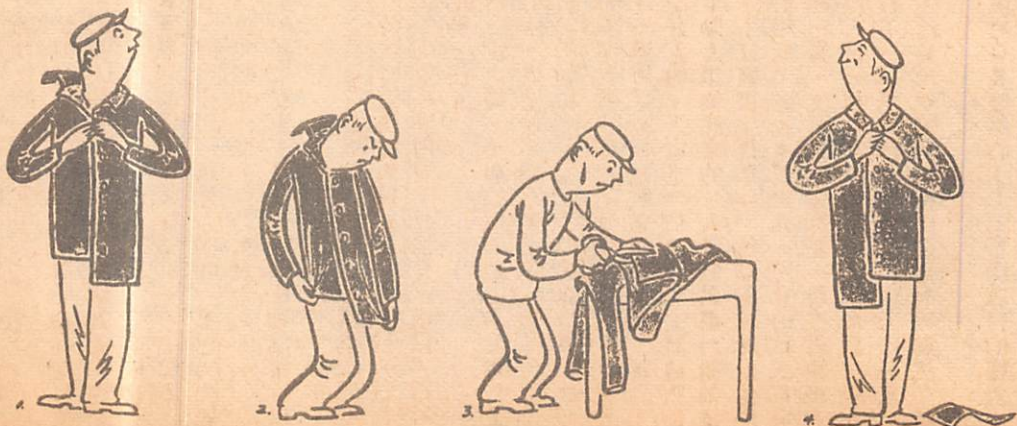
(7) 怡文又寫道「英國企圖玩政治經濟手段阻擋歷史潮流肯定徒勞的」，不知他所指的是甚麼歷史潮流呢？是「收回香港」的潮流嗎？我想怡文是指英國沒有權利在香港問題上和中共「過招」。但衆所周知，香港人是視英方爲他們的談判代表，而實際上英國所提出的「主權換治權」、「維持現狀」等等都是香港人希望實現的。換言之，英國是真正代表香港的「民意」，若果怡文先生認爲英方沒資格代表香港，沒有真正掌握香港民意，希望怡文先生告訴大家從那裡得出這個結論。

(8) 怡文寫道：「英國雖然想搞一點小動作，興風作浪，有心賴着不走……」。請說得明確一點吧。與甚麼風，作甚麼浪呢？再說「有心賴着不走」，好，如果今日英國人說：「再見香港，我們要走了」，我相信沒有一個香港人肯讓英國走，更會說英國拋棄他們！君不見兩年多前英國修改國籍法時港人就曾抗議英國準備九七年後拋棄他們嗎？

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有資格批評香港、批評中英談判，但一定要以理服人，憑良心講話，絕不可採取中傷或生安白造等手法。如果怡文認爲我信中論點有錯之處，我歡迎和他作一場辯論。

三藩市讀者 陳剛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無題 趙良(陝西)

老Q新傳



柏仁

(續上期)

十二、「太陽」隕落 阿Q哭喪

「九七」在頂層是一次「分權鬥爭會」，在高層和中、下層，是一次「鬥爭分權會」。你鬥我爭，把一切權力分得一乾二淨。

阿Q雖然走出了牛棚，却無處亮相。他原來的位位置，早已被人佔去了。科技口各級黨委，完全被軍代表和工宣隊佔據，他們的班底，完全被排除了。即使幸運者，也只能降級做副手。——做副手也並非容易，因為任何一級權力機關，都已大大膨脹，各級副書記都是十幾人，乃至幾十人。

阿Q的運氣總算不錯了，因為原屬高層，所以才在某部安排了一個第八副書記的職位。這對於阿Q，當然是降級，是諷刺，是侮辱。但是如果不去，這個位置也會很快被人佔去。——能和阿Q爭權的人太多了！這一點阿Q十分清楚，所以不得不厚着臉皮走馬上任。

然而上任之後，更加煩惱。他必須聽軍代表和工宣隊喝令，這使他感到忍無可忍。這羣坐直升機的暴發戶，怎能和阿Q比呢？他們算老幾？他們那一套，阿Q早就提出了，有啥新鮮？完全是拾阿Q的牙慧。不過阿Q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軍、工兩家可不是好惹的。人家是「佔領一切上層建築領域！」，是偉大領袖派來的，人家個個都「領袖像章胸前掛，小紅寶書手裡拿」。阿Q怎敢說拾他的牙慧？恰恰相反，雖說本質無異，阿Q的款式都過時了。他那一套，文革之前還算左，現在就顯得右了。阿Q本人也一樣，文革之前算是革命派，現在就是絆腳石了，只能算「留用人員」，入「另冊」了。對此，阿Q自然咬牙切齒，但是有啥辦法？權力易手了！

這使阿Q多麼傷心！十年奮鬥贏得的權力，轉瞬間被奪走。這使他想起早年那次大賭來，那是贏錢最多的一次，洋錢都成了壘。但是突然一片混亂，混亂之後洋錢全不見了。這場文化大革命也和那場混亂差不多，只是亂得更高級，以至於將他關了幾年，頭上增加幾塊紅疤。亂過之後，大權也易手

了。

現在雖說亮了相，有了安排，但是不僅降了級，還是個排第八的副職，人稱第八「副書記」。羣衆見到他，再也不是當年那般必恭必敬了。最講禮貌者，也不過點頭招呼；不禮貌者，直呼「老Q」；有的就像喊雜工一樣。那些青年造反派還贈他一個綽號，叫他「Q老八」。不知爲什麼，這三個字拼在一起的發音，阿Q覺得最刺耳，就像早年喊他賴瘡疤一樣。有時他哀求這些年輕人：「叫老Q不好嗎？就叫老Q吧！」對方却說：「你不高興？那就叫「Q八」或者「老八」，好嗎？」說完大笑而去。

但是現在的阿Q，畢竟不同往昔了，腦袋裡有偉大思想，堅決按偉大教導辦事，對任何事都懂得問一個「爲什麼」。走出牛棚，他一直苦思冥想：偉大領袖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是爲什麼？造成權力易手，這是爲什麼？他絞盡腦汁，發揮偉大思想的威力，想來想去，終於得出一個自己滿意的結論：這全是禿帥搞鬼！就是因爲他想做接班人，想當副統帥，所以欺騙偉大領袖，發動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他的罪過！可是他又想，偉大領袖最英明，最偉大，怎麼受了禿帥的騙？上了禿帥的當呢？這個問題難找答案，他不去想。他只想：禿帥陰險、狡猾、奸詐。他能騙得偉大領袖的信任，這就是證明。所以他恨禿帥，越想越恨。「你看他那面貌，狗熊猴相，一副奸臣模樣！」阿Q在心裡狠狠地詛咒他。

歷史證明，阿Q終屬不凡。蒼天憎其所憎，神佛恨其所恨。晴天一聲霹靂，禿帥摔死在溫都爾汗了！這消息時傳遍神州大地，阿Q是十億人之中最高興的了！他覺得滿天烏雲頓時散去，天該亮了！他失去的一切，快要回來了！他歡呼，雀躍，到處咒罵禿帥罪該萬死，死有餘辜，高呼偉大領袖萬歲！萬萬歲！

然而阿Q很快就發現，禿帥之死，似乎對他沒有意義。他的處境，並未因禿帥摔死而獲改善。軍代表和工宣隊，照樣大罵禿帥，那聲勢之大，令他黯然失色，他的咒罵似乎就毫無價值了。因此禿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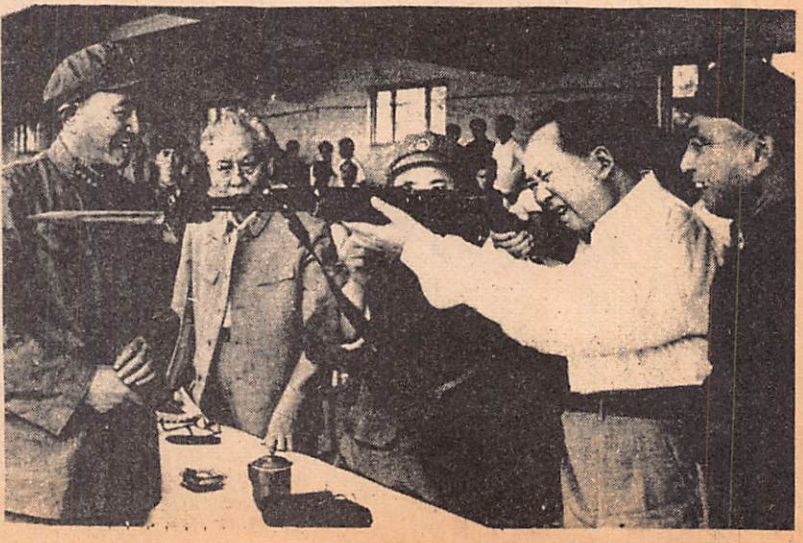
死後，他反而更加悵悵了。

阿Q在悵悵之餘，不禁又問了個爲什麼。——禿帥已死，爲什麼軍代表、工宣隊還不撤走，反而向他示威呢？這個問題本來也不易找答案。但是禿帥摔死，證明了阿Q的預測準確，這給他很大鼓舞，因此他的胆量大了。他敢想，敢猜，敢於推理，且敢於突破，終於破了禁區，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罪魁禍首是夫人！是她想奪權，想做女皇，是她欺騙偉大領袖，偉大領袖上了她的當，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切罪過全是她的，和他老人家無關，絕對無關！他還是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而且更堅定。可是阿Q又深感苦惱。——他不能把偉大領袖和夫人分開。誰能分，誰敢分呢？這真是媽媽的！唉！領袖！你爲啥當年要和她……這實在是傷腦筋的事！

解放以來，這是阿Q最苦惱的歲月了！有辦法能把夫人和領袖分開，解除這種苦惱呢？她真是太無情了！當年阿Q全心全意支持過她的樣板戲，她曾十分滿意。可是如今却完全忘了阿Q。就因爲她忘了阿Q，所以偉大領袖也忘了阿Q，這就更加可惡，更是媽媽的了！

唉！沒有比無權的日子更苦惱了！舊社會沒啥別沒錢，新社會沒啥別沒權。如今阿Q正是丟了權。這是何等不幸！這不僅是阿Q的不幸，也是兒子小Q的不幸。本來早已計劃妥當，憑他的官階，小Q升大學和出國深造，完全有保證，族譜再增加光輝的一頁，指日可待。然而今天丟了權，這計劃也成了泡影。這個打擊實在不輕。「我的兒子比你強多了！」這末莊時代的豪言壯語也無法實現了。進京高升，生下小Q，對兒子的前程，也曾費盡心思，盼子成龍，日甚一日。如今一切設想像夢一般破滅了。這個打擊，遠遠超過趙太爺的竹槓和紅衛兵的棍棒。實在太媽媽的了！

阿Q的苦惱，隨着歲月逝去而日益加重。他有時也給自己寬心：天無絕人之路，誰曾料到禿帥會摔死在蒙古呢？但是細加思量，仍感前景黯淡。——夫人是不會摔死的，她絕不會和偉大領袖分裂，也不會偷飛機逃跑。這真是太媽媽的了！



善弄槍桿子的毛主席

現在只有一線希望，就是他老人家有朝一日想起阿Q來，召他進中南海，親自爲他復職。雖然他知道，禿帥死後，黨務如麻，偉大領袖每天有四十八小時都不夠用。怎能想起他？但是他堅信，總有一天，偉大領袖會排除萬難，重振大業。那時他老人家得閒有逸，一定會想起他。就是這一線希望鼓舞着他，挨着失權的苦難歲月，期待着來自中南海的佳音。

希望是美麗的，現實却是悲涼的。一九七六年，喪星高懸。新年伊始，周朱二公相繼去世。這對於阿Q固然無關緊要，但却給他一個啟示：桃園三結義，雖非同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

同年同月同日死。

偉大領袖固然不願和他們同年……，阿Q却怕那一天在同年到來。而且他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預感：似乎那一天為期不遠。想到那一天，他不禁幻想破滅，萬念俱灰了。

突然，四月五日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偉大領袖親自指揮，鎮壓了這次事件；幾天之後又把鄧二公撤了職，再次發起了批鄧運動。阿Q很高興——這說明他老人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於是放下心來，緊跟偉大領袖去批鄧了。

人有旦夕禍福，八旬老朽更是禍福莫測。阿Q的預感，雖說莫明其妙，却不幸感中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又是一聲晴天霹靂，偉大領袖與世長辭了！阿Q有預感，却沒料到事情會這樣快。這噩耗先在黨委非常會議上宣佈。重代表一號人物，大把鼻涕，大把淚，泣不成聲。阿Q還不知來由，便聽到：「我們的偉大領袖和我們永別了！」這唐山地震似的一句話，如同原子彈爆炸，阿Q頓時覺得天昏地暗，繼而整個會議室，整個大廈旋轉起來。——阿Q休克了。軍代表和工宣隊好似斷了脊骨，全癱瘓了。阿Q醒來便嚎啕大哭，邊哭邊叫，時而捶胸頓足，時而頭撞板牆，那悲痛欲絕的哀慟，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聲勢之大，由樓內傳到樓外。外面行人都止步細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阿Q哭了多久，沒人計時，總之是軍代表和工宣隊早已拭淚而去，他依然在哭。天黑了，會議室黑了，他在繼續哭，哭得筋疲力盡，喉嚨沙啞。直至小Q找來，拉他回去。

在回家的路上，阿Q憤憤地對小Q說：

「龜孫子們，掉了幾滴眼淚，就都回家喝酒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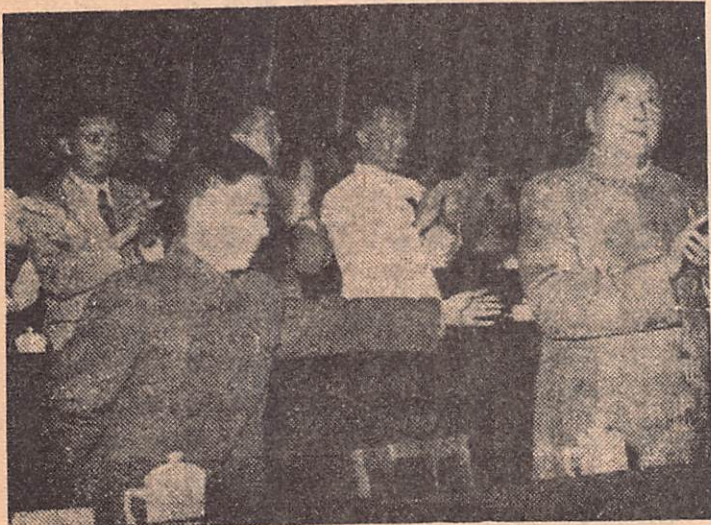
十三、青天平反 老Q造反

無論如何，偉大領袖是逝世了！阿Q怎樣嘆，他也不曾復活了。他失去了「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的領袖，失去了精神支柱，那悲痛當然無法抑制。在漫長的國喪期中，阿Q像中了邪一般，大冒上癩，小會上叫，哭昏了無數次，哭得眼睛像兩

個爛桃。必須承認，阿Q是真哭，不是假哭；是真鼻涕，真眼淚；不是假鼻涕，假眼淚。——他的哭是有思想的基礎的。

阿Q想：倘若夫人死去，偉大領袖不死，他失去的一切，一定會回來的。而今恰恰相反，偏偏是偉大領袖早別了，夫人沒死，也沒有要死的蹟象，他的希望永遠地破滅了。更令他忐忑不安的，是他不知道這女皇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說不定明天她就會宣佈再抓走資派。那他就連這個第八副書記也當不成了。想到這裡，他覺得「Q老八」這三個字相當悅耳了！這叫他怎能不萬分悲痛而大嚎大哭呢？

阿Q畢竟是歷史寵兒！正當悲痛欲絕，突然又是一聲晴天霹靂（那年月晴天霹靂太多了！）——四



胡耀邦在幹什麼？

人幫垮台了！夫人被捉！這消息比禿帥摔死更令阿Q興奮，他幾乎喊出「偉大領袖萬歲」來，但一想領袖已不在世，便改呼了：「偉大思想勝利萬歲！」

新領袖是花果風。阿Q雖然對此公印象欠佳——他在阿Q倒臺的年代崛起——但是偉大領袖的六字語錄「你辦事，我放心」，對阿Q具有極大的魅力。同時新領袖發出誓言：「凡是偉大領袖說的，我們就照辦！」阿Q聽了非常高興。——無可懷疑，這是「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者，這是鐵桿同志，是真正的接班人。最令阿Q欽佩的，是新領袖能把夫人和偉大領袖分開，在偉大領袖和夫人之間切上一刀，偉大領袖是偉大的革命領袖，夫人是現行的反革命份子。對偉大領袖，繼續「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對反革命夫人，抓起來，關起來。這是何等氣魄！何等果斷！偉大領袖真是識人善任，任人唯賢！阿Q在報紙上看到新領袖的平頭小照，心中不禁喊道：

「英明！英明！」

阿Q的眼光，果然不錯。不久報紙、電台和電視台一起宣佈了標準稱呼：「英明領袖花主席。」花主席也果然不負阿Q擁戴，水到渠成，阿Q恢復了文革前的一切職務和權力，秘書、轎車、住宅也一起恢復，連Q太在文革前晉升的副局長一職也隨之恢復，小Q也轉入名校就讀。人們見到阿Q，又是老遠便尊呼「Q首長」了。

Q府頓時重現一派春回大地的氣氛。客來客往，熙熙攘攘，祥雲瑞霧，喜慶滿堂。

新宅廳當正面牆上，並懸着老、新兩位領袖的標準像。阿Q站在像前，深深鞠一大躬，心中唸道：「英明領袖呀，您和偉大領袖一樣親！」Q太和小Q站在兩側，都向故去的和新生的領袖鞠躬。禮畢之後，阿Q深深地呼出一口氣來：

「這一天我總算盼來了！」

是的，這一天阿Q盼了多久，付出多少代價啊！終於到來了！

現在阿Q的最大希望就是花主席萬萬歲，黨的江山萬年長了！

但是那年月事情多變。花主席的像還沒掛穩，

又鬧起鄧二公復職來。

阿Q聽到，不禁怒從心頭起，堅決反對，大喊大叫：甚麼復職？這明明是翻案！這是偉大領袖親自批示的，花主席必須堅決照辦！誰敢翻這個案？倘若翻了這個案，多少案都要翻，那還得了，豈不要大亂？花主席還能坐得穩嗎？

阿Q反對翻案，似乎是先天的，本能的。他認為，一切重大案件都是偉大領袖所定，偉大領袖是偉大的革命家，哪裡有錯？怎麼會錯？除了假洋鬼子，誰能說偉大領袖有錯？

但是，自從文革以來，形勢總是與阿Q的願望背道而馳。鄧二公復職，愈演愈烈。花主席竟也不敢反對。阿Q本想大聲疾呼反對，但花主席都未敢表態，他怎敢輕舉妄動？

文革以來，阿Q樹了一條座右銘：
「雙手緊握烏紗帽，休管閒事惹是非。」

然而鄧二公復職顯然不是閒事，這與阿Q的命運至關重要。鄧老二，倘若復職之後，真的復辟資本主義，神州大地豈不又變成趙太爺、錢太爺以及假洋鬼子們的天下？到那時，他那烏紗帽就算焊在頭上，也會被敲掉的。這真是最媽媽的了！

可是有辦法呢？偉大領袖逝世不到一年，鄧二公終於復職了！這世道越來越不像話了！還好，就算他復了職，也只排在第三位，花主席仍是主席，大相片仍和偉大領袖像掛在一起，偉大紅旗仍要高舉，阿Q學到的語錄仍然有用。還有少帥名列第二，全力支持花主席，同樣主張「凡是」和「高舉」。這令阿Q感到幾分安慰和鼓舞。但是，阿Q的政壇生涯已滿二十年，是名符其實的老幹部，政治嗅覺，相當敏銳。他似乎嗅到，鄧二公復職，這是大變開始，非同小可。而且據他觀察（文革之後阿Q已成爲觀察家了），鄧老二來者不善，似乎是猛虎歸山，蛟龍入海。如今已無降龍伏虎之君，黨的天下豈不又要大亂？他的烏紗帽是否保得住，着實可慮。這也是最媽媽的了！

然而麻煩事終於發生了！鄧二公果然刮起了「右傾翻案風」，他不僅給一切「走資派」翻了案，且揚言要給海帥翻案。這「走資派」，雖說阿Q不是，但總該有幾個，偉大領袖總會全抓錯吧？看

來給「走資派」翻案，似乎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無可阻擋。好在這對阿Q並無直接損害，由他去翻吧。可是海帥的案却萬萬不可翻，那是阿Q親自參加了的，雖說列席，但他在會上表了態：「反對偉大領袖，就是反革命！」倘若這個案翻過來，海帥成了革命派，阿Q的發言豈非反革命言論？這姑且不說，更嚴重者，海帥一旦翻案，偉大領袖的「三面紅旗」就要倒了，而阿Q就是靠反右、反海和高舉「三面紅旗」起家。如果海帥真的翻案，「三面紅旗」真的倒下，阿Q的政治資本，三股就要失去兩股。三足之鼎，失去二足，豈不要倒台嗎？

誰知事情就是這樣可悲，海帥的案，果然平反，且宣佈海帥爲革命家了。「三面紅旗」雖然還沒拔掉，總路線和大躍進已遭批判，人民公社也有名無實了。三足之鼎，確實只剩一足了。不過阿Q堅信，「反右」這股政治資本，絕對不可動搖，這是無產階級和假洋鬼子們的鬥爭。「右派」不同於「走資派」，不同於海帥。後者是黨的路綫鬥爭，據說常有反覆，但無論怎樣反覆，總是黨的天下。「反右鬥爭」萬萬不可反覆，如果「右派份子」翻了案，神州大地就要變顏色了！所以鄧老二倘若真給「右派」翻案，他就是地道的反革命！

然而這世道真是太媽媽的了！鄧老二果然指責「反右」擴大化了，而且揚言要實行「改正」。還有那個陳老雨，冬眠了二十年，現在也活躍起來，一唱一和，爲「右派」呼冤叫屈。簡直是唯恐天下不亂。如此下去，怎麼得了！他們不懂，那頂比緊箍咒還靈的「帽子」是萬萬不可摘下的，否則假洋鬼子們會翻天的！

阿Q在一次高層會議上聽到鄧二公宣佈「改正右派」的決定時，肺都要氣炸了！話沒聽完，便罷了會，拂袖而去。回到家裡大喊一聲：

「媽媽的，要給右派翻案，拚了！」

他用右拳猛砸方台，把玻璃磚砸得粉碎。

Q太急忙過來安撫：

「別管那麼多了，保住自己就行了！」

「你懂個屁！」

阿Q怒不可遏，破門而出。——他串聯去了。阿Q在神州政壇上混了二十個年頭，不是孤立的。思

想一致、氣味相投的真正鐵桿同志，不乏其人。頂層、高層、中層、基層；堂內、軍內都有串聯對象。僅僅半日，阿Q便聽到強烈的呼聲：「不准爲右派翻案！」尤其在軍內，大批紅領章將軍，堅決反對。阿Q煽動他們，鼓勵他們，最後夥同他們聯名上書，伐義陳詞，堅決反對爲「右派」翻案。

不知是懾服於紅領章，還是真怕阿Q，上書果然奏效，鄧二公始終沒敢提翻案這個詞兒，而只限於「改正」。而且即使「改正」，也不准「右派」擅自改正，而是由黨委審查，真正錯案，方可改正，不是錯案，休想改正；就算真錯，堂委不批，也不可改正。這顯然是迫於上書，而讓步了。

然而說是改正，可是一開頭就像決堤的水庫，那，汪死水頓時嘩嘩地流走了百分之九十九。這真是太媽媽的了！幾乎全改正了！好在不管流走多少，也還是「改正」，而不是平反，鄧老二承認，「反右運動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確。」這就關照了紅領章和阿Q的尊嚴，保留阿Q最後一股政治資本。

這固然是阿Q的勝利，但在他心頭投下一個憂慮的陰影。——形勢越來越糟，鄧老二真正打着紅旗反紅旗，其目的最後拔掉偉大思想的偉大紅旗。這實在是太媽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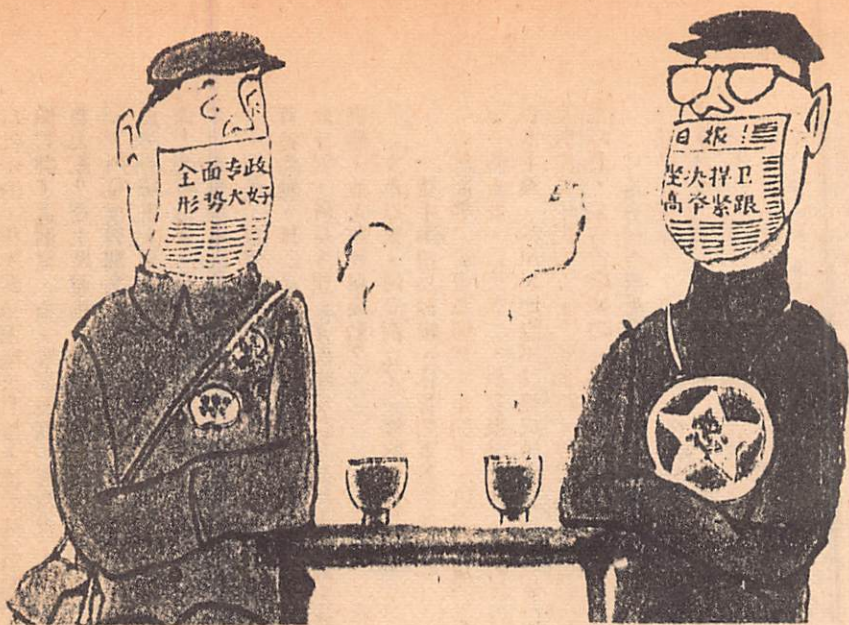
阿Q真可謂眼睛亮，嗅覺靈。不久鄧二公提出，要爲劉紹其翻案。這個劉紹其不單是「走資派」，且爲「叛徒」、「內奸」、「工賊」，這是全黨上下一致通過的，這個案怎能翻呢？這分明是對偉大領袖將一軍，下一步就要清算他老人家了！阿Q對劉紹其本無所恨，給他翻案對阿Q也無所失。可是他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鄧老二把矛頭指向了偉大領袖，阿Q要傾一腔之血，和他拚了！

阿Q再也不能平靜了，他要做好一切準備，做一次最後的鬥爭。遂又四處奔走，八方串聯，聯合起所有鐵桿同志，發出怒吼：反對翻案！永遠高舉！誓死保衛！這勢頭形成一股旋風，由釣魚台吹進大會堂，由大會堂吹進中南海。所經之處，積極參與者有之，搖旗吶喊者有之，拍手喝采者有之。阿Q與高彩烈，飄飄然，似乎是公衆領袖了。

可是他只知己而不知彼。不料鄧二公也會串聯

，鐵桿同志比阿Q更多，且都在頂層，其實力遠非阿Q所能抗衡。不久鄧二公建議，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雖非一致）決議，為劉紹其徹底平反。阿Q雖然列席，却表示堅決反對。據說鄧二公曾問阿Q：

談心



「老Q同志，你為什麼反對呢？」

阿Q斷然答道：

「凡是偉大領袖說的，必須照辦！如不照辦，天下大亂！」

說罷退出會場，揚長而去。並聲言拒絕參加劉紹其的平反大會，離開北京，以視查為名，南下避寒去了。

阿Q敢反對政治局的決議，聽起來真是胆包天。不過並非冒險莽動，據說K帥和他同一行動，也拒絕參加平反大會，而去廣州渡假了。

儘管K帥和阿Q一起反對，劉紹其的平反大會如期召開，「叛徒」、「內奸」、「工賊」，又變成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

阿Q在南方某酒店看到報紙報道時，暴跳如雷：

「真是太媽媽的了！」

嚇得一名女服務員急忙走近來道歉：

「首長，我們缺點很多，您有意見，請多多批評。」

十四、語錄作廢 老花退位

阿Q本想長駐南方，以示抗議。但是不久又聽到鄧二公建議：討論偉大領袖的功過。阿Q氣得直顫抖，心裡罵道：

「這個鄧矮子，到底搞到偉大領袖頭上來了！」

於是匆匆回到北京。北京的氣候真是壞透了！黨內的劉紹其份子、海帥份子、胡子帥份子，五七年的右派份子，五年的胡風份子和肅反對象，三十年前歷史反革命份子，三十年來的新生反革命份子，以及形形色色、莫明其妙的牛鬼蛇神，像螞蟻一樣多，在各單位，各個大廈裡鬧翻了天。尤其是那羣獲得「改正」的右派作家，比假洋鬼還假洋鬼子！居然糾合一起，竊竊私議「三七開或七三開」了！阿Q見到這羣人，恨不得架起機關鎗，或者拉開手榴彈的引信，把他們統統……

不過前面說過，阿Q頭腦裡有了偉大思想，對任何事情都懂得問一個「為什麼」。這羣牛鬼蛇神

如此狗胆包天，這是為什麼？就因為鄧老二復了職，給他們翻了案。反言之，他們都是鄧老二的社會基礎！

但是更傷腦筋的，是怎樣對付這個「基礎」，阿Q簡直沒招兒。他曾請教過K帥，K帥也沒招兒。阿Q完全處於被動和招架地位。

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鄧二公親自主持，特邀阿Q列席，當場將阿Q一軍：

「老Q同志，你說偉大領袖犯錯誤沒有？」

阿Q沒料到，無可回答。說沒有吧，那文革是誰發動的？四人幫是誰扶起的？自己為啥坐了三年牛棚，頭上還增加了好幾塊大紅疤？說是吧，那豈不拆自己的台？因此阿Q和K帥一樣，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可是在政治拳擊的賽台上，不發言便是認輸。只有瞪着眼，瞧着人們一句句、一條條，清算偉大領袖的罪過，和往他那「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的聖像臉上抹黑。這是何等慘重的打擊，這打擊比「逝世」更沉重。

當陳老雨宣佈偉大領袖犯了嚴重錯誤時，阿Q真想撲上去，給他一猛拳，把他打翻在地。但是他却感到更大的悲哀，——那時代已經過去了，他沒有那般權力了！

阿Q瞧瞧花果風，希望新領袖有所表示。只見這位英明領袖泡眼、鼓腮蛋，緊閉着咀像個傻小子，端坐在鄧二公左側，一籌莫展。

阿Q感到奇怪，當年批鄧，這羣人何等英雄，如今鄧老二坐在眼前，他們却成了啞子，一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模樣。

阿Q再瞧瞧鄧二公，細細端詳這個會場上最矮的人，他覺得這個鄧老二實在沒啥神奇之處。

正當會場氣氛最緊張時，鄧二公突然發言：

「雖然偉大領袖犯了錯誤，偉大思想並沒錯，我們仍然堅持。」

阿Q一聽，心裡閃了一下希望的火花：難道鄧

老二也要高舉？但鄧二公接着說：

「偉大思想，並非偉大領袖一人的思想，而是老一輩革命家的集體創造。」

阿Q乍聽，沒太理解。——平生第一次聽到。理

解之後，那希望的火花立刻便熄滅了。且由失望而悲哀，由悲哀而惱怒。他在心裡喊道：

「偉大思想是集體創造？你鄧老二也有份？豈有此理！偉大思想便是偉大領袖的語錄，學習偉大思想，就是背誦語錄，如果偉大思想不是偉大領袖發明，而是集體創造，那麼偉大領袖的語錄怎麼算？哪幾條有效？哪幾條作廢？既然你們也創造過偉大思想，你們也有份，那麼你們也有語錄嗎？請把你們的語錄拿出來，沒有嘛！既然你們沒有語錄，請問你們的偉大思想在哪裡？」阿Q本想破口喊出來，但他的咀被會議的氣氛封住，張不開了。

阿Q閉着咀，瞅着K帥，希望K帥說話；K帥閉着咀，瞅着花果風。花果風的臉始而陰沉，繼而抽搐，終於霍地站起來，用濃重的山西腔喊道：

「我這個主席不能當了！」

說罷退出會場。

阿Q一看，這是個退場的好時機，於是也憤然站起，大步離去。只有K帥仍然像一尊石雕一樣，端坐在那裡。

十五、鞠躬盡瘁 阿Q萬歲

阿Q和花果風雖然同時步出會場，二人動機却完全不同。花果風是認輸，讓位。阿Q是罷會抗議。

花果風雖說是主席，也曾受到阿Q的崇拜，但實踐證明，花果風並不是英雄；阿Q雖說沒當過主席，實踐證明，阿Q是真正的英雄。其英雄氣概，絕非花果風可比。鄧二公一宣佈偉大思想非偉大領袖一人所有，花果風立刻就斷了脊骨，而乖乖讓位於阿Q則恰恰相反，不是服輸，而是針鋒相對，概不聽鄧二公那一套，照樣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由此可見，在捍衛偉大思想的鬥爭中，花果風遠不及阿Q。

歷史證明，偉大領袖選錯了接班人。第一次不該選禿帥，第二次不該選花果風，兩次都應該選阿Q！禿帥自不必論。花果風怎樣？「你辦事，我放心。」——他抓了夫人，却輸給鄧二公。如此辦事，

偉大領袖怎能放心？反之，阿Q是誓死捍衛，雷打不動。偉大領袖在九泉之下也可永遠放心。這才是真正的接班人！

阿Q的那顆忠心，偉大領袖本來知道。早在「上天堂」之年，就對夫人說過：「阿Q才是我的好學生！」但是文革搞昏了頭，把阿Q忘了（這是何等不幸！）。文革伊始，花果風步步高陞，阿Q却進了牛棚，遭了大難。可是他一旦駕崩，花果風却臨陣怯戰，認輸讓位；相反，阿Q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却增強了黨性，把偉大思想當做生命和靈魂，海枯石爛心不變！

走出會場來，花果風瞧瞧阿Q，阿Q也瞧瞧花果風。花果風乘車回家去了。阿Q呢？阿Q不是回家，而是遵照偉大領袖的教導，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組織革命力量去了。——他要和鄧二公鬥下去！

革命力量在哪兒？這首要問題。在人民公社？阿Q知道，農民最恨他，他的名字和餓鬼連在一起；在工廠？不，阿Q知道，工人罵他，他們二十年沒加工資也和他有關。阿Q既不找農民，也不找工人，找他們沒用！阿Q仍是按照偉大教導：一個槍桿子，一個筆桿子，幹革命靠這兩桿子。阿Q去串聯紅領章和理論家們去了。

阿Q雖然不是宣傳鼓動家，却善於提口號。眉頭一皺，立刻提出兩個口號：

- 第一，還要不要偉大思想？
- 第二，還要不要黨？

這兩個口號，果然不同一般，雖說只是兩個問句，却立刻化成物質力量。

紅領章一聽，沒有偉大思想怎麼得了？他們都是唸語錄長大的；沒有黨怎麼得了？黨是母親，他們當年都是孤兒。

理論家們一聽，沒有偉大思想，怎能生存？他們都是偉大思想的理論家，不要偉大思想，誰還要理論家？沒有黨，就沒有黨天下，他們的天職就是保衛黨天下，沒了黨天下，豈不餓死理論家？

這兩桿子聽了阿Q的口號，同仇敵愾，一致表

示：堅決支持阿Q！在阿Q領導下，誓死保衛黨！保衛偉大思想！

得到這兩桿子支持，阿Q實力倍增。興奮之餘，居然唱起了：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接着阿Q又串連了頂層、高層、中層以及基層的一切鐵桿同志，發起了一個「誓死保衛」的運動，向鄧二公發動進攻。首先是兩桿子的結合體——解放軍發表大塊文章，一篇又一篇；「時代的報告」緊跟，一唱一和。於是輿論上掀起一個軒然大波。神州大地的全體鐵桿同志，無不歡呼雀躍，拍手喝采。

這是偉大領袖逝世後第一次政治運動——Q式運動。不可低估！給鄧二公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鄧二公一看，這兩桿子的鐵桿勢力相當大，又有阿Q指揮，還有人搖羽毛扇，來勢迅猛，銳氣逼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抵。遂決定避其鋒芒，暫告妥協。阿Q不依，提出條件。無奈，鄧二公做出三點讓步：

一、偉大領袖的畫像，不完全拆除，留一副掛在天安門城樓。

二、承認偉大領袖對偉大思想的創立，貢獻比較大。為此在「偉大思想」前邊加上一個修飾語，寫成：「以偉大領袖為主要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創立的偉大思想。」

三、鄧二公不做黨主席，由年輕人升任，名之曰：實現領導班子年輕化。

這個讓步，無疑是Q派的一次偉大勝利。但阿Q並不自滿，他仍舊按偉大領袖的教導：「敵退我進」，乘勝追擊。矛頭指向哪兒呢？他最恨者，當然是假洋鬼子，現在他們全是鄧二公的社會基礎，必須打爛這個基礎！於是依照歷次運動的慣例，從文藝開刀。聽說有個「改正右派」，寫了個什麼「苦戀」，辱罵紅太陽；還有一個當兵的詩人，寫詩罵將軍。真是可惡之極！就先整整這兩個傢伙！先叫解放軍報點他們的名，扣上一頂反黨「帽子」，這次追擊也大奏凱歌，Q派士氣，空前高漲。

文藝界一切鐵桿同志，熱烈為阿Q喝彩。阿Q乘勢對鄧二公施壓力，要求把二人交出，接受理論家們批判。鄧二公想掩護此二人，躲過這場轟擊，無奈阿Q仗勢不依，只好將二人推出令其向Q派低頭。鐵桿理論家們獲此良機，以餓虎撲羊之勢，向二人撲去，揮舞刀筆，狼加撻伐，恨不得頓時將二人置於死地。至此，Q派大獲全勝，阿Q始略感滿意。

鄧二公以為，阿Q總該識時務而光榮退位了，無論如何已年逾八旬，行將就木。於是為了和平過渡，特設一個顧問的榮銜，希望阿Q光榮退位。

然而鄧二公估錯了！十年文革，阿Q失權之苦，至深至痛！如今失而復得，愛之如狂，惜之如命！欲杯酒相釋，無異與虎謀皮。

「十二大」前夕，鄧二公特邀阿Q相叙，細言婉求道：

「老Q同志，你年高德劭，對黨貢獻多多。如今年邁體弱，不宜操勞過重。可否辭去常務，只做顧問？」

阿Q早已學會了兩句文詞等候：

「為黨革命，鞠躬盡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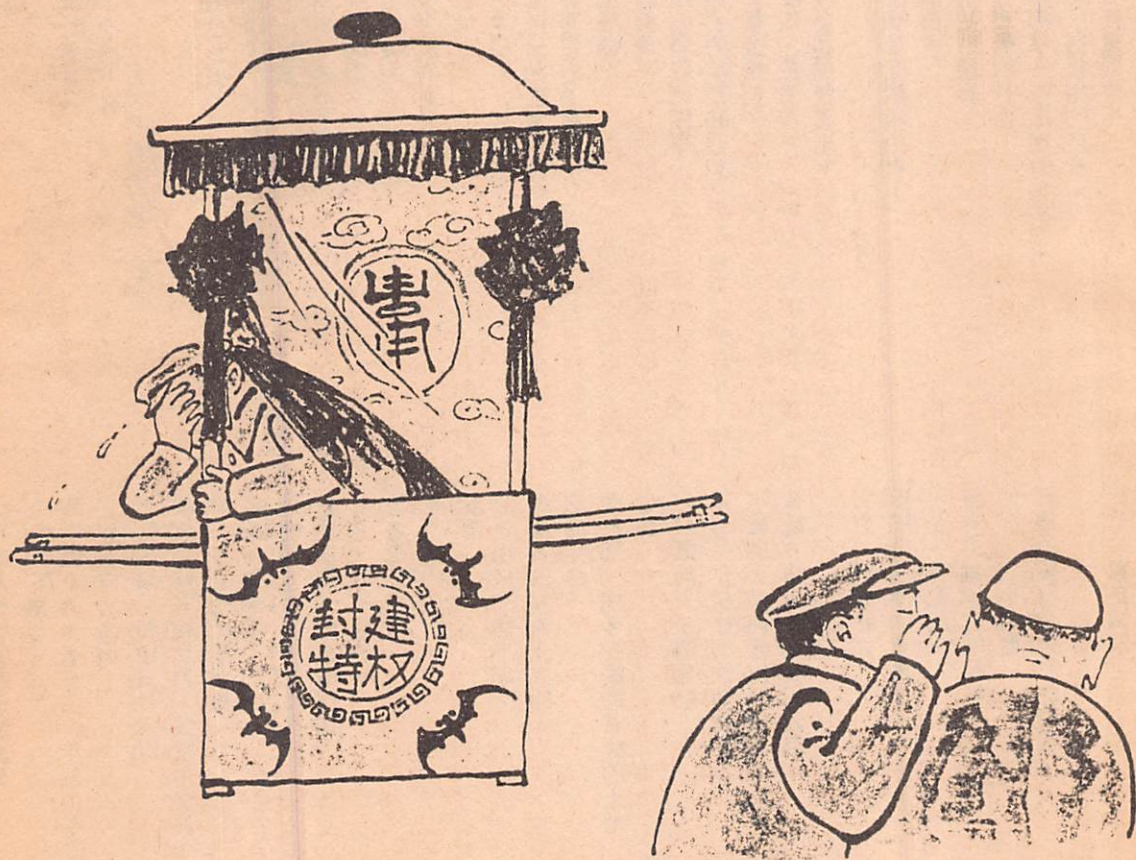
所以「十二大」之後，在「顧問委員會」的名單裡，沒有阿Q的名字，儘管按年齡推測應該有。

關心Q首長命運的人，都認為他理應退位，做一名顧問，既無尚光榮，又可保晚節。如此為守權而對抗，未見明智。——路線鬥爭，反覆無常，一旦失勢，後果堪憂。雖說自身年邁，大去之期不遠，總該為小Q做長遠打算才是。

戰友、同志、朋友們的關懷，固然可貴。不過，《三國》可讀，無需落淚。Q首長平生革命，凡幾十年。如此頭等大事，豈無深謀遠慮？

據聞小Q早已大學畢業，任職外經部門。刻下駐蹕香港，專做外貿生意。本港年餘，成績不菲。如今不僅在瑞士某銀行開了戶口，而且在外資保險公司買了萬能保險，一切不測均在保險之內了。

——完——



67. ——到婆家了，还哭什么？
——舍不得那花轿。

雲的惆悵

華旒

給吃牛的農民
一點蔭蔽。

因了偶然的幸運

它飄過了浩浩大海

(幸好，天空沒有用警犬看守的邊界)。

這是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

天藍得如深深的淡水湖。

雲，輕盈地飄蕩，

看地上樹木一般的大廈，

柔美的綠色高爾夫球場；

人的脈絡一般的高速公路，

汽車就像奔流的血液；

各種膚色的人

勞作着，享受着，競爭着，

城市的鬧區恰如繁置的蜂房。

有人拿着罪惡的手槍，

在大街上呼嘯；

在明媚的海灘，

蘑菇一樣的彩色遮陽傘，

蔭護着愜意的夢想和遐想；

在政府的辦公樓前，

長長的隊伍，流着汗，

等候救濟金和免費芝士。

雲，常常在星光疏淡的夜，

向上蒼感謝，

爲了這廣闊的視影，

爲了這無遮欄的自由，

爲了這和鴿羣一樣飛翔的和平，

甚至，爲了這孤獨的自身。

可是，它終歸厭倦，

這太輕浮的高蹈的生活。

它想化做雨，

敲打傳出急驟的「的是高」的窗戶；

它想流進，
泛着白天鵝般的帆船的港灣；

它想輕輕灑下，

鄉情濃重的「老金山」手栽的菊花，

它想在露天講壇上，

大聲議論，和參議員爭辯

關於美蘇限核談判，關於中美洲……

倘不，它想乾脆化做

雞蛋大的冰雹，

爲的是

在地面戳下生命的印記。

可是，它不能夠。

無邊際的漫遊，

正是它的使命。

因爲，

它是由另一個半球

那渾黃的溪水化成的，

它的生命

源於那一塊多丘陵的貧瘠的土地

也許，

它只屬於另一個天空——

帶着茅草辣味的炊烟彌漫着

工廠的大烟直吐出的烏雲污染着

夜晚有着衆多星辰的天空。

它想回到故鄉去

寧願做墮落的流水；

可是，紊亂的風

沒有力量送它的歸程；

何況，它也驚懼

那邊的雷聲和銳利的閃電。

於是，雲在惆悵，

深深地惆悵，

聽任風

吹到任何一個地方。

從此
它不再響着清脆的淙淙，
灌進龜裂的稻田，
也不再在河鯉產卵的春日
做一瓣托着落紅的浪花。
它展開
棉絮一樣的衣袖，
飄，飄
它不願變做夏的雨綫，
縫合天與地的巨隙。
至多，在幾乎滾沸的六月田野之上，
偶一駐足

上訪閻王爺

故事新編

話說這一日，閻王爺剛剛在大殿落座，便見把守艷都城門的夜叉慌慌跑來，跪地稟報：

「啓稟閻君，大事不好！」

「何事驚慌？」閻王爺瞪大了眼睛問道。

「艷都城外圍滿了孤魂怨鬼，吵鬧要面見閻君上訪，那黃泉路上塵土飛揚，正有衆多鬼魂結隊奔西而來，不知何故！」夜叉帶着哭音稟道。

「嗚呼呀，怪哉！」閻王爺想道：「自本王坐鎮陰朝地府以來，從未經歷孤魂怨鬼結隊圍城上訪之事，此中必有蹊蹺。」於是回顧左右喝令：

「牛頭、馬面聽令！」

「在！」牛頭、馬面急忙跑在階前。

「爾等速去城外帶領孤魂怨鬼代表來見本王。」

「遵命！」牛頭、馬面領了閻王旨意急急匆匆奔出閻羅殿。

須臾，牛頭、馬面帶着三名代表來在殿上。閻王厲聲問道：

「有何冤屈上訪？爾等從實訴來。」

只見一個面目清瘦的耆老往前跪行兩步，操着山東口音稟道：

「閻王大老爺，您雪（說）節細（這是）咋悔（回）事兒，俺奉了命去透省（投生），可那地方上的幾化省育拱作隊（計劃生育工作

隊）可他娘的不所（說）理兒。硬是把懷胎九個月的娃兒弄死在娘肚裡，再給任供（人工）六殘（流產）。一下絕了俺妥省（脫生）的路啦！」

耆老話音剛落，只見一旁有位面色黑裡透紅的婦女，亮開嗓門，操着東北口音道：

「閻王在上，這四（事）我心裡絲（實）在不是滋味兒，我去投胎那家銀（人），上級規定他們兩口子字（只）准生一個孩子，所以一心非生個小子不結。我剛下生，他們一看四（是）丫頭，當絲（時）就按在水盆裏浸死啦。我在陽間還沒呆上三分鐘，就又向您老人家報到來啦。」

女人說完退後一步跪下，第三名代表是位長相驍悍的小夥子，只聽他用唱山歌的語音道：

「維里瓦卡西拉加恩，哈莫沙赤會哇夫伯……」

閻王爺將手一擺，對左右問道：

「他說的是哪國語言，我怎麼一點聽不明白？」

判官急忙翻動「生死簿」，查出他本是雲南彝族的一名鬼魂，經找來白無常作翻譯，才搞清他上訪的理由。原來中共規定少數民族不節制生育，但明說一套暗行一套。有的少數民族婦女分娩時，官方醫院的接生人員故意拖拉

、敷衍、製造醫療事故，致使初生嬰兒的死亡率很高。這名青年本應投胎轉生，但因地方醫院又搞了一起人爲的難產事故，嬰兒死在母腹，使他無法投生，所以才來上訪告狀。

閻王爺聽罷，氣得鬚鬚直豎，搓着兩手，雙目圓瞪，「哇呀呀」暴跳如雷。亮開銅鐘也似的大嗓門叫道：

「這還了得，哪個大胆的烏龜打亂了正常的生死輪迴部署，做出如許傷天害理之事，定饒他不得！」

判官在側朗聲說道：

「啓稟閻君，只因當年毛澤東無知妄爲，聲稱人多是好事，根本忽視人口按比例增長，種下了中國人口迅速膨脹的禍根。但由於中國經濟落後，人民生活極端貧困。毛澤東死後，新當權者爲解決人口過剩之危機，竟不惜採取極端手段，大搞一胎化，強制人工流產，命令節制生育，近乎滅絕人性，致使怪事橫生，奇聞百出。」

「依你而言，造成今日人間慘局的罪魁禍首乃毛澤東是也？」閻王追問道。

「正是，如確切而言，毛澤東是種災的禍首，新領導是擴災的餘孽，全都爲害不淺。」

「真真氣死我也！那毛澤東今在何處？」

「毛澤東已落在十八層地獄，與商紂王同

囚一室，一日三次受絞心洗腦之刑。」

「再給他罪加一等，永世不得超生！」閻王切齒怒道：「那麼，如今搞這些傷天害理手段者又是哪一個？」

判官袍袖一拂，遣開閑雜衆鬼，俯首閻王耳畔，輕聲奏道：

「此人剛剛得到聯合國所頒節制人口獎，連中共政府也受到聯合國之嘉獎，那聯合國乃世界性組織，十分了得，我陰曹地府只管陰司，不管陽世，還是少管爲妙。」

閻王爺不聽倒好，一聽火冒三丈，「呲擦」一掌將龍案劈去一角，怒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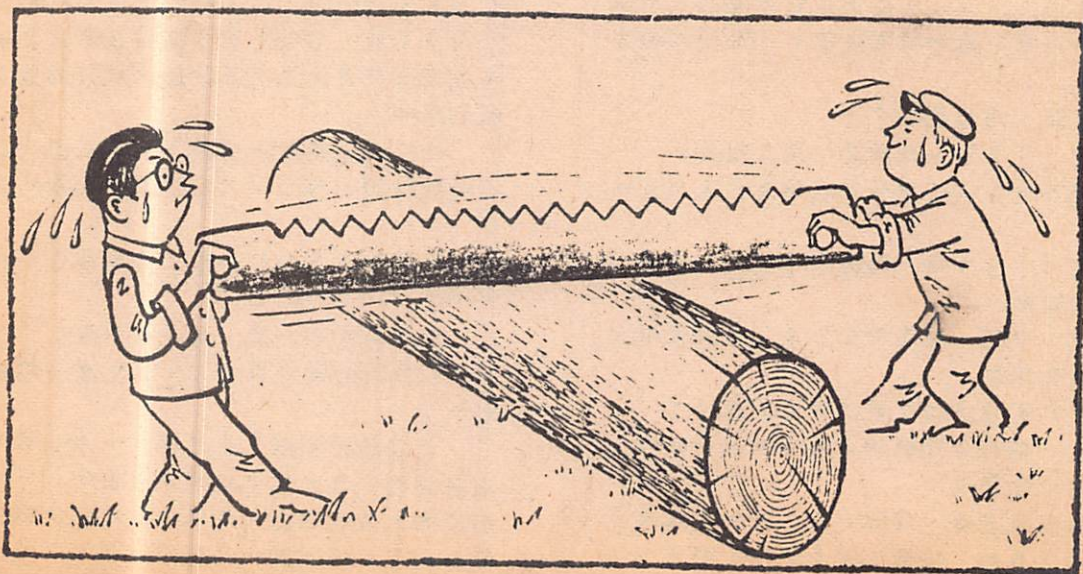
「呀呀晒！用殺人手段節制生育也能得獎，希特勒莫非要獲聯合國追贈的勳章不成？公理何在，老夫偏偏不服！」閻王起身，仰天怒嘯：

「馬克思主張『造反有理』，難道又要加上一條『殺人有功』！」說着一躍身形跳下玉階，對左右說道：

「待老夫去找聯合國評理，去找那些沒人敢碰的霸道小子算賬！」

閻王說罷飄然起身，發怒而去。究竟是去了聯合國還是去了中南海，至今尚無下文。不過，有誰惹得閻王老子找上門，總不是一件快意的事罷？

谁说我们没干事 赵良（陕西）



國內生活一瞥



1

- (1) 正月假日裡，青年人在河邊散步。
- (2) 飲水池、洗衣池、刷便桶處。
- (3) 南昌市“八一起義紀念館”上還掛着毛澤東的巨幅像。
- (4) 老公公，削筷子，搞副業。
- (5) 五百年來沒有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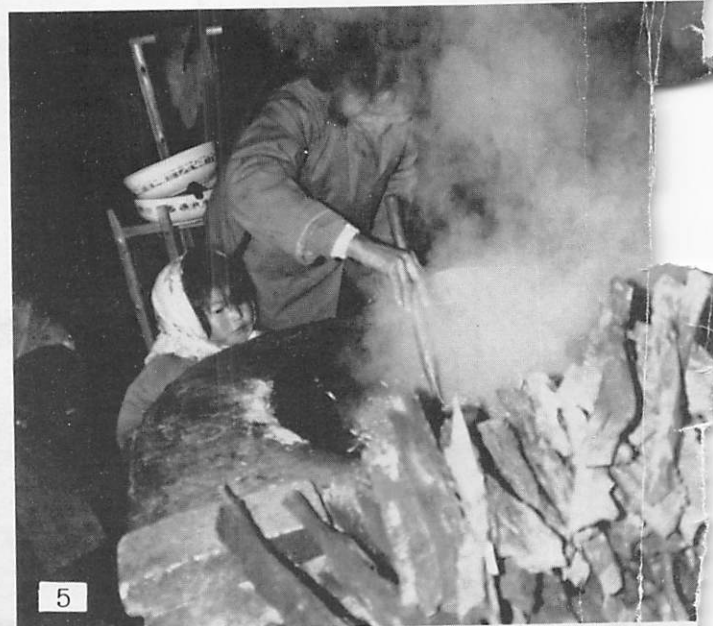
2



4



3



5



通訊處：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 BULK RATE ==
== U.S. POSTAGE ==
== PAID ==
== FLUSHING, NY ==
== PERMIT NO. 355 ==

電話：(212) 728-7008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出版：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定價(零售) 美國： 1.50 美元 加拿大： 2.00 加元 香港： 4.00 港元

